

增加最低工資，減少最高工時
立即實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立即無條件釋放劉曉波、趙連海

中國房地產泡沫

中國在拉美的利益是什麼？

緬懷淑青大姐

追思沈文銓

蘇俄問題專頁

繼續爭取增加最低工資，減少最高工時

振言

面對著中國、香港的通貨日益膨脹，物價飆升，尤其是樓價高企，租金大增，使港人生活更加艱苦，工資收入卻增加很少（據報載調查所得，香港明年加薪幅度在亞太地區排行尾2）。

在港人不斷要求訂定最低工資立法的呼聲中，香港自由黨的立法會飲食界功能組別議員張宇人，卻非常刻薄地主張時薪20元，「理由」是：如果訂得高些，就會有許多商號要結業，使工人失業。他這種危言聳聽、全無良知的主張，立即激起港人的強烈反對，這與勞工界普遍要求的時薪33元相差太遠！

後來，在市民強大的壓力下，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向行政會議建議28元最低工資水平，於11年5月1日實施；經過香港工人和工會等長達9年的不斷爭取之後，初步得到這一點子小「成果」，但這仍未能照顧到勞工大眾的基本生活需要，儘管香港經濟大為好轉，這項決定距離普遍要求的時薪33元還有一段頗大距離，而且要明年5月1日才實施，在這半年內物價和生活水平又會增高不少，因此，最遲也應該在明年2月初實施。

雖然如此不理想，但仍有許多無良僱主要想盡辦法，巧立名目，以圖抵消這點子增加。例如，大家樂等3家快餐店便改行工作時間扣飯鐘錢（雖然大家樂於09/10年度除稅後盈利5.13億元，而加工資後估計約多支出1.2億元）；肯德基家鄉雞工人連續工作8小時都未能進食，顧客少時又要工人提早下班，以省付工資；教育學院外判保安員改簽新約，雖減工時每天半小時，月薪卻減近1千元，並減少放4天年假；食環署外判的清潔及保安業公司千方百計訂立各種「無理罰錢」規則，且轉由工人支付食環署對公司的罰款；康文署新聘請季節性救生員，原來用膳時間改為不納入工時內計工資。像這樣的盡量剝削低工資勞工的事例，俯拾都是，不

勝枚舉。

但是，有壓迫就有反抗。大家樂帶頭扣飯鐘錢，首先就激發起公憤，職工盟率先號召罷食大家樂行動，很快就得到各界普遍的響應，大家商定了很快開始罷食的日子。大家樂資方眼見形勢惡劣，被迫低頭認錯，收回扣飯鐘錢的決定。勞方這次鬥爭勝利証明了：如果大家團結一致，共同行動，就可以戰勝資方的任意剝削、壓榨的。而為了共同行動，還要爭取有集體談判權。

顯然，28元是不夠的，還須繼續爭取達到33元的目標；而且，以後的通貨繼續膨脹，物價繼續飆升，必須提出按照通脹和物價的增長提高工資。為此應成立法定機構，負責經常的檢討工作，以及時提出增加工資。

爭取最低工作時間

與此同時，資方總是要延長工人的工作時間，以榨取更多的剩餘價值。因此，立法規定最高標準工時，也是同樣重要的。早在1948年12月，經由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第24條規定：「人人有休息及閒暇之權，包括工作時間受合理限制及定期有給休假之權。」在實際上，美國工人階級早在19世紀60年代已提出爭取8小時工作制，這運動在美國迅速發展，由國會通過8小時工作制的法令。在歐洲，第一國際領導工人階級為實行8小時工作制而經過長期鬥爭，終於在1919年10月由國際勞工會議加以承認，一些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實行。以後，在蘇聯和新中國等國也實行了。

但現時在香港，許多行業職工仍要工作10小時、12小時，甚至時常加班，例如保安業等。而在政府轄下的公共醫療機構，醫生經常是每週當值56小時，而每隔3、4天就要通宵工作，有

時要一直不停地工作30小時，醫生當完通宵更後，仍要再做半日或一日，即連續工作24小時。這不但對醫生健康有害，且有時會造成醫療失誤，直接影響病人，最少是因輪候病人多，不能詳加問症診治。

不久之前，便發生了伊利莎伯醫院一位實習女醫生，因3天內只相隔一天便兩晚通宵當值，結果在本月4日凌晨當值時暈倒，病情危殆。據後來檢查她有腦炎病徵，而辛勞過度更加重了病情。這個最新事例只是冰山一角，顯示本港公共醫療制度存在許多的缺點，需要醫護人員去爭取當局增加資源，添聘人手來解決。當局管轄下的公共醫療機構尚且如此，私營醫療機構爲了牟利，也會延長醫護人員的工作時間。經過長時間培訓而具有高深知識的醫生尚且如此待遇，其他行業職工的情況也可想而知了！

再舉例來說，九龍西聯網家庭醫學及基層醫療贊助的、向普通科門診醫生調查所得，被訪醫生有69.1%在12個月內出現頸痛，肩痛的有51%，因工作量大，醫生需5分鐘看一個症，因而引致手腕痛。(2010年12月28日《明報》報道)

此外，香港一貫實施的全年假期，分爲公眾和勞工假期兩種，前者每年有17日，後者有12日，比前者減少5日，適用於低下勞動者。這明顯是歧視他們，難道他們不該是「公眾」之列嗎？因此，需要爭取把這項減少改掉，一律享有17日假期才是。

因此，爲了保障職工大眾的健康，減少長時間工作，讓更多人加入工作，則爭取實施8小時工作制，也是與爭取最高工資同樣迫切需要的！

2010年12月29日

應立即實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軍行

十多年前，香港廣大市民和社會團體、學者們曾要求政府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以幫助許多青壯年時代付出過血汗，在退休後能享有退休金，安度平穩而尊嚴的晚年生活，不受飢寒疾苦的折騰。甚至連末代港督彭定康也在九十年代中提出全民性的「老人退休金」，讓所有65歲退休的長者每月得到2千多元的退休金作養老之用；但這建議在立法局得不到足夠支持而告吹，政府改行以個人和資方共同供款的強積金制，在2000年1月1日實施。

但10年以來，強積金實際上弊病漏洞叢生。職工盟根據事實列舉出該制度存有10大漏洞，例如：強積金僱主可用來抵消僱員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10年間共用去137億元強積金；行政費非常高，估計每年支取約65億元，蠶食了僱員的強積金爲數可驚的部份，而僱員卻無權選擇受託人；幾十萬家務助理及外傭被拒於強積金計劃之外等等。

65歲以上長者雖每月有1千元生果金，但這不夠支付生活費和房租等費用，房租物價等日漲，政府準備增加的又很少（將會每月約增加30

元）；申請綜援又有諸多限制，以及有損尊嚴等顧慮。

基於上述諸如此類原因，實應施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以取代現行的強積金制度，以便長者享有在世界銀行所提出的基本退休保障。

全民退休保障在絕大部份發達國家都已實行了很長時間，現時香港特區政府又已有龐大財政盈餘，金管局又有數千億元外匯儲備，比其他發達國家更有資源實施退休保障，令辛勞了幾十年爲社會創造了財富的長者安度餘年，令全港所有市民都享有退休保障。這是政府首長和高層負責官員必須立即辦好的要務！

現時在香港，官商勾結，社會日益分化，財富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上，越來越多港人趨於貧困化，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形成兩極分化，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化，仇商仇富情緒日益增加。北京最高領導人已不止一次面囑香港特首須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社會矛盾；而立即實施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就應該是有助解決深層次社會矛盾的辦法之一。

2010年12月22日

建議大辦合作食堂(轉載)

胡洛卿

目前，全球暖化，氣候反常，節能減排，刻不容緩。香港地少人多，垃圾也多，如何減少廢物，也是急需解決的問題。還有社會、民生、教育等問題，像一條鐵鏈，一環扣一環。怎樣抓住主要環節，把整條鐵鏈抽出來呢？建議以社會企業的形式在學校、屋邨和人口密集的地方大辦合作食堂，可解決很多問題，減少社會爭拗，促進和諧，更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但如何辦好，那就見仁見智了。茲將個人淺見提供參考。

(一)體制問題：合作食堂，顧名思義是合作性的，不屬於任何個人。是全體職工服務於社群的企業。沒有雇主與雇員，集體分工負責。管理人員民主選舉，群眾監督，有權罷免。要群策群力，搞好經營管理。工人按收入提成，多勞多得。開辦經費可向有關機構申請資助或貸款，按利潤提成，分期付款，或留作企業發展基金，一切財務公開，包括收入與支出，各人工資等等。嚴禁營私舞弊。各同行可互相競賽，交流經驗，取長補短，共同提高。

(二)環保問題：辦好合作食堂，可大量節省能源、水電及廚房用具，減少廢氣排放及生活垃圾（包括買菜時所用的膠袋），對環保是一大貢獻。

(三)就業問題：就近組織失學、失業或半失業人士辦食堂，使一些年齡較大及低學歷沒有技術的人就業。有餐飲經驗和專業技能者優先（如熟識業務、烹飪、做飽點等等）。不用乘船坐車，長途跋涉，減少交通壓力、空氣污染和車費開支。還可適當地吸收殘疾、更生人士及在邨內居住的外籍勞工，使他們融入社會，增強自信，促進和諧。

(四)家務勞動社會化：食堂不以贏利為目的，但要自負盈虧，提供價廉物美、大眾歡迎的家常便飯。使人們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節省大量人力物力，去做各種有意義的事（把孩子管教好，也是一大貢獻）。低收入家庭及體力差的長者，可免除買菜煮飯之苦，吃飯不用愁了。

(五)健康飲食：目前的食品，普遍含有大量添加劑，像保鮮劑、防腐劑、催熟劑等等，蔬菜瓜果也不例外。長期食用，對人體健康產生什麼影響，難以預料。各人體質不同，後果不一樣，大多是不自覺的。出了問題，以為自己身體不好，不會想到「病從口入」。如能從產地直接進貨，吃得新鮮，可大量減少那些化學物質，同時也可減少一些莫名其妙的疾患，醫療費用也跟着降低了。外面供應的快餐，為了招徠顧客，並且易於保存，免不了煎炸的多，有些人尤其是青少年不一定適應，吃後燥熱也不自覺。加上生活不正常，睡眠不足，肝火上升，容易暴躁，而鬧「情緒病」。尤其精神不正常的人，身體沒有調節好，會火上加油，容易發狂，以至害人害己。飯堂提供健康飲食，應時湯水、涼茶等，各取所需。使大家吃得新鮮，吃得健康，吃得開心。如有醫生或營養師作具體指導更佳。

(六)採購問題：現在的商品，不論吃的或用的，批發與零售差價很大。如普遍建立食堂，辦成連鎖店，組織運輸隊，統一運輸，直接從批發市場或產地進貨，減少中間環節，大大降低成本。而且周轉時間短，可不用或少用保鮮劑、防腐劑，做到價廉物美。還可考慮利用食堂空隙，供應日常必需品。如水果、廁紙，使民眾受惠。如能另辦合作商店（場），那就更好了。

(七)場地問題：很多學校招生不足，在學校找地方辦食堂會比較容易。可找該校雙失青年、學生家長及附近失業人士辦食堂，除供應本校師生外，還可供應居民。屋邨則不同，按規定，屋邨辦食堂是不允許的，且受場地限制。但規則是人訂出來的，必要的時候，應改則改。用膳時間可在1—2小時內供應，隨到隨吃，吃了就走，這樣可容納多些人進餐。且豐儉由人，吃飽為止，不留廚餘。一些學校、老人中心和街坊福利會也有食堂，但規模小，成本高，品種單調。且多在外面訂餐，不自設廚房，用膳者不多。如正規辦食堂，一日三餐，款式多樣，價廉物美，新鮮可口，男女老幼，自由參加，定會大受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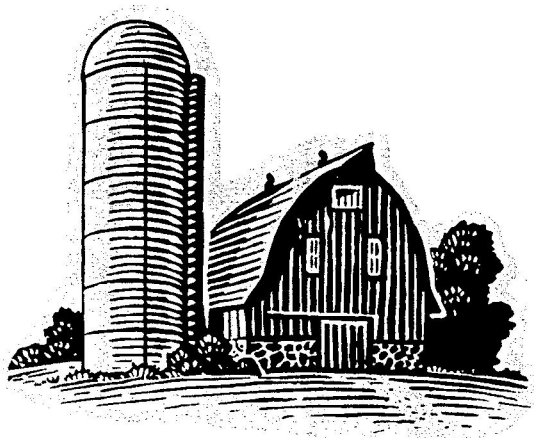
(八)創造文明屋邨：屋邨是人口密集的地方，凝聚力強。人們經常一起吃飯，見面的機會多了，大家熟識了，互相了解，互相關心，互相幫助，打破各家各戶各自為政的局面。鄰舍關係搞好了，有問題容易發現，合力解決，化解矛盾於基層，促進和諧，創造文明屋邨。

(九)教育問題：取之於民，用之於民。食堂應按利潤提成，配合社福機構，利用食堂非進餐時的場地，把區內文娛康樂活動搞得有聲有色。屋邨(苑)人口眾多，潛在力大，各有所長，可輔導學生自修。個別成績差的，找有文化的義工特殊輔導員，務必使其跟上進度。否則如扒樓梯，一步上不去，就遠遠落在後面。組織青少年舉辦各種興趣班：如書法、美術、音樂、攝影、話劇，還有讀書會、辯論會、講故事、作文比賽、唱歌、跳舞、演戲、體育運動（打球、跑步、扒樓梯、下棋之類）、美化環境等等各種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動。引導他們從圖書館找資料，培養學習興趣，改善一些人的不良習慣（吸煙、吸毒、賭博、沉迷上網等）。所有活動，歡迎家長及其他人參加。現在科技發達，電腦打字方便，很少寫字，把傳統文化

丟了。可辦書法班，找合適的地方，屋前屋後也行，擺些吸水的楷磚、劃上格子，放些毛筆和水，隨時可用毛筆練字。水寫在楷磚上，清清楚楚，不久即逝，又可重寫。既可練字，又可陶冶性情。利用食堂空餘時間，舉辦普通話班、英文班等等，不論老少，自由參加，吃飯時反復播放。教書主要是育人，藉此進行人生觀教育，認識怎樣做個有用之人，不要渾渾噩噩過日子。

(十)按時作息：食堂不開夜市，一切活動不超過晚上九點鐘。鼓勵按時作息，反對過夜生活。早睡早起身體好。沒有充足的睡眠，就沒有精神學習與工作了。自由是相對的，無限自由就成了散漫。家長應以身作則，教導子女過正常生活，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做個有用之人。學生以學為主，今天學好本領，將來服務社會。建議屋邨(苑)午夜定時關燈一半，大樓關門，出、入按鈴，保安員按鈕開關，不得自由出入。午夜容許保安員打瞌睡。

上述意見僅供參考。如能拋磚引玉，集思廣益，做到保護環境，改善民生，促進和諧，培養下一代，那就好了。



不要哭 不要笑 只要瞭解（轉載）

梁國雄

2009年1月29日，我與其他辭職發動「變相公投」的議員，因保皇議員集體離場導致流會，不能於立法會讀出辭職演辭，其中為求明志，我以如下「集句詩」抒懷：「行無愧作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並略作解釋如後：「此詩頭兩句，出自五四運動旗手陳獨秀先生，成於國民黨政治獄中，於友人探監求墨寶時一揮而就，渾然天成，盡顯這位中共創黨先驅錚錚風骨。後兩句，乃是魯迅先生晚年得子之戲作，寄託不畏專制豪強，憧憬未來的樂觀！」

不料5個月後，此詩再用諸於立法會議事堂中，竟更為合適。6月23及24兩日，民主黨一眾議員唇槍舌劍所指，竟就是我這「同路人」！因為我失言冒犯司徒老人，遂成眾矢之的，偌大議會，眾目睽睽，翹首以待，無非民主黨忽然轉軀的理據，所見所聞的，竟是興師問罪，道德公審，而非交代心腹，條陳理據！

不過，民主黨以此轉移視線，祇能得逞於一時，焉可解民眾憤懣於永遠？以紙包火，愈燒愈旺，趾高氣揚，以為可憑三寸舌頭打發群眾者，最終亦不得不發表報告，交代與中共政權及特區當局玩「暗室政治」之端倪！不旋踵，這份據稱已徹底披露，無須補充的材料，竟又遭中間人梁愛詩駁斥，透露早於去年12月22日民主黨已暗投懷抱，向中共政權叩門問卦！一看之下，才知機關暗藏，抵制五區公投運動的肥皂劇，原來不過是一份見面禮，一桩投名狀！

5月16日，公投運動得50萬市民支持，以選票重申「2012雙普選，廢除功能組別選舉」，卻被貶斥為「失敗」。我引王安石咏梅之詩，與四位發動公投同寅互勉，向市民表心迹——「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客，為有暗香來」，憑詩寄意之餘，尚於不同場合，透過

傳媒向民主黨及普選聯直諫，指出他們並無民意之合法授權，必須立即停止背著民眾與中共祕密談判！更不惜於5月19日宣誓再任議員時，雖遭主席斥喝，仍當眾為民呼出此一諍言。不禁想到五區公投運動關鍵時刻，我於傳單上再集魯迅先生之句成詩：「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歷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苦苦相勸，今日看來，一切注定是徒勞！

6月25日，由民主黨主動提出，獲中共政權支持的「優化區議會」政改方案在立法會通過，所謂「破冰之旅」初見成效，港人普選權遭權貴宰割瓦解。中共奢談的2017及2020假普選，將會由此而獲得黃袍加身。正如喬曉陽所云，僅限於投票權之普及平等，至於提名及候選權則由小圈子操弄，恍如「優化區議會」方案之提名權掌握於小撮區議員手中。所不同者，乃是區議員尚可自詡為民意代表，除此之外，未來形形色式的「提名人」，將依舊是為小圈子私相授受的特權份子而已！

一直以來，中共政權及其附從，都竭力強姦民意，誣蔑港人鍾愛功能團體選舉，容忍篩選候選人。然而，無論歷次立法會選舉，抑或大大小小遊行，市民均手足並施，掌摑這些謾言。2003年的7月1日，五十萬人上街怒吼，由反對基本法第廿三條始，倒董為輔，結論就是2007、2008雙普選。又有誰想到，自詡堅定可信的民主黨竟會背棄一己政綱，出賣選舉承諾，竟然甘為中共政權張目，不惜強姦民意，旁然無人！

其實，回頭一看，民主黨之變，乃是有迹可尋。現時它指摘反對其倒行逆施者「破壞團結」，堅稱並未放棄雙普選理想，不過是強辭奪理！若說破壞團結，則始於五區公投發動，民主黨竟然公開排斥，向中共表明忠誠，今日民主黨稱其暗室政治，投懷送抱為務實，不啻

拿著一碗紅豆湯，嘲笑不願出賣長子權的「刁民」，卻於洋洋得意間，露出了它的尾巴：抗拒不若和解，乃是因為抗拒會觸怒中共，阻礙政改，不能得著蠅頭小利，拿不到區議會方案，因而是務實的。然而，它恰恰忘記了，民主運動所發動的民間力量，才是真正的現實，才是逼使當權者讓步的現實，實現真正普選的現實！而民間力量茁壯成長，又必然以群眾意識躍進及自我充權為前提。五區公投運動的目標，不但要讓民眾經過思量，投票選擇，動員組織，實踐賦權，亦是不義當權者與受壓的無權者的較量！

回想去年11月，公投運動蓄勢待發，一方面，張文光公然向林瑞麟提出今日之區議會方案；另一方面，又冷嘲熱諷，攻訐批判五區公投運動，早已顯露出他們的抉擇：寧寄希望於中共善意，勿存幻想於群眾運動。此所以，「普選聯」誕生於五名議員辭職之後，充當投石問路的平台，周旋於立法會各政黨，暗合於中共意願，乞靈於保皇派諒解，打擊公投於萌芽！

再三周折，幾經白眼，杯葛公投運動終於大功告成，暗室政治遂由地下轉為地上，民主黨一躍成為中聯辦入幕之賓，再由中共授意提出「區議會方案」，放棄爭取普選路線圖，最終苟合於6月25日之投票！民主黨賊喊捉賊，奢談繼續爭取普選，於2016及2017兩次選舉安排寸土必爭。但到底如何落實，底線為何，卻依循黑箱作業進行，群眾蒙在鼓裏，又何以逼使中共更讓一步，保證2017及2020之特首及立法會選舉，將是真正的普選？民主黨若真要繼續爭取，就必須開誠布公，依靠群眾，拋棄暗室政治！

然而，既已出賣選民在前，破壞公投於後，自己棄兵曳甲，解除群眾武裝，又如何有臉面鼓動風潮，發動民力！相反，正由於已簽城下之盟，拱手將主權賣予中共政權及其附從，則除政制此一關鍵之外，其他社會、經濟、民生

諸多問題，又何以站在勞苦大眾立場上據理力爭，不惜一戰？經此一役，民主黨已經洗心革面，昂然成為建制派一員，命運與共，為其政策盡力，一若今日替政改背書！當日貴為反對派之龍頭，尚且在領匯上市、整筆撥款、地鐵私有化及兩鐵合併、政府職位外判、合約化等害民政策「失足」，竟沾沾自喜為「理性反對派」，將來難免變本加厲，一如今日「政改」充當助手，小罵大幫忙，吃糖不要廠！

一言以蔽之，民主黨若不知錯而改，懸崖勒馬，則其所謂「路徑依賴」教條，必將適得其反，不會令當權者不由自主，受群眾壓力而走向民主普選，反而讓自身依附建制，逆群眾利益而加入執政同盟！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務實的民主黨走好！請別把破壞團結的帽子亂拋，「不為團結而相同，祇為相同而團結！」早已有言在先，何懼惡言相向？

「不要哭、不要笑、祇要瞭解」！

「走自己的路，讓人家去說吧」！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2010年8月3日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37卷第2/3期（總第229期）

2010年12月31日出版

出版/編輯/承印：《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 號

Address: GPO Box 10144, Hong Kong

E-mail: octoberreview@gmail.com

Website: <http://www.october-review.org>

〔本刊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熱烈恭賀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暨昂山素姬復自由

雙和平獎得主喝彩

茹素爲環保賀曉波

-----飯 醉（轉載）

[編者按：爲慶賀劉曉波獲和平獎，和昂山素姬重獲自由，香港有熱心人士發起「飯醉」（諧音「犯罪」）聚餐，有500人參加，也有程翔、劉銳紹、黎則奮等知名人士學者上台演講，讚揚劉曉波。以下轉載的是當時介紹「飯醉」的原文。]

這次飯醉亦有人反對的，認爲牢中慶什麼呢?!但山青曾在中國坐牢十年，深深體會需要外界聲援支持的，因爲外界的聲援時，牢裡的待遇也會得到改善，牢中人是特別敏感的-----因空白時光過多，人總因客觀環境而會胡思亂想的，故此，很多人意志力薄弱一點都會精神失常出來的。

唯此，外界的聲援只怕少不怕多；我亦要禮貌的通知劉霞一聲，透過北京朋友的天地線，得知結果是鐵緊石嚴的達不到她的耳朵；但外銷傳內的事例多得很，相信劉霞夫婦一定會知曉的。

因此，朋友，我們今天寬鬆，相對他們是得不不易的；不才便計劃茹素賀曉波，初期定盆菜的省錢借維園或九龍公園場地的；每位頂多百五元便可；可惜場地早已外借，只可倫敦大酒樓；茹素每圍都要二千，坐滿一千人約八十三圍，理想的每圍有四百元盈餘，八十三圍約盈餘三萬元左右，加上工作人員表演嘉賓的開

支，相信都有三萬元的，已找朋友幫忙製作DVD，給劉霞一個紀念，香港市民沒有忘記他們的，我們在寬鬆的環境下-----民主生活化的茹素爲環保，大家都要食飯的；只是食得豪一點，二百元一位；亦找有能力人士贊助-----如陳士齊就贊助八十後的熱鬧一番，我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爲祖國的民主添磚添瓦的生活化地美好一番。造成傳統的如呼吸一般自由自在，便相對民主並不是拋頭顱、灑熱血的傳統年代了，是生活多姿多彩的如菜園村公公婆婆爲建村保家園一般自覺自悟的各自站出來的。

路是人行出來的，莫爲善小而不爲，正如當年遊行上街已是大事般進行中；今天的七·一遊行已養成習慣性變爲習俗化、風俗化的例牌活動了，成了習俗時，政府要收窄是較爲難一點了。

在文明的國度是嘉年華活動般帶來歡欣鼓舞的慶典。

人像呼吸般理所當然時，我們便可安居樂業的如世外桃源了。互勉之！

香港市民集資飯醉，歡迎踴躍參加，用歡樂心情衝破悲情！

立即無條件釋放劉曉波，還我們中國人權！

張開

劉曉波只是由於發起起草了《零八憲章》，主張改革中國政治，以促進民主、自由、人權，很快得到中國1.2萬人士聯署，就被中國當局無理地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重判11年徒刑。他提出的這個目標，其實也是中國人民今天所迫切需求的，儘管他同時主張只用和平手段去達成，實際無可能做到，因為官僚層為保持其根深柢固的既得政治、經濟特權，絕不容許有徹底民主改革的。因此，它要再一次以言入罪，剝奪他行使中國憲法所應享有的言論、出版等權利。關於這宗冤獄，筆者兩年前所寫的《〈人權宣言〉發表60週年看中國人權》一文中曾加以評述(刊於本刊總第225期)。

在他繫獄兩年後的今天，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他，以表揚他對人類事業的貢獻和同情他所付出的代價，也意味是對中國當局壓迫民權人士的抗議。在決定頒給劉曉波之前，中國政府曾特地派出副外交部長專程到挪威，企圖加以勸阻，但頒獎委員會不為所動；早在劉曉波被重判時候，該委員會已決定這樣做了。而在舉行頒獎禮前夕，中國當局表示非常強烈的反對，公開認為是干涉中國的內政，實行全方位的打壓：不僅不由此釋放劉曉波，而且軟禁了他的愛妻劉霞，不許他、她出國領獎，也阻止所有可能去參加頒獎禮的人士出國，連許多異見人士（例如丁子霖夫婦）也加以監控，甚至知會餐室不招待6人以上的民眾訂位。與此同時，又向各國政府施壓，勸阻他們派人員前往；對於不聽北京意旨而仍去的國家，則視為不友好，可能時加以報復，從而迫使不少國家屈服於北京的壓力，但仍有大多數受邀請國家參加。

諾貝爾頒獎禮終於如期舉行，在禮堂上放一張空椅，獎章、獎金等則由諾委會代為保存，等他日能發與劉曉波。這表明阻撓的企圖並不能得逞，對異議等人士是一種鼓舞。這猶如獨立中文筆會作家野渡所寫的，劉曉波的獲獎，「必將進一步對中國民權運動發酵」。

專制政權阻壓和平獎得主領獎的事例過去至少已有四宗：1935年納粹德國之對奧西茨基（他因反對希特勒，被控間諜罪），1975年蘇聯官僚層之對沙哈諾夫，1983年波蘭官僚層之對華里沙，1991年緬甸軍政府之對昂山素姬，後三位得主不能親去，改由親人代領。這些歷史事例表明：專制獨裁的統治者和法西斯獨裁者都敵視諾貝爾和平獎，而得獎人士則得到激勵，堅強不屈，抗爭到底。

在頒獎禮過後，直至此刻執筆時，已經半個多月，但對劉霞仍未解除監控，對外通話等仍未復通。

劉曉波夫婦遭無理打壓、迫害，深得本港和國際社會人士的同情，普遍要求立即無條件地釋放劉曉波，恢復他們的人身自由和人權。例如，12月5日在香港，就有11個知名社會團體發起聯署，48個團體和1千多位個人聯署，登報呼籲舉行「釋放劉曉波·還我中國人權」遊行，當日有眾多市民參加；他們提出以下的切合時宜的5項具體要求：(1)我們支持中國公民推動《零八憲章》的權利！(2)我們支持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3)我們要求中國政府立即無條件釋放劉曉波！(4)我們關注劉霞和維權人士在劉曉波獲獎後行動自由受限制，要求中國政府立即撤銷對他們的監控！(5)我們關注《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和自由，要求中國政府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在囚良心犯！

我們更要求中國當局立即無條件釋放冤獄中的不同意見人士(例如胡佳等人)和維權律師(包括趙連海諸位)，還他們一切應有的人權及人身等一切民主自由！

雖然諾貝爾和平獎有著西方強國外交和意識形態的因素在內，因而未必獲得左翼人士完全支持，但是，劉曉波獲獎仍不失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激勵。

2010年12月26日

文質理念之後

白重慶

二千年第一個十年的十月十日前夕，即是辛亥革命九十九年而兩岸將進入思索百年反王權專制的百年崎嶇，中國下一個百年將如何走下去之際，來自歐洲悔疚心靈而補罪式設立的“黃色炸藥”發明人諾貝爾，遺囑特託瑞典西鄰，那個曾被入侵的挪威，獨自處理頒發的“和平獎”，有了得主。大家都知道是劉曉波。

而消息發放全球知曉之際，唯獨一人不知悉，大家也都知道是劉曉波。因為他正在遼寧錦州監獄坐他的第四次長牢：十一年！這十一年，比本港的劉山青還要多出一年，罪名幾乎相同，由“反革命”改為“顛覆國家政權”，這是叫人恥笑的羅織，手無寸鐵的文質之人，總惹來專制者最難忍的憤怒。

劉曉波妻子劉霞，除了在電話中向記者動情地自白：“我會告訴他：‘你得獎了’！哈哈，當然還有來個大大的擁抱吧——”，還不忘表達，這個獎，屬於所有和平爭取人權的當下國人的。而這必須要有的一句，我們也同意；它是返回主題：“現代中國要民主政治改革”的長期堅持，步伐的重整，向所有同道有心人分發再勇敢起來的世界性支持。雖然，專制的回應是，西方又再干預我黨主大國蠻有特色和國情的萬惡舉動，是對和平獎的褻瀆。潛台詞即是說：“和平獎”，還是有斤兩的，它大概該如往年一般，提早頒給美國奧巴馬的模式，頒予明年將任滿退下的溫家寶。因為溫向外國專訪說實了：中國政治改革，他將“風雨無阻，至死方休”，與早前在深圳特區設立卅年活動時說的“堅持政治體制改革”連戲；北京余杰說他該得“影帝大獎”，鏡頭前總那麼會說

話。鏡頭後，維權的人，一個個照抓，任你祇是為從未停息的天災人禍做了些熱心熱腸事，公開公道話。所以挪威的五人委員會有種，捧了奧巴馬，不拍溫家寶的馬屁！

出身於吉林大學文學本科生的劉曉波，一邊在北師大拿個博士，一邊已力批“新時期”文學和思潮紛紛登場的新學者和作者群著作中的種種欠缺，因而成為大有名的“文壇黑馬”。這匹黑馬，在89民運興起之前，身在歐美講學，符合他的文質。文質人特有敏感和獨立認知，使他在“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前夕，敢於返國，敢於到風暴中心發言、絕食；運動敗陣，又敢於最早呼喊：“民主運動，毋須（專制）平反”的極具氣概和正確、有持續意義的稀音，雖然他後來發表了不少狂言怪話。

但文質理念，先天有其弱點——他們沒有真正進入建國政治體制的思考，他們其實未準備好當政治家，特別是錯以為眼前中共所行，即是社會主義的失敗。因而無法不在國家的經濟體制上，迎合資本主義種種，保障私有制；在多元民族的亞洲老大國的眼前現實下，不能不行所謂“中華聯邦共和國”體制，未聯先散，正合外間豺狼的窺視；在城鄉之間，又在眼前現實之下，老鄉們，惟有對不起了。筆者感覺上，劉曉波似瞿秋白，但未有瞿的經歷。

無論如何，和平獎的頒發，能使劉曉波減免牢獄日子的話，都是大大的應該！

2010.10.10

必須無罪釋放維權律師趙連海！

張開



繼劉曉波冤獄之后，另一宗趙連海冤獄又出現。這位維權律師，由於親兒食用了三聚氰胺毒奶粉，成為許多結石寶寶之一的受害人，迫於奔走為所有同樣受害兒童爭取賠償，負起其維權律師的職責，結果反成為多一重禍害，被無理拘捕，控以「尋釁滋事」的莫須有罪，判兩年半徒刑，使他在毒奶粉受害之外再加上冤獄受害的苦痛。

此事一曝光，暴露出中國法治的原來面目，實在是無法無天，任由官僚們顛倒是非黑白，從而迅速掀起國內外的巨大公憤，特別是在香港，不但廣大市民憤怒，香港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發表聯合聲明聲援趙連海，連素來唯京命是聽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也一反常態，27名全國人大代表聯署表示關注北京法院對趙連海判刑過重，希望改予輕判；政協委員劉夢熊更狠批國內的司法無耻，即使有法也不依，寫下「中國司法最黑暗最醜陋一頁。」

在國內，即使是在一黨專政的嚴厲控制

下，也有20多位維權人士發起聯署，指當局對趙案的處理手法嚴重衝擊中國司法制度，要求最高人民法院覆審，並改判趙連海無罪。（《明報》記者11月24日報導）

一份隸屬於官方廣東省出版集團的《時代周報》，也用另外一種方式力撐趙連海，將他和一些維權律師及多名零八憲章簽署人評入100名「2010年度民間人士」之內，大力加以表彰。

《時代周報》在頒獎辭中提到：趙號召受害家長作合法維權訟，卻被判兩年半有期徒刑。「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處理的有頭無尾和趙連海的遭遇，也反映了對公平正義的執着信念，非鐐铐和囹圄能阻擋」。不少網民對內地傳媒終敢為趙連海發聲感欣慰。

儘管當局後來下令「整頓」，主管副總編寫檢討書，但這一期周刊已有不少流出市面，剩餘者全部秘密回收；而從這事可反映出，趙連海等受無理判刑及投入冤獄，是深得中國社會人士同情和支持的。

在當局巨大壓力之下，趙連海被迫停止上訴，大概他也深知現時的法律和司法機關，只為一黨專政服務，上訴不會有勝算，其后傳出他將保外就醫。但這樣一來，就先要他承認錯誤，這能否為他所願意呢？11月22日新華社電報導趙連海表示認罪服判，司法機關已經受理趙連海保外就醫的申請，從此以后，就似乎再無有關趙連海的訊息了。究竟司法機關已否批准其申請，趙連海已否獲釋回家與家人團聚呢？這至今日寫出此文時，已經足足有一個月，但仍然沒有確實消息。

只是在本月10日，突傳出趙連海獲保外就醫的消息，引起大批香港傳媒湧至他位於北京市的寓所；但被數十名掛有居民委員會臂章的

人員阻撓香港記者採訪，眾記者最終得不到真確証實。但從此事可知，守衛趙居所的門警早有準備，有關真實情況都被封鎖；是否趙已返家？仍是一個謎。由此可再一次証明：在中國，無數的冤假錯案一直在不斷發生，而人民連起碼的知情權也被剝奪，受害者更無法律保障其人身等一切應有權利！這種極不合理情況，到何時何日才能消除呢？這就要靠中國人民的努力爭取徹底加以改革了！

2010年12月22日

後記：趙連海的近況，在再傳出他「保外就醫」之後幾天，據【明報專訊】報道：內地為毒奶粉受害兒童維權的博客網站「結石寶寶之家」，昨天出現署名「趙連海」所發的通告，稱已獲保外就醫，正於醫院接受治療，現在「拒絕與任何人接觸及打擾我的家人，我要過一個正常人的生活」。（12月29日《明報》）

這不能不使人懷疑：既然趙連海在被拘留一個月期間，飽受刑訊逼供，日夜疲勞轟炸，又不知妻兒處境如何，在精神、肉體備受極大摧殘折磨之下，正如俗語說的「肉在砧板上」，任人宰割，最後不得不屈服，違心地依照「指令」發出這個「通告」。至於是否真的為他所發，一切真相只有將來歷史才能大白，今天不能不存疑待証。但這也是極權制度下的又一宗悲劇，並非個別事件和偶然的。而與此同時稍遲一天的同樣是【明報專訊】的報道：十月初上任的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首度評論趙連海案件，強調內地像大多數國家一樣是司法獨立，趙案已「妥善解決」，至於港區人大代表聯署關注趙案，是否等同干涉內地司法獨立，王光亞稱要視乎有關人士「如何表述」，但強調「一國兩制」之下，「井水不犯河水」。港區人代的工聯會人士黃國健說，既不可干涉香

港事務，又不可評論內地事務，人代可以做什麼？（12月30日《明報》）

稍明事理的人都知道：唯一的答案就是：所有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都只能充當舉手機器，唯唯諾諾地成為替當局點綴「民主」的花瓶，卻絕不能發出與高層（或一般所謂的「阿爺」）意旨相反的歧見或不同聲音。這次有欽點的香港27名「人大代表」居然罕有地聯署信給中央，提出溫和的請求，難怪給新官作出上述回應了！這又是「官場」中的悲哀之一，不能不使許多港人再為之嘆息！

12月30日補記



中國房地產泡沫

破謎

中國已經進入金融資本階段，過剩的虛擬資本紛紛湧向房地產。即使中國政府三令五申宏觀調控過熱的泡沫經濟，可是新舊年交接之間，中國房地產價格依然居高不下。

國家統計局2010年12月10日發佈資料顯示，11月份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價同比上漲7.7%，漲幅比10月份縮小0.9個百分點；商品房銷售額5286億元，同比增長18.6%。**杭州**楊家牌樓地塊和**枝江**旅遊度假區地塊分別以每平米25735元和每平米37069元成為住宅和商業兩個新的高價地塊。**武漢**土地市場高價地塊，總價、單價雙雙溢股，底價5.9億元的兩個地塊，成交價漲至13.18億元和10.2億元，均打破高價地塊單價記錄。雅居樂以50多億元人民幣拿下**南京**兩地塊。置信實業以樓面價每平米3.7萬元競得**溫州**大學地塊，刷新全國土地拍賣紀錄。廣鐵集團以86億元取得**廣州**鐵路南站地塊。**上海**寶山工業園區潘涇路東側、羅涇鎮B1-4兩幅住宅地塊，分別以86.7%和110%的高溢價對外出讓。

12月6日，**武漢**聯投以每平米8755元拿下**武漢**武昌新生路地塊，刷新2周前由九龍倉（8063元/平方米）創下的最高單價紀錄；12月9日，**上海**青浦趙巷地塊最終被和記黃埔新成立的子公司以每平方米21648元的樓面價競得，溢價率高達192%；12月16日，**廣州**保利地產拿下兩幅地塊，成交總價35億元，其中一塊地樓面地價達20605元/平方米，刷新單價紀錄。

2010年12月16日新華網，國土資源部、監察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聯合通報2009年度全國土地衛片執法檢查情況。國土資源部部長、國家土地總督察徐紹史說，2009年度土地衛片執法檢查反映的突出問題，主

要包括部分地區違法用地問題比較嚴重，一些市、縣違法佔用耕地面積占新增建設用地佔用耕地總面積的比例超過15%。重點工程項目、部分行業用地違法嚴重。國家和省級重點工程項目違法用地面積33.04萬畝，其中耕地面積15.02萬畝，分別占全部違法用地面積和違法佔用耕地面積的45.05%和54.72%。涉農違法用地分佈廣泛。僅農村建房違法用地就達1.3萬宗、5.1萬畝，占全部違法用地宗數的38.83%、面積的6.9%。

根據2011年1月8日《新京報》，國土資源部部長徐紹史在“全國國土資源工作會議”上說，2010年全國土地出讓成交總價款2.7萬億元，同比增加70.4%。有業內人士表示，2.7萬億創了歷年新高，比中國122家中央企業2010年的利潤總額1萬億元人民幣還要多一倍以上。2010年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48267億元，比上年增長33.2%，其中，商品住宅投資34038億元，增長32.9%，占房地產開發投資的比重為70.5%。

2010年12月16日《國際金融報》引述資料顯示，中國高速增長的房地產市場成為外資在華逐利的重要領域。中國1-11月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累計達到917.07億美元，同比增長17.73%。僅房地產領域1-11月FDI 201億美元，同比增長48%。國家統計局12月10日公佈資料，1-11月，房地產開發企業本年資金來源中，利用外資656億元人民幣，增長59.0%。商務部同一天發佈的資料顯示，11月共有114家外資房地產公司向商務部外資司報備成立新公司，希望通過增資或者以並購的方式進入中國，該數量是10月的2.71倍。商務部1月18日發佈資料，2010年全國累計吸收外資1057.4億美元，同比增長

17.4%。不僅是外資，其實勞動力也漸次流向第三產業，造成第一及第二產業慢慢衰弱。根據2010年11月25日新華網，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指出三個產業就業人員的比重將達到37：28：35，與“十五”末的44.8：23.8：31.4相比，第二、三產業比重較大增加，非國有經濟就業的比重將由74.6%增加到78%。

根據2010年12月21日《杭州日報》引述中國社學科學院2010年12月公佈的《住房綠皮書》，對35個大中城市的住宅價格泡沫進行統計，平均房價泡沫為29.5%。統計顯示一線城市中泡沫最嚴重的是北京，泡沫成分占實際價格比例將近50%，廣州則屬於“存在一定的泡沫”，泡沫成分占實際價格比例不到30%。

2010年12月16日〈中國證券報〉，對當前房價水準，75.5%的居民認為“過高，難以接受”，是有調查以來的最高值（調查於2009年1季度起增加了關於房價的相關問題，資料數列始於2009年1季度）。對未來房價，43.3%的居民持上漲預期，比上季上升6.8個百分點，接近於2009年4季度的最高點。未來一季持購房意願的居民占16.2%，較前兩季小幅回升，但仍處於調查以來低位。

2010年12月19日，國土資源部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堅決抑制少數城市地價過快上漲趨勢。國土部中國土地勘測規劃研究院副總工程師鄒曉雲指出，政策主要強調還是強化落實，通過控制住房用地供應總量，把握供地節奏和時序，優化供地結構，堅決打擊囤地炒地閒置土地等，落實調控的措施。另外，採取一些特別的加強性措施，包括“保障性住房、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等‘三類用地’未達總量70%的年底前不得出讓大戶高級商品住宅用地”以及“溢價率超過50%的地塊上報”等。同時，規範房地產用地出讓行為，避免出現超面積出讓、捆綁出讓、“毛

地”出讓，住宅用地容積率小於1的土地。

2010年12月28日，中央電視台節目《新聞1+1》指出，土地財政難以維繫。“土地財政”造就“征地—賣地—收稅收費—抵押—再征地”的模式，其中地方政府、開發商、銀行成為最大的受益者。資料顯示，2001年—2003年，全國土地出讓金達9100多億元，約相當於同期全國地方財政收入的35%；2004年，收入近6000億元。2009年達到1.5萬億元，相當於同期全國地方財政總收入的46%左右。在有些縣市，土地出讓金占預算外財政收入比重已超過50%，有些甚至占80%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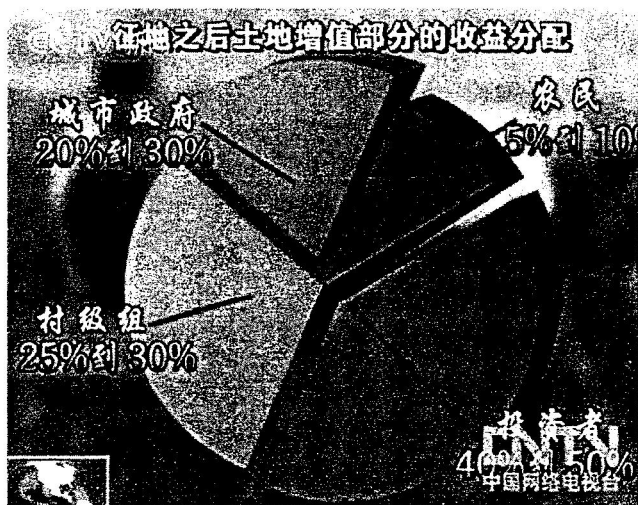
“‘土地財政’一般是指一些地方政府依靠出讓土地使用權的收入來維持地方財政支出。”中國土地學會副會長黃小虎說，實際上，土地出讓後，地方政府還能獲取包括建築業、房地產業等營業稅為主的財政預算收入，這些收入全部歸地方支配。僅此兩項就占到地方稅收的近四成。在一些地方，“土地財政”成了名副其實的“第二財政”，有的甚至成了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

中國人民大學土地管理系主任葉劍平說，地方政府手中的土地和政府信用是金融機構看好的優質抵押品。近年來，特別是在

城市基礎設施投融資上，地方政府獲得的抵押貸款增長較快。據銀監會統計，截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餘額為7.38萬億元。而賣地收入是還貸的主要來源。

中國土地學會副理事長黃小虎批評：‘地方的經濟發展依靠土地財政，這種發展方式本質上是負債。有的地方沒有這樣的盈利，將來會形成社會的壞賬，成為社會問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指出，2010年一至三季度土地出讓金收益是1.68萬個億。地方財政賣地錢占到收入的60%，‘這個地過去都是農地，實際上在很多地方政府成了賣地的一個大公司，這是不正常的。’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設計的<征地之後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投資者拿走大頭，占40%到50%，城市政府拿走20%到30%，村級組織留下25%到30%，而最多農民拿到的補償款只占整個土地增值收益的5%到10%。



2010年12月26日人民網，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之聲回應政府調控房價的成果的問

題。溫家寶說，將從兩個方面繼續加大調控的力度，第一，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設力度，2010年保障性住房大約為580萬套，已經建成370萬套，明年將開工的是1000萬套，這也包括公租房、廉租房和棚戶區改造。第二，抑制投機，主要是利用信貸的杠杆，並且加強對土地的管理，土地要首先保障保障性用房，對於投機的土地使用要嚴加管理。”



鑒於近幾年的實際情況，雖然中央多次施行宏觀調控政策，命令全國各地遏止房地產不斷狂升，但是幾乎全無效果。重要原因是各級黨政經官員，利用國家大印鈔票引發通貨膨脹之際，給予地產商貸款買地炒作而從中謀利。地方政府對中央有關政策陽奉陰違，不切實執行。今後能否改變局面，實成疑問。

重慶模式治標的努力

青岩

最近幾年，重慶模式成為大眾傳媒的焦點，比如‘唱紅打黑’，據2010年9月《重慶日報》報導，重慶“打黑”共摧毀14個重大黑社會性質組織，立案偵辦涉黑涉惡團夥364個，查扣涉案資產29億元。現在則有‘民生工程’。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之元，現任重慶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助理（掛職）撰文‘重慶“十大民生工程”的政治經濟學’指出重慶模式的特點乃‘國資增值與藏富於民並進’與“地票交易促進城鄉統籌發展”。

重慶自1997年成為直轄市，人口3300多萬，70%-80%為農村人口。2010年6月，重慶市委三屆七次全委會審議通過了‘中共重慶市委關於做好當前民生工作的決定’，打出‘五大重慶’口號：‘宜居重慶、暢通重慶、森林重慶、平安重慶、健康重慶’。

國資增值與藏富於民

從2002年到2008年6月底，重慶市屬經營性國有資產從1700億增長到7000億，增加4倍，2009年，已經突破9000億元，今年超過萬億元。2002年至2008年間，全國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的工業產值增長率是3.7%，而重慶的增長率是19%。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強調，要通過國有資本對社會資本的影響力和帶動力，實現國有資產的增值，從而有經營性收益上交，使政府有能力減稅，促進民營經濟發展。重慶的具體做法有三：一是對市屬8大國有投資集團‘五大注資’，即國債注資、土地儲備收益注資、存量資產注資、規費注資、稅收返還注資，從而增加國有企業的淨資本金，加大融資能力；二是財政局對國有投資集團的融資活動不擔保，各大投資集團之間也互不擔保，集團內規費資金專款專用、不交叉混用的“三個不”；三是投資集團資產

負債、現金流、投入與資金來源實現“三大平衡”。

崔之元認為，“五大注資”說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國有經濟，不是國家行政權力任意干預的經濟，而是國有淨資本在市場經濟中運營增值的經濟。舉例建設道路，邀請民營資本或外資搞BT(Build and Transfer，建設後再轉讓)，然後重慶國投公司盡快回購，因為路一旦建成，土地收益就上漲，重慶國投公司就有了來自公有土地增值的資本金注入。2004年，重慶修建朝天門長江大橋，3年後重慶城投就回購，因為朝天門長江大橋周圍7000多畝土地已經進入城投的土地儲備。黃奇帆副市長還把公益性國有投資公司的稅收返還，進一步壯大國有淨資產。

2002年底重慶有1000多家國有企業，欠工商銀行157億貸款。2004年，黃奇帆牽頭組織渝富公司與工商銀行協商，重慶市屬國有企業渝富公司以帳面價值的20%一次性買下壞賬，渝富公司接手重慶國有企業的壞賬。還有接下私營企業的爛攤子，例如重組“西南證券”，參與重組的國資和民營資本都實現了增值。

重慶從國家2009年1-5月5萬億元新增貸款拿到了1500億元。重慶市不用政府財政擔保，而是通過政策增加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資本金，提高向銀行的融資能力。另外，西部12個省市的西部大開發優惠政策之一是企業只征15%的所得稅，目前只有重慶還在使用15%的稅率，其他省市由於地方財政壓力放棄優惠，仍然徵收33%的企業所得稅。

重慶引進惠普、宏碁、英業達、富士康等一批國際IT企業，2015年將形成8000萬台產能、7000億元產值、1000億美元進出口的筆記型電腦產業基地。市政府每年將投入3億元，扶持微型

企業發展。

城市規劃列出一系列目標：高速公路通車里程提高到3000公里；鐵路運營里程提高到2300公里，基本實現“8小時出海”；市內軌道交通通車里程提高到200公里，貫通主城9區，要用輕軌將新建的主要公租房片區連接起來。

準備出臺解決‘微型企業’（“大學生”、“殘疾人”和“下崗職工”的創業）的資本金問題的重大政策：如果原始創業者投入的資本金是10萬元，政府就給予10萬元的稅賦補助；如果投入的資本金是100萬元，就給予100萬元的稅賦補助；上限為500萬元。同時，採取措施發展6種非銀行信貸業務，包括擔保公司、小額貸款、私募股權基金（PE）、信託、風險投資和金融租賃。2010年1到4月，重慶中小企業貸款餘額增長80多億元，在全國增長率是比較高的。

重慶市市長黃奇帆說，必須嚴格控制國有土地出讓價格，降低商品房成本，經濟適用房地土地出讓價不超過房價的1/6，中低檔商品房地價不超過房價的1/5，高級商品房地價不得高於房價的1/3，即嚴格限制地價不能超過房價的1/3。全國多數城市購房的契稅是3%至5%時，重慶購房的契稅一直保持在1.5%。重慶市居民第一次買房時，貸款可以抵扣地方所得稅。2009年上半年的資料顯示，重慶主城區買房的人當中，42.5%購房者來自重慶四十郊區縣。



美國《紐約時報》前總編揚言在重慶看到‘延安精神’：將1000萬農民工轉城市戶口，又建設3000萬平米公租房，比如“民心佳園”，租給中低收入居民、進城農民工和剛畢業的大學生，租金比市場價格至少低40%。一萬多所中小學、幼稚園配備了5500多名校警，確保518萬名學生的人身安全；中小學塑膠跑道從過去的260多條增至1000多條，一周體育課從2節增加到4節；修建了70多條登山步道；外出務工的農民留在農村的老人和孩子，得到政府悉心照顧；對廣大低收入群眾實行基本醫療藥品零利潤。

引起爭議的地票交易

重慶形成三軌並行的土地供給架構：國家下達的建設用地指標，用於國家重點項目用地、工業用地和公益性建設用地；國家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的增量指標，用於滿足各區縣縣域經濟發展；地票指標則用於主城區經營性用地，主要是房地產開發。其中以‘地票’最具爭議。

2011年第02期《財經》姚佳威撰文‘重慶“地票”繼續試’梳理‘地票’的來源。“地票”概念從重慶發端，是指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包括農村宅基地及其附屬設施用地、鄉鎮企業用地、農村公共設施和農村公益事業用地等，經過復墾與驗收後所產生的可交易和轉讓的用地指標。

黃奇帆認為以交易所為平臺進行置換買賣，如同股票，又以土地為對象，就叫“地票”。2008年8月，國土資源部與重慶市政府簽訂戰略合作協定，支持重慶探索土地利用新機制和耕地保護新模式，支援重慶設立農村土地交易所。10月，黃奇帆在向重慶高校和學術研究機構報告時，首次在公開場合提出“地票”概念。12月4日，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為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掛牌，中國史上首個農村土地交易所正式成立。該交易所由重慶市政府出資設立，註冊資金5000萬元。同日，中國第一張含300

畝土地的地票，以2680萬元的價格，被一家私企拍走。自2008年底第一次地票交易會後，重慶地票價格維持在8萬元左右。地票誕生之初的幾筆交易中，市政府土地儲備中心購買了約一半的地票，而用地大戶——房地產企業購買地票則只占成交總量的五分之一。

2010年8月後，重慶主城區商業開發用地招拍掛，參與企業必須持有地票才能入場。地票價格旋即上漲，目前每畝地票可在土交所拍到17萬元，交易量也逐漸增加。截至2010年10月，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共組織18場地票交易，成交面積3.47萬畝，成交金額43.31億元。已有27宗地票6269.5畝獲征（轉）用批復，主要在九龍坡、渝北、大渡口、南岸和江津地區落地。在符合規劃的前提下，均可在主城區和其他區縣“落地”。此前，重慶最偏遠、經濟不發達的城口縣，建設用地指標價格每畝僅2萬—3萬元，而在交易所拍賣後，目前最高可達17萬元，溢價八倍有餘。企業在農村土地交易所拍得地票並選定土地後，仍需經公開招拍掛程式，與其他企業競標。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與有關銀行簽訂了地票質押合作協定，重慶嶺尚農業發展有限公司以購買300畝地票作質押，獲得了銀行提供的總額3000萬元人民幣貸款。

重慶市政府於2010年9月出臺文件，嚴令地票收入必須全部反哺三農，其中85%歸農民個人，15%歸村集體，用於農村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農民社會福利。可是，當前全國土地炒作之風難以壓制，重慶也不例外，地票之出現似乎無補於事。

根據2010年12月03日〈重慶晨報〉，11月30日，市土地交易中心推出大學城兩宗土地進行拍賣，一塊面積299.3畝，一塊255畝。新鷗鵬、金科、華潤、北京城建、名流等13家企業爭搶。土地競拍起價為3.4億元，最終新鷗鵬以9.7億元成交，每畝324萬元，樓面地價2600多元/平方米，創大學城新高。

11月，保億以6.4億元競得蔡家組團227.56畝土地，福建中庚也以3.9億元在蔡家拿地291畝，和黃以13.1億元拿下照母山山腳下地塊，喜地山在江北嘴拿下黃金地塊。中冶、香港置地等企業也紛紛在主城拿地。

中國指數研究院的統計資料顯示，截至2010年11月22日，上海、北京、大連等城市土地交易量排至前十名。上海土地出讓收入以1369.94億元高居榜首，北京以1004.48億元位列第二，重慶則以326.14億元位居第十位。北京住宅用地每平方米同比增長56%；商業辦公用地均價增長100%。大連的土地價格今年更是一路飆升，住宅用地均價暴增237%，商業用地均價暴增314%。

國土資源部黨組成員、總規劃師胡存智明確指出，“地票交易，全國就重慶一個地方試驗。”可是，成都首次面向開發商的農村建設用地指標交易所突然被國土資源部叫停。據悉，之前成都地票交易火爆，導致“抬高土地價格”的連鎖反應。2010年12月17日，成都市面向開發商的首場“地票”拍賣在成都農村產權交易所開場，179家開發商（包括保利、萬科等外地大開發商，也包括中石油等主業非地產的大國企）參與2000畝建設用地指標的競拍，結果成交均價72.89萬元/畝，總價14.578億元，溢價率達385.93%，是起拍價（每畝15萬元）的近5倍。

未來兩年至三年，重慶全市約有45萬戶農民由小村落集中到大村落居住，將節約建設用地41.3萬畝。到2020年，隨著重慶1000萬農民轉戶進城，將節約建設用地指標260萬畝。將來，這也許又成為各大地產商爭奪的‘獵物’。

“世界工廠”心臟裏的工人之春

丹尼爾·薩拜

自 2010 年 5 月和 6 月以來，一系列的衝突和罷工影響了中國的一大批製造工廠。這個國家的勞動力是世界上最大的（估計約有 3 億人），代表一個巨大的市場，勞資糾紛相當頻繁，不過這些糾紛很少得到西方媒體的關注。根據官方的中文雜誌“瞭望週刊”的說法，2008 年的勞資糾紛有 28 萬起，2009 年上半年，與過去同期相比，糾紛增加了 30%。對五、六月份衝突的新注意，無疑不是偶然的。這些衝突可能是指標性的變化，需要加以分析。



罷工浪潮開始於佛山的本田工廠。儘管解雇了罷工領導人，還試圖分化罷工領導層，在為期兩周的衝突中，本田工人仍然團結一致。在這家工廠裏，80%的工人是技工學校的實習

學生，承擔一個“集體”的雇傭合約。他們不受勞動法的保障，工資遠遠低於普通工人。

衝突是 1980 年以後出生的那些學生發起的，這些人沒有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罷工顯示了他們維護人性尊嚴，訴求體面工作條件的決心。以公司的利益和等級觀念為名，犧牲人的生活，讓人接受最壞的不公正，這已是非常清楚的事了。他們毫不遲疑地曝露了一個增長模型，該模型基於廉價勞動力，基於對勞動力的劇烈剝削，而且也缺乏任何正派意識，這些公司支付非常低的工資而牟取暴利。在同一時間，由臺灣資本開辦的富士康工廠出現自殺浪潮，這是一家電子巨頭，向戴爾，蘋果，惠普供應組件，自殺浪潮凸現了在這些組織得像監獄的工廠裏的工人的嚴苛待遇。

正是這種鐵的紀律與低工資的結合，誘惑著跨國公司，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一個類似於流放地的工廠。在一個前所未有的事件中，不像通常的中國勞資衝突的情況那樣，本田的青年工人動員起來，並不是要求支付他們的工資或行使他們自己的權利，而是要獲得真正的工資增加。他們要求立即在基本工資的基礎上，大幅提高 800 元，這不包括加班費，還有每年增加至少 15% 的工資。這次罷工迫使本田在該國停產數天，因衝突造成零件短缺。本田不得不同罷工工人指定的代表談判，接受工資的顯著增加和改善工作條件。

佛山本田工人的勝利，是工人階級鬥爭性的一個有力的例子。在此之後，本田，豐田，三美電機，日本板玻璃，阿茲米特汽配（Atsumitec）及其他附屬公司都受到勞資衝突的影響，被迫讓步接受工資的增加，向各種衝突的主要要求讓步。報章報導說，一些公司，甚至省級當局不等可能的衝突出現，就提高員工的工資！

憤怒的葡萄

這些工資要求並不令人吃驚。在勞動力的最低水準上，大約有 1.3 億逃離農村貧困的移民人口。這個人口為企業和跨國公司提供了非熟練勞動力，這些企業坐落在中國大製造業城市，如廣州，深圳，蘇州，或在如上海和北京這樣的城市中心，在那裏他們組成建築行業。由於戶口（居留證）制度，農民工不被當局認定為城市工人。因此，他們是脆弱的，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國家是“無證”者。他們不能獲得公共服務，因此沒有最低的社會保障。他們的子女沒有資格上公立學校就學。據農業部的說法，他們目前的平均收入為每月 1348 元，不到 200 美元。這不足以彌補通貨膨脹，儘管每年增長 10-15%，工資仍然特別低。

中國工人目睹的是，豪華商場數目的激增，只是為了滿足約 3 億人口的中產階級的炫耀性消費，更別提暴發戶和官員了。然而，這個巨大的經濟增長卻讓工人們受益很少。社會不平等現象日益加劇，城鄉之間的不平等加劇得尤其厲害。經濟研究表明，1995 年至 2004 年之間，大公司的勞動“成本”增加了三倍，但在同一時間生產率增加了五倍，導致單位勞工成本減少了 43% [1]。為了進一步說明這一點，請注意，勞工收入比例在 15 年內下降了 10%，導致了家庭消費的下降。因此，目前的工資增長，只是個開始，重新平衡國民收入比例，拉回勞工收入的份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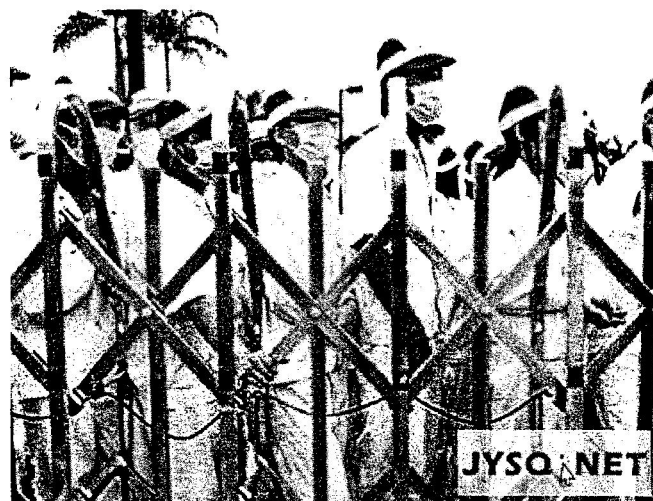
世界工廠與超級市場

從當局的角度來看，有兩個原因歡迎這些工資的增長。首先，政府希望復蘇國內消費，以抵消出口放緩。此外，工資的增長也意味著生活條件的改善，這對於維護政治穩定是有意義的。近幾個月的工人鬥爭發生在國外公司，主要是日本公司中。這讓政府暗示，外國公司應對工人階級的憤怒負責，同時加強民族主義情緒。

事實上，政府從大跨國公司的讓步中獲得的收益多於鎮壓工人的鬥爭。它並不真的擔心衝突和工資上漲將令該國的吸引力打折。在中國，即便是高度出口導向型的公司，工資成本

也並非判別外國公司投資的唯一理由。在印尼，泰國，菲律賓，越南，每月的平均工資現在低於中國的每月工資[2]。但比較之下，這些國家的勞動力儲備相當有限。此外，所有公司都可以輕易搬遷。例如，護理，鋼鐵和化工企業就是這個情況。對於大多數公司來說，因為遭遇危機的西方國家的消費停滯，投資的主要理由，在於增長的國內市場的巨大性。隨著工資的增加，市場應該更加有利可圖的。沒有投資者不知道這個事實。

增加的勞動力“成本”，增加的衝突，促使大型跨國公司在中國境內“搬遷”工廠，而不是向國外遷移。公司更願意離開沿海地區轉向內陸地區，那裏的土地和工資便宜得多。這種產業重組可讓他們克服沿海工業區的勞動力枯竭的困難，勞動力枯竭是勞動力市場的地區分裂的結果。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鄧曲恒和北京師範大學的李施估計，尚有 7000 萬農民工待業。但戶口制度，以及擔心如果不維持土地就會失去它，這樣的盤算，阻礙了他們去沿海城市尋找工作。此外，中國人口正在老化。六分之一的非農民工說，他們年紀太大，難以離鄉背井，即使他們還不到 40 歲[3]。



工人的權利加強

更新了的工人階級戰鬥性，通過春季鬥爭的勝利得到了加強，這也有可能得力於新的勞動法。2008 年 1 月 1 日推出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是“十多年來，勞動法制定中

最重要的一個。”[4]。主要目標之一，是限制用解雇和不支付工資的手段虐待員工的作法。政府意識到，圍繞這些問題，工人鬥爭動力可以是很危險的。政府也希望讓工人得到好一些的保護，允許企業的高營業額有所下降。在80年代和90年代，當員工不滿意自己的工資或工作條件時，他們只能離開公司，去別處尋找工作。他們沒有其他選擇，因為國家會鎮壓，阻止在工作場所的任何集體組織。官方工會回避鬥爭。隨著在沿海地區勞動力的減少，人口老齡化，以及更高素質的勞動力的出現，主管部門和企業需要一個穩定的勞動力，他們的要求的影響更深遠。

年輕農民工最受益於新的法律，可能是因為他們能從互聯網獲得更多的資訊。在影響了日本企業的鬥爭中發現他們的身影，也就不足為奇了。這些年輕人受到過更好的教育，並分配到需要更多技能的工作。一個世界把他們同其仍然在農村的父母分開。這些年輕的工人，都是獨生子，渴望在大城市中的體面生活，以他們的工資，這是不可能實現的。這就是為什麼最近幾個月的工人的勝利，將可能對社會狀況產生重要影響。政府的賭注是，高工資將緩解社會緊張關係。但春季和夏季的罷工可能會蔓延，這不是不可能的。

更何況，在最引人注目的有關本田工廠的鬥爭事實之一，罷工者明確地拒絕官方工會，後者被中國共產黨的“全國總工會”（ACFTU）控制。那些代表受到了廣泛的非議，他們用暴力行動反對工人的鬥爭，同管理層一起阻斷罷工。至少在三個本田工廠，罷工工人要求選出自己的代表和重組工會的權利，這對“全國總工會”（ACFTU）的代表是個冒犯。相反，這些“工會”有系統地站在了老闆一邊，被證明是員警的幫兇。在這些特別困難的情況下，本田工人的自我組織能力是一個了不起的壯舉。這些形式的自我組織促進了一個新的工人階級覺悟的發展。

衝突的擴散，集中在經濟領域，但當局一直關注這種情況轉化為一個廣泛的政治挑戰的可能性。本田工廠的罷工經驗表明，在未來，政府通過一個單一的聲名狼藉的工會控制鬥爭，將會更加困難。新一代的工人已經表明，他們準備組織團結起來，要求獲得經濟增長成果的真正部分。中國工人階級不是軟弱的，已經能夠顯示其實力和鬥志。值得注意的是，在孟加拉，越南和柬埔寨，類似的爭取工資增長的鬥爭，在最近幾個月有發展。貧窮不再是不可避免的。

丹尼爾·薩拜是第四國際駐亞洲記者。



注釋

[1] 陳女士，世界大企業聯合會的巴特·范·阿克以及一橋大學的亨利·吳所作的研究，“未來中國”，《經濟學人》。

[2] 巴塔·派翠克和亞歷克斯·弗朗哥斯，“東南亞嘗試連接起來參與競爭”，《華爾街日報》。

[3] “未來中國”，《經濟學人》。

[4] 貝克爾·傑佛瑞和厄爾斯特隆·曼弗雷德。《國際勞工權利論壇：中國的勞動合同法對工人的影響》，中國勞動網出版。

中國在拉美的利益是什麼？

佛吉尼亞·德·拉·斯俄伽



拉丁美洲政區圖

近3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PRC）一直緩慢而穩步地顯現為世界強權。它已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僅次於美國和日本，並且超過德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出口國。中國也不再是低附加值製造者，低技術專案的加工者：它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風力渦輪機和太陽能板的生產商，去年全年的汽車銷量翻了一番，每個月的汽車銷量超過1百萬輛，已經超過了美國。

如果再加上：中國有世界上第三大的國防預算以及最大的全國人口（13億人），立刻很明顯的就是：中國沒有足夠的石油，天然氣，鋁，銅或鐵來滿足其能源和製造的需求，這就有必要讓其貿易夥伴維持其增長。

中國也是世界政治舞臺上的重要角色。除了在亞洲地緣政治上的戰略作用以及作為一個核國家的地位以外，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成員，

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發展中國家的77國集團成員，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成員和美洲開發銀行成員。中國還在美洲國家組織（OAS）有觀察員的地位並在海地保持維和部隊。

此外，中國已開始顯示出成為一個努力擴張國家的第一要素。中國加強了其在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在非洲，拉美，東南亞等地區的外交存在和經濟影響力，這些通常被稱為“軟力量”。中國資助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和自然資源開發項目，協助執行這些計畫，而且支持國營企業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通過這些做法，中國試圖獲取國際的善意。如果從發展基金方面看，中國是全球援助一個相對較小的來源，如果考慮到商業和優惠貸款，技術援助，國家贊助或資助的投資，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成了經濟援助的一個主要來源。[1]

如果中國在非洲扮演的角色備受關注的話，那麼中國在拉丁美洲扮演的角色則沒有引起那麼多注意。然而，自2004年11月以來，中國和拉美之間的雙邊貿易不斷顯著地擴大，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承諾將在該地區投資1000億美元。

據中國商務部的資料，中國的投資，從1975年的每年2億美元升到了2006年的700.2億美元，預期在2010年達到1000億美元。[2] 即使在該地區中國的貿易額要遠遠少於美國（5600億美元）或歐盟（2500億美元），但其趨勢很重要。中華人民共和國給予該地區的一個重要信號，是2008年11月5日，它首次發佈的關於拉美的政策檔。貿易和投資關係還輔以其他的接觸，包括政治，文化，貿易和軍事官員組成的高級代表團，以及上述拉美機構的中國參與。

中國在拉丁美洲的雙重戰略

中國確定了兩個拉丁美洲戰略。第一戰略是經濟：確保中國能涉足原材料領域，這是它經濟增長所需要的，再就是找到其製成品市場。第二個戰略主要是政治上的：要得到那些仍然承認臺灣代表中國政府的國家的外交承認。

阿根廷，玻利維亞，巴西，智利，厄瓜多爾，墨西哥，巴拿馬，秘魯，委內瑞拉和古巴在第一戰略上扮演主要角色。

巴西是該地區的第一經濟體，作為中國商品市場和原料來源的兩方面，它顯然都是中國最重要的合作夥伴。巴西供應的大豆，約占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口大豆的45%，它也是其他農業產品以及鐵礦和石油的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些部門同巴西開啓了幾個大合作專案。巴西作為一個中等收入的大國地位，也使得它成為中國商品的重要市場，其商品包括電子，機械和勞力密集工業製成品，如鞋類和玩具。巴西擁有核工業和鈾資源，鈾對於中國很重要，因為它要擴大自己的核工業，以滿足其能源需求。巴西航空工業創造了與中國多方面的合作，包括技術。

全球經濟衰退，加強和擴大了中國對巴西的重要性。雖然2009年第一季度，巴西向美國的出口下降了37.8%，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口卻增長了62.7%。因此，在2009年上半年，中國成為巴西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巴西有開發新發現的坎波斯和桑托斯盆地的深水石油儲備的計畫，中國也成為了這些專案融資的關鍵。2009年5月，中國和巴西簽署了協議，由中國開發銀行發放貸款100億美元給巴西石油公司，巴西石油公司總裁塞爾吉奧·加布里埃利指出，“在美國政府裏沒有人會同我們坐下來談，就像我們和中國人那樣進行討論”。[3] 根據這項協定，用貸款換取未來10年獲得一個石油的保證供應。這兩個國家也在謀求一系列重要的合資開發計畫，包括聯合生產飛機，中國和巴西地球研究衛星（CBERS）計畫以及其他空間合作計畫。

正如巴西情況一樣，中國關於阿根廷——另一個南美大型經濟體的經濟政策，並非只限於購買自然資源。阿根廷與中國在空間專案上合作，如阿根廷聖胡安大學的衛星鐳射測距工程，並討論了在設計新一代核反應爐方面的合作。

然而，中國的主要利益在於阿根廷的採礦和石油行業。2003年，中石油（中國石油公司）獲得了阿根廷的石油和天然氣公司阿根廷石油公司的股份，經營阿根廷北部和秘魯的油田，而且那裏已經有中國-安哥拉公司（Sonogol）的投資。2010年5月，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CNOOC）用31億美元收購了阿根廷Bridas能源控股公司的百分之五十股份。也有傳聞，西班牙公司雷普索爾-YPF公司和中海油就雷普索爾-YPF公司的阿根廷股份在進行談判，雖然提出的可能性中尚無任何一項付諸實現。

美國懷疑地看待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阿根廷商業的金融交易。2009年3月，中國與阿根廷簽署了102億美元的債務互換協議[4]，美國政府認為，那是對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美元的主要地位的不斷擴大的挑戰。[5] 必須指出的是，巴西總統盧拉在2009年5月訪問中國期間，明確主張與中國齊心合力撇開美元。[6]

中華人民共和國還爭取阿根廷作為其生產商品的購買者，但此處，這種關係有相當的矛盾，原因是阿根廷計畫重建一些產業部門。

對於三個拉美亞太經合組織成員（APEC）中的兩個，秘魯和智利，中國已成為一個重要的貿易夥伴。根據聯合國的資料，2007年智利有近40%的出口前往亞太地區，主要是中國。對秘魯來說，這個數字是19%。這使得哥倫比亞和哥斯大黎加這樣的國家也想加入亞太經合組織。

中華人民共和國投資了秘魯石油和天然氣部門。中國已經購買了捕魚船隊和魚粉加工設施，並已在托羅莫喬，裏奧布蘭科和馬拉康納礦山做了投資。如果我們考慮到秘魯對中國的出口中有85.2%是銅，魚粉和鐵礦石，這就毫不

奇怪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玻利維亞的興趣是天然氣和鐵礦資源。玻利維亞擁有南美洲第二大天然氣儲量，僅次於委內瑞拉。玻利維亞缺乏入海口，這是個問題，但新煉油技術的引進，例如液化天然氣或把它用於其他燃料的生產，這將增加玻利維亞天然氣出口到中國的可行性。莫拉萊斯已開啓了一些可能性，以便擴大中國在該國的存在：已簽署了給中國企業集團山東魯能的一個特許協議，授權他們發展俄爾穆通地區的全部或部分鐵礦 --- 如果不是世界最大的，也是世界最大鐵礦之一；另外，中國石油公司已簽署協議，幫助玻利維亞石油公司（YPFB）克服資本困難和石油國有化帶來的一些經驗問題。

在厄瓜多爾的投資也很巨大，而且有外交的影響。中國已投資油田，港口運作和油管設施。2003年，中國標到厄瓜多爾主要油田的特許開採權。中油集團的石油運營，已造成了同塔拉帕厄（Tarapoa）和素空比歐斯（Succumbios）兩地土著居民的嚴重問題，特別是由於中國的投資不顧環境保護。厄瓜多爾的科雷亞政權決定不延長讓美國使用曼塔機場的協議，這是邀請中國把該機場發展成爲一個跨太平洋航線樞紐機場的必要第一步，儘管中國從來沒有作出任何明確的建議。

中國還向一些國有石油和礦產採掘公司做了投資，作合資開發，如委內瑞拉國營石油公司（委內瑞拉），玻利維亞石油公司（玻利維亞），巴西國家石油公司（巴西）和Cubaniquel（古巴）。

巴拿馬由於其戰略地位情況則稍有不同。巴拿馬初級產品的出口，或其進口市場的潛力是微小的。不過，由於巴拿馬擁有運河，它對中國有巨大的戰略價值。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記黃埔有限公司，據稱與中國解放軍（PLA）有聯繫，擁有巴拿馬運河兩端的地產，讓它能見到通過運河的軍事和商業運輸，並且這個戰略檢查

點，有可能用作爲一個臨時區域，在未來控制過河的交通。

中國的政治戰略影響主要是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在這裏，中國主要集中於運用經濟和外交杠杆，取得那些仍然承認臺灣是中國政府的國家的外交承認。在仍然承認臺灣的剩餘23國家中，有11個在這一地區。到目前爲止，哥斯大黎加是唯一在2007年改變結盟的國家，並已因此獲得獎勵：胡錦濤在2008年訪問哥斯大黎加，爲中華人民共和國捐贈的一個新足球場奠基。

誰獲得利益？

中國與拉美的關係並不是所有合作夥伴雙贏的關係。截至2005年，拉美國家與中國貿易盈餘關係已被扭轉。如今，中國對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出口中，93%是製成品（25%的紡織品和成衣，44%機器和設備）。對大多數發展自己地方產業的先進拉美經濟體，這是負面影響，並開始製造問題。

墨西哥是拉丁美洲的第三個亞太經合組織成員，特別受到影響，主要有兩個原因：它與美國經濟的密切聯繫，以及中國和墨西哥之間的出口重疊。在墨西哥的20個主要出口行業中，有12個與中國公開競爭。這不僅降低了墨西哥向中國的出口率，使其只有其總出口的3%左右，而且也影響了其與美國的貿易關係。2003年，中國取代墨西哥，成爲對美國的第二大出口國。隨著同中國貿易的280億美元的赤字，也難怪，墨西哥政府希望重新檢討貿易協定。一位墨西哥政府官員抱怨說，“墨西哥進口每30美元的中國商品，只有1美元的墨西哥商品出口到中國。”

中美洲紡織工業也碰到同樣的事情，中國紡織品的出口目前正在窒息中美洲紡織業。

與拉美最大經濟體關係緊張的另一個例子，是同阿根廷的關係。阿根廷出口到中國的大豆，占其全部進口大豆的23%。中國已暫停200多萬噸豆油的訂單，其中一部分在運輸途中，因爲阿根廷決定對從中國進口的鞋徵稅，作爲

保護當地生產者的一項措施。在2009年，阿根廷與中國的商業貿易赤字達到12億美元，而且2010年的頭兩個月，已經達到6億美元。阿根廷政府不願意讓它增加。當列強的“商業權利”受到不知天高地厚的新興國家的影響時，中國的反應同其他帝國主義列強並無不同。

基本上，拉美各國政府發現中國投資有兩個問題：1）其主要目的是為中國發展的需要服務，促進原材料出口，往往對投資專案的重要部分施加要求，要求在中國處理那些材料和服務，2）他們已經發現，中國在該地區的直接外國投資的水準並不像看起來那樣高，官方數字中的多半去了避稅天堂。

顯然，拉美與中國的貿易促進了該地區商品出口部門的繁榮，如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魯和委內瑞拉，同時，由於中國商品的擴張競爭，拉丁美洲製造業部門受到嚴重的挫傷。在有大型製造業和有限的初級產品出口部門的國家和地區，如墨西哥和中美洲，這種情況尤其糟糕。

中國：美國後院的新孩子

中國是否要替換該地區的老大美國？這遠非實情。到目前為止，中國已明確表明，其主要的關注是不破壞中美關係，從戰略角度和經濟角度考慮，這個關係都最為重要。最多，中共願意佔據美國可能留下的空間。最強的拉美經濟體一直在試圖從中國政策引起的權力三角中獲利，碰著不同的運氣。

中國小心不越過美國，這個擔心也影響到它同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尤其是同古巴的關係。中國與委內瑞拉簽署了軍事協定，但這不應被看作是對玻利瓦爾省政權的完全支持。即使中國已經與委內瑞拉簽署了廣泛的軍事合作協定，但它這樣做是不情願的，受到其石油需要的逼迫。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不願意填補委內瑞拉在政治和軍事上與美國關係惡化而造成的間隙。委內瑞拉政府對一些中

國公司，比如中石油的運作已經感到不快，這個事實表明，兩國之間的關係並非沒有矛盾。

與委內瑞拉相比，它與古巴的關係略有不同。儘管中國的外交政策是務實的，但還是有一些意識形態因素在起作用。經濟關係更密切，在古巴的貿易合作夥伴中，中國排在西班牙前面，僅次於委內瑞拉。在提升古巴防空系統方面，中國也扮演了關鍵角色，它還經常交換訪問高級中國軍事代表團。古巴還向中國提供戰略物資和農產品。除了糖，古巴也有近海石油和世界上已探明的最大鎳礦儲量。2005年1月，中國的石油和天然氣巨頭中石化公司與古巴國營公司古巴石油（Cupet）簽署了一項共同在島內生產石油的協議。然而，雙方的關係也不是沒有問題的。古巴鎳礦（Cubaniquel）與中國五礦（MinMetals）簽署了一個5億美元的合資開發協議，要在古巴東部，每年生產68000噸的鎳鐵礦，這個協議突然被取消，轉而特許給委內瑞拉。

結論

中國和拉丁美洲間的關係，在未來將如何的發展，這是一個猜測的問題，雖然某些趨勢已經明確。

- ▶ 中國並沒有意願損害它與美國的經濟政治戰略關係。與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和古巴政府的關係主要限於商業協議，已被證明只是利益性的。
- ▶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拉丁美洲之間的關係，由於前者的經濟潛力和後者的有限經濟，是不平等的合作夥伴。這是同那些新興經濟體衝突不斷的一個根源，如墨西哥和阿根廷，它們有計劃發展一個獨立的行業，對中國出口設置障礙，捍衛本國製造商。
- ▶ 另一個與中國投資產生衝突的根源是，中國的直接投資尋求高水準的回報，卻無視社會，勞工或環境條件。這已經在厄瓜多爾，秘魯，委內瑞拉和阿根廷製造了同當地居民的衝突。

2005年以來，中國在拉丁美洲能源和商品部門的投資大事記：

2005年1月：中國石油和天然氣巨頭中石化公司與古巴國營公司古巴石油（Cupet）簽署在加勒比島國合作生產石油的協議。中國國有企業中國五金礦投資5億美元，合資在古巴東部每年生產68,000噸的鎳鐵。

2005年2月：中國五金礦集團與智利國家銅公司（Codelco）簽署了一項協定，初期投資5.5億美元，最終可能達到20億美元的投資，做合資開發。

2005年9月

－中國的勝利國際石油開發有限責任公司與國營玻利維亞國家石油公司（Yacimientos Petroliferos Fiscales Bolivianos）簽署了框架協議，在40年期間，向玻利維亞的陸上石油和天然氣行業投資15億美元。

－中國為首的安第斯石油財團，其中包括中國石油公司和中石化集團，用14.2億美元購買加拿大的加拿大能源公司在厄瓜多爾的石油和管道資產。

2007年6月：總部設在加拿大的公司說，按照現金8.4億加拿大元（7.92億美元）的友好協定，秘魯銅業公司同意由國有的中國鋁業公司收購。

2009年5月：中國開發銀行宣佈，將提供100億美元的貸款給國有的巴西石油公司，作為交換，中國可獲得在未來10年的石油供應保證。

2009年7月：中國同歐佩克成員國南美的厄瓜多爾達成了一個10億美元貸款換石油的計畫。

2009年9月：委內瑞拉與中國簽署了三年的160億美元的投資協定，在歐佩克成員國的奧里諾科河地帶，每天提取幾十萬桶的石油產量。

2009年10月：中國鋼鐵和鐵礦石寶鋼集團擬支付10億英鎊（約合16億美元），購買在巴西的英美資源集團的巨大米納斯里約熱內盧鐵礦山的百分之三十股份。

2010年3月：中海油用31億美元購買了阿根廷的Bridas控股公司的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 佛吉尼亞·德·拉·斯俄伽是法國新反資本主義黨（NPA, New Anti-Capitalist Party of France）全國領導層成員和國際委員會。

衛眾譯自2010年6月《國際觀點》第425期

注釋

[1] 在非洲，拉丁美洲和東南亞的中國援助和政府贊助的投資活動，提交給國會議員和委員會的（美國）國會報告，湯瑪斯·盧姆，2009年11月25。

[2] 拉丁商業紀事報，中國在拉丁美洲挖美國的牆腳，星期一，2007年6月4日。

[3] 華爾街日報，2009年5月18日。

[4] 國家報[阿根廷]，2009年3月31日。

[5] 全國日報[哥斯大黎加]，2009年3月31日

[6] 新華社，2009年5月22日。

棉蘭老革命工人黨（RPM-M）和菲律賓左派

皮埃爾·魯塞

在棉蘭老革命工人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我們已發表了一個報告[1]，還發出了一個團結一致的資訊，強調其經驗的國際利益[2]。現在，我們發表一篇文章，分析棉蘭老革命工人黨在菲律賓左派中原有的地位[3]。文章還簡要介紹了亞洲基本黨派之間國際聯繫的發展。



一個正在保護會議代表的棉蘭老革命工人黨（RPM/RPA）戰鬥員的裝備：一個附加在突擊步槍上的榴彈發射器。

去年八月革命工人黨舉行了第二次代表大會。它首先紮根於一個區域，在該區域中有棉蘭老島的“三個民族”共居，這是菲律賓左派原始地盤，這是一個激進的左派，其團結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革命工人黨（棉蘭老島）--- 或者用它的菲律賓語字母縮寫 RPM-M --- 在菲律賓舉行了代表大會，會議在一個遊擊隊營地召開，有幾十個戰士的保護。不是出於老式的浪漫主義，而是出於必要：其成員受到許多武裝組織的威脅。在這些條件下，不可能像在一個城市裏那樣，甚至在一個不顯眼的會議室，會見任何人；危險太大了。

在 RPM-M 于 2001 年成立的九年後，它舉行了第二次大會，地點在南部菲律賓群島中最大者棉蘭老島的大山中。正如其名稱所顯示的，它首先是“棉蘭老島”的黨：它活動在該國最軍事化的地區，這個地區的特點是政府和穆斯林武裝組織之間的長期衝突。在這裏我不是去回顧大會本身 --- 有關會議的情況，請讀者參考上述業已發表的報告，我想嘗試的是，在菲律賓左派中，構成革命工人黨（RPM-M）的源頭是什麼，做個解釋。

菲律賓共產黨的叛逆後代

該解釋的第一個要素見於菲律賓共產黨（CPP）的矛盾遺產裏。這個黨，是毛澤東主義黨，在 20 世紀 70 年代，它曾是唯一有能力組織反對總統馬科斯獨裁政權鬥爭的政黨。正因為如此，它深刻地標誌著整整一代活動分子。然而，在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它無法理解，一個獨裁政權會由大多數群眾的動員和少數軍事叛亂的新組合推翻，而不是像黨的領導所設想的那樣，是遊擊隊力量進攻的後果。

菲律賓共產黨（CPP）的遺產是非常矛盾的。它體現了一個偉大的革命激進的傳統，但也有相當官僚主義的傾向和做法。由於極度恐懼滲透，它經歷了可怕的內部整肅。儘管全面重估其經驗教訓變得迫切，可是其領導人卻拒絕在黨內舉行大會組織辯論，使許多人離開了黨，導致了 80，90 年代的幾次分裂。從那時起，黨展開了一場跨宗派的行動，極為過分，竟然暗殺其他左派運動的幹部。

當今菲律賓激進左派的多數，包括革命工人黨，都來自共產黨。他們都面臨著同樣的挑戰：要維護過去的革命傳統而又要深刻地修改繼承於菲律賓共產黨（CPP）的政治和綱領的概念。他們中間有一些已經比其他人更成功地應對了挑戰。革命工人黨是其中最成功的組織之一。

一個新的多元化左派

該解釋的第二個要素，在於菲律賓毛主義危機的形式。起初，有一個空間出現了，讓極少數的菲律賓馬克思主義左派，非毛主義者在其隊伍之外建立自己的存在，並擴大它們的聽眾。十年後，菲律賓共產黨（CPP）內部發生分裂。然而，在一個暗地行事的黨中，在缺乏全民層面上的辯論的情況下，四分五裂的情況產生了。除了許多成員個人的離開，還有菲律賓共產黨（CPP）的各個組織宣佈了他們的獨立。各個委員會（統一戰線等…）和秘書處（農民等…）就是這個情況，而且在北部，中部和南部的群島，重要的區域組織也是這樣的情形。

於是，常常出於地區歷史的原因，菲律賓共產黨（CPP）的危機產生了幾個革命組織。從那以後，產生了一些重組的嘗試（有些是目前正在進行者），但直到今天，若要瞭解什麼是菲律賓激進左派的各個組成部分，你必須知道他們來自哪里：哪個地區？來自什麼樣的活動支部？

棉蘭老革命工人黨（RPM-M）來自區域組織，該組織負責黨在棉蘭老中部的工作（因此它當時的名字是：中棉蘭老地區黨部或CMR）。1993年，該地區黨部整個同菲律賓共產黨（CPP）的領導決裂，接管它負責的所有組織：地下黨，遊擊隊（取名為人民革命軍RPA），群眾工作，合法組織…。中棉蘭老地區黨部（CMR）的本質特徵是棉蘭老島“三民十月評論 2010年第2/3期

族”之間的“鏈結”：菲律賓人的“多數民族”（簡稱“基督徒”），莫羅斯人（穆斯林）和魯瑪茲人（山區部落），後者仍然構成了棉蘭老革命工人黨（RPM-M）的主要社會基礎之一。

新一代的積極分子

該解釋的第三個要素是幾代積極分子之間的過渡問題。這在菲律賓成了一個挑戰，甚至比許多其他國家更甚。馬科斯獨裁統治在1986年被推翻了，但在馬科斯獨裁統治時期，“歷史性”的左派革命幹部的鬥爭環境，是今天的大多數活動分子從未經歷過的。棉蘭老革命工人黨（RPM-M）的大會表明，幾代人之間的這種過渡正在順利進行：新的全國領導層成員大多數是“年輕的”（在“後獨裁”的意義上）。

在菲律賓共產黨（CPP）和現今之間，組成棉蘭老革命工人黨（RPM-M）的潮流經歷了一個深刻的政治發展時期。國際主義者在尋求毛澤東主義的替代物時，它加入了第四國際，在那裏它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新的活動領域得到開拓，比如選舉領域。武裝鬥爭的觀念已經改變。“民主問題”已成為政黨活動關注的中心，成為社會運動和承認部族自決權運動的關注中心…。然而，棉蘭老革命工人黨（RPM-M）逃脫不了棉蘭老島局勢造成的限制。與政府的和平談判沒有取得成果。黨必須總是保護自己免於許多武裝威脅。因此，即使強調的是合法的群眾性活動，仍然存在著一個暗地行事的黨，它配備了具“防禦性”作用的遊擊部隊。

左派的不確定形勢

解釋的第四個要素，涉及到在整個群島的水準上組建政黨的困難。大多數菲律賓組織，

根據它們的起源，即使它們已經擴大了它們的政治網路，還是主要紮根於數量有限的省份和社會階層。棉蘭老革命工人黨（RPM-M）意識到這個問題，推動重組菲律賓共產黨（CPP）的其他地方組織。但是，這種融合是一個痛苦的失敗。現在是馬尼拉地區群眾力量黨（PLM）試圖重組的關頭，應當提出或將要提出同其他激進左派組織的團結問題，例如馬尼拉的工人黨（PM），起源于中呂宋的菲律賓馬克思列寧主義黨（MLPP）。

阿科巴彥（Akabayán）--- 公民行動黨 --- 一個合法的組織，已成為菲律賓左派的主要組成之一。共產黨裏從來沒有過像菲律賓社會主義者聯盟（Bisig）那種派系的影響力，在那裏，這些派系的影響是主導的，即使它也包括菲律賓共產黨的前黨員。在最近的總統選舉中，公民行動黨（Akabayán）支持艾奎諾三世，後者贏得了選舉。今天，它的一些幹部有一半的政府責任，雖然明知該新政權不會同精英們決裂。理論上，這種“共存”應很快地結束，一旦這個經驗過程發生，如果不是在黨內開啓一個危機，也會有削弱整個基本左派的風險。菲律賓的基本左派仍然是東南亞最重要的黨派，但過去的二十年，它已經失去了政治動機 --- 在相當程度上，是菲律賓共產黨的清理宗派行動造成的。沒有一個組織能夠獨自應對這種情況，團結的問題仍然尖銳。

菲律賓政治左派簡介

菲律賓左翼包括大量的組織和派系。簡單起見，我們把它們重新劃為三“族”。

共產黨：雖然變弱，但仍然是主要的地下組織，而武裝得最好。1993年分裂後，它著手處理宗派問題。結果產生了新人民軍（NPA），全國民主陣線（NDF）和重要的一“塊”合法力量被稱為“重申派”（RA），因為他們“重申”在1968年以及在菲律賓共產黨主要綱領十月評論 2010年第2/3期

性檔中所確定的方向的有效性。“重申派”已經選了議會成員。

拒絕派（RJ）：在菲律賓共產黨裏有一些派系，它們“拒絕”1968年路線，並要求重新評估黨的方向。他們在1993年分裂，常常把地下黨和合法選舉黨（或陣線）結合起來。在首都地區，分裂特別地產生了群眾力量黨（PLM）和工人黨（PM）；在米沙鄢群島出現了菲律賓革命工人黨（RPM-P）；在棉蘭老島中部地區產生了棉蘭老革命工人黨（RPM-M）。菲律賓馬克思列寧主義黨（MLPP）則來自呂宋島中部的一個後來的分裂結果。還有一些其他規模較小的組織，我們無法在這裏提及。

“獨立”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左翼

各種馬克思主義派系從來就不屬於共產黨。在1985-1986年，他們的大部分走到一起，組成了社會主義組織即菲律賓社會主義者聯盟（Bisig）。它的一些成員也來自菲律賓共產黨。今天，這一組織在合法的“公民行動”黨（Akabayán）中大起作用！“公民行動”黨（Akabayán）已有當選的議會議員。一個單一的框架，彙集了除菲律賓共產黨和“重申派”以外的所有的組織，這個框架就是：群眾鬥爭（LnM）聯盟，但目前這個聯盟缺乏動力。

亞洲鏈節

今天亞洲激進政黨之間的聯繫正在加強 --- 而且亞洲聯繫網路讓法國的新反資本主義黨獲益，該網路在相應地擴大。

馬尼拉國際研究和教育學院

從這個角度看，非常年輕的馬尼拉國際研究和教育學院的經驗是很有趣的。1982年，它在阿姆斯特丹的母院打開了大門，為各大

洲的積極分子組織開辦了教育課程。它剛剛看到了其亞洲的兩個後代的出生：首先在馬尼拉（菲律賓），然後更近一些，在伊斯蘭堡（巴基斯坦）。去年八月，馬尼拉國際研究和教育學院舉辦了第二次教育課程。我們住，吃和相聚在研究所的狹窄場所，甚至撤去桌椅，然後在地板上放上坐墊，以騰出空間，容納 22 名參加者和講師（其中一些人不能保持整三個星期的政治交流）。儘管有一些歐洲人在那裏（荷蘭人和法國人），但大多數出席者來自亞洲 8 個國家，其中除了菲律賓以外，有：日本，香港，臺灣，印尼，孟加拉，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由接近第四國際的活動分子安排，馬尼拉國際研究和教育學院向不同的亞洲左派開放。出席會議的組織來自不同的地方，包括 4 個菲律賓派系，他們應邀提供參加者或發言者。馬尼拉國際研究和教育學院從而有助於發展日漸增多的黨派之間的聯繫。一個比較長的教育課程保證了交流品質，這是短期會議做不到的。由於這些活動，一些彼此認識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組織開始進行合作，在一個共同的政治計畫中，合作得比過去更加密切。有一些組織，我們同其的關係仍是脆弱（比如印尼）的，或甚至還有這樣一些國家裏的組織，直到最近，同這些國家還沒有聯繫（比如孟加拉），這個會議也使得邀請這些組織變得可能。

政黨的地區網路

由於馬來西亞社會主義黨（PSM）--- 該國唯一重要的極左派組織 --- 的一項倡議，激進政黨的一個新的區域網路正在逐漸形成。它得益於亞太國際團結大會（APISC），該組織是由澳大利亞的民主社會主義黨（DSP）組織的，已有 10 年之久了。當民主社會主義黨（DSP）陷入危機，而且最終分

裂後，該大會失去了動力。新的網路正試圖不過多依賴唯一的一個國家組織的參與，以便更好地保證它能持久下去。

訪問巴黎

十月初，亞歐人民論壇（AEPF）在布魯塞爾開會。會議結束後，十個亞洲代表來到巴黎，以便對正在法國舉行的爭取社會權利的鬥爭，獲得第一手的印象。他們分別來自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他們能夠會見研究人員，會見反饑餓及求發展天主教委員會（CCFD），勒佈雷特中心，住房權組織（DAL），羅姆人和亞洲移民，國際團結專門資訊網路（Ritimo）和阿塔克（Attac）的積極分子，會見厄瑪烏慈善會和團結工會聯合會。最後，新反資本主義黨也有機會見他們。交流則更加有趣，因為法國“社會環境”非常熱鬧地吸引了許多國家的興趣，也因為在這以前，我們從來沒有會見過這些組織（印尼），或者還沒有機會在法國接待他們（馬來西亞，某些菲律賓人）。今天，新反資本主義黨或多或少同十幾個亞洲國家有經常的接觸，有時同某個國家的一個政治組織，有時同幾個組織接觸。

▶ 皮埃爾·魯塞是第四國際領導成員，特別負責團結亞洲的工作。他是法國在新反資本主義黨黨員。

注釋

[1] 見皮埃爾·魯塞，“棉蘭老革命工人黨第二次大會”，國際觀點，429 期，2010 年 10 月。

[2] 見羅曼，“棉蘭老革命工人黨第二次大會消息”國際觀點，429 期，2010 年 10 月。

[3] 本文是寫給‘一切都是我們的，’回顧，14 期，2010 年 11 月，法國新反資本主義黨（NPA）出版發行。

一場新的社會戰爭正在歐洲展開

夏爾-安德列·尤迪

自2010年5月8日 --- 即歐洲中央銀行（ECB），歐盟財長（ECOFIN）和國際貨幣基金（IMF）舉行的緊急會議，旨在建立一個歐盟各國的救援計畫 --- 以來，所有的政府都宣佈緊縮預算開支計畫 “以挽救歐元區。” 一種新的大規模戰爭已經在歐洲宣佈啓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時期造成的社會狀態的剩餘，除了一個世界銀行這樣的“社會安全網”以外，都必須予以拆除。



(1). 5月10日，英國銀行家找到了良好的政治公式：“用這個說法推銷這項計畫比較容易，也即說該計畫可以拯救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而不是承認必須首先挽救和幫助銀行。” 這些銀行（德語，法語，西班牙…）持有“搖晃”國家（希臘，葡萄牙，西班牙…）的巨大國債。據花旗集團說，美國銀行曝露在希臘，愛爾蘭，義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風險金額達到190億歐元。星期五5月7日是一個大屠殺：沒有人要接收銀行，而其他的投資者則想擺脫他們的債券。“這裏沒有更多的市場”，正如

歐洲央行的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操盤者承認的。而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仍然掩蓋巨大的有毒產品，在做人為的價格評估。德國聯邦金融服務監管局（Bafin）估計，有8000億美元的“有毒產品”仍然為金融機構（金融時報，2010年5月24日）所持有。

我們是否必須要記得，歐元區的16名成員中，只有6名獲利 --- 如果我們可以獲利這個詞 --- 因為他們被信用評級機構評級為AAA？他們是德國，奧地利，芬蘭，法國，盧森堡和荷蘭。這是歐元區的一種“硬核心” --- AAA俱樂部 --- 儘管法國有時被視為處在這個德國稱雄的領域的邊沿。

此外，這種評價讓法國國庫署（AFT） --- 管理法國家債務的機構 --- 發行50億歐元的貸款，償還的時間是2060年4月，所以從現在算起，有50年的時間，這些貸款中，大約百分之九十是由非法國投資者獲得。2010年5月21日，法國最有信譽的政府貸款 --- 可吸收國債（OAT） --- 發現借款人接受了2.9%的利率。當“它”的10年期貸款利率轉向10%左右時，這可能在希臘引發某些反應。2012年3月到期的希臘債券有7.27%的毛回報率，而法國那些債券（相同期限）為0.61%（太陽報，2010年5月24日）。歐盟“中心” --- 或半中心，如法國 --- 經濟體和週邊經濟體之間，差別是顯而易見的。歐洲團結的說法已經受到了一個打擊。

(2). 同樣，歐元功能之一的示範是：它雖已成為一個地位重要的貨幣…但在國際債券市場並非如此。因此，作為債權人，按照市場的可能性（即各種金融投資者），對債務人施加強大的壓力。某些法國債務的三分之二是在法國

以外。誠然，躲在盧森堡或瑞士的法國資本也代表了這一債務的部分買家，這也是可能的。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檢查圖形化的“債務網”，它發表在2010年5月2日的紐約時報。銀行和五個搖搖欲墜的經濟體的政府（希臘，義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愛爾蘭）相互欠下數十億歐元的債務，它們欠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債務甚至更大。箭頭的寬度同債務數額成正比。這些數字來自國際清算銀行。它說明了國家債務的數額，以及歐洲聯盟各國的債務人和債權人交織在一起的依賴關係。這一演變，近年來已在加劇，它代表了資本流通的自由化以及“信用-債務”的起飛，旨在回應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再生產困難。

一個主題，其基本內容已由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作了論述。在那裏，馬克思堅持認為債務債卷的虛擬資本性質[1] --- 虛構的，但很真實。這一事實部分地揭示了，“公共開支巨大的削減”，是創造主要的預算平衡的條件之一，它使得人們有可能面對債務的“重量”，在一定程度上，這些債務代表了“私人經濟行為者”損失的社會化。

(3). 因此，在政治話語的水準上，2009年9月匹茲堡20國集團會議的時期，肯定是結束了。當時薩科齊宣稱：“我們需要重建資本主義”，“我們必須擰緊投機的脖子”。市場 --- 即銀行，金融投資基金，養老基金，保險公司，高度全球化的跨國大公司 --- 已經完全表明了誰在真正負責。

該方案是相當清楚的。讓銀行，保險公司和投資基金在2008年免於破產的，是政府的救助，從而是工作者-納稅人的救助。2009年以來，這些金融行為者再次有生意好做了。銀行和對沖基金 --- 在國際上是激烈的互相競爭者 --- 想要消除一個可能的，甚至是預期的情況，該情況就是他們股票和分紅的收入下降，因為復蘇非常脆弱。要做到這一點，他們有一個基本的目標：確保他們能夠把國債的利息納入其私囊

和鞏固對貨幣（波動的匯率）和債務（債券）投機操作的利潤。投機性的（攻擊和預測）策略之一，是拋空最脆弱國家的政府債券 --- 不擁有它們，通過貸款的形式，從那些持有全部有價證券的投資者那兒獲得它們。在一般情況下，該行動分兩個階段進行。例如，你以88.76歐元的價格賣出500萬歐元的政府債券，從而獲得430萬歐元。然後，3天之後，一旦價格下跌至87.76歐元，你回購他們，兩種價格之間的差額，減去買賣這些債券所支付的傭金，就是所賺的錢。這些活動與信用違約掉期的業務（CDS）是同一類型。

(4). 從這個角度來看，保羅·克魯格曼是正確的，他解釋了為什麼同神聖的官方學說相反，美國10年期國庫券對投資者的吸引力 --- 其利率在2010年5月21日星期五低於3.3% --- 起源於：“有關經濟復蘇前景的悲觀主義的興起，悲觀主義意味著投資者離開危險，躲進表面安全的美國政府債務的庇護中。”（國家報，2010年，5月23日）。

歐洲採用的廣義的緊縮政策 --- 當經濟復蘇是一廂情願的想法時 --- 正在導致經濟和社會蕭條，像各種並非很正統的經濟學家承認的，沒有進入“運作者”的關注裏。這個關注屬於政府 --- 中右或中左的政府 --- 政府這要麼直接依賴于官僚工會組織，要麼利用他們的“猶豫”清除系統，並讓清除得到接受。而所有這一切令人想起“民族團結”，“救國”，“必要的生產和管理現代化”，因為未來的衝擊力將動搖不少人。

(5). 2009年12月，歐洲央行月報在它的主要文章裏，已確認歐盟的兩個優先目標。第一：讓歐洲的產業立法靈活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其2008年5月關於希臘的報告中，極力堅持這同一個目標。讓我們把它翻譯出來：清除其餘的勞動法，這在一個失業和越來越不穩定就業的背景下，目的是減少“工資費用”。第二：公共赤字和債務的嚴厲減少。這要在很短的時

間而且大規模地做到：在愛爾蘭，占2009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4.3%的赤字在2014年減到2.9%；在西班牙，到2013年，從11.2%減少到3%；在葡萄牙，到2013年 從9.3%減到2.8%。這意味著減少公共服務（教育和衛生等），減少工資以及公共和半公共部門的就業人數和退休養老金。而且有利某些行業的私有化，有可能測試在公私合營期間（PPP）它們的盈利率。

羅馬尼亞已經提供了一個例子。從2010年6月1日起，公共部門的工資將下降25%，養老金下降15%。而在這個國家，最低工資大約為每月150歐元！波羅的海國家也在類似地進行該實驗。

(6). 歇斯底里的反赤字“專家”悄悄地忽略了四樣要素。第一樣，公共赤字和債務的起源，即2007-2009年的危機，救援銀行和協助工業及建築業。第二樣，如果沒有這些減震措施（公共支出和社會轉賬），法國國內生產總值的下降不會是5%，而是10%。第三樣，瑞典20世紀90年代公共赤字的減少 --- 總是用作為例子 --- 是可能的，因為那十年的經濟增長快，而且社會轉賬是從一個很高的水準開始的。而它有出口能力。此外，瑞典可以貶值其貨幣（克朗），以利出口。第四樣：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沒有貨幣主權（貶值和增加貨幣供應量），在歐元區，也沒有共同的，“以團結為基礎的”經濟和預算政策。他們的“主權”是提出問題，如確定自己預算的基本權力，說到底，預算是一種“社會的選擇”。

另一方面，今天，“市場”和歐盟中心國家的統治階級（德國及其腹地和盟友），實行一個總的緊縮政策，對“週邊”國家的人民施加特別的負擔。而且以重新啟動出口動力的名義這樣做。這將會在直接和間接緊縮工資的基礎上進行，目標是減少單一勞動力的成本。

人們會奇怪，在歐盟所有的國家，怎麼能一起削減工資和降低單一的勞動力成本，以增加出口收入，應對債務負擔。然而，出口基本上

在歐盟範圍內進行。選擇性的同類相食付諸實施。這是德國（和它的親密盟友）資本的選擇，一方面，按照其優勢在歐盟內做國際分工，另一方面，策劃移動，漸漸地，他們的出口重心從歐盟外移，同時獲得歐盟市場內的份額。這個競爭性的社會通貨緊縮政策，將導致數百萬的社會傷害。它會強行做決定，完全無視資產階級議會民主的最基本規則。

不過，歐洲央行（ECB）接受銀行持有的公共債務的貶值債券。而這些銀行本身獲得歐洲央行再融資，利息率不到百分之一，它們繼續對債務和貨幣進行投機操作。

(7). 2010年5月23日紐約時報（在史蒂芬·厄蘭格的文章裏）在頭版寫道：“歐洲社會模式”正在受到挑戰。在未來的戰鬥中，利害攸關的---在這場戰爭 --- 首先是社會和政治問題。歐洲工人階級有最偉大的社會和政治傳統 --- 儘管有過去的失敗 --- 這是目標。團結一致的保衛運動 --- 拒絕削減公共開支，抵制債務（公開公共和私人帳本），不同的稅收制度，等等 --- 是決定性的。為積累力量，使工人覺得自己有能力抵抗和反擊，是必要的。不受“休克療法”的麻木作用。從那裏起步，基本重要的問題會來到政治舞臺的中心。

我們可以它們總結如下：為了實現商品和服務滿足社會與生態需要的生產而作直接投資，必須由工人對生產的資源做控制；一個民主控制的公共金融服務系統；控制企業的經營，控制財富撥款及其分配，以及工作時間的減少。所以：什麼是歐洲社會採納的重點？

局勢的困難不應使我們放棄社會主義的視野，起碼，要有歐洲的社會主義合眾國的視野。

此外，這種視野植根于工人遇到的問題。否則，就不能排除，經過一段時間，將會有一個政治局勢急劇逆轉。

洛桑，2010年5月25日

夏爾·安德列·尤迪，經濟學家，線上政治評論‘反對派’（<http://www.alencontre.org/>）的組織者，是社會主義運動的成員（MPS，瑞士）。

注釋

[1] “國家債務的資本積累並無任何其他意思[...]，它只是一個國家債權人階級的發展，他們得到了授權，從增加的總稅款中，提取一定量的款項為自己用[...]。這些事實表明，即使是債務積累也設法通過資本的積累而來的 [...]。”卡爾·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二章，138-139，1959年版本。換言之，債權人借給那些國家的錢，被債權持有者翻了一番，這些債權有：債券，國庫券等等。這些債券，把這個錢翻一番，但是，由於它主要是非生產性的支出 --- 例如，

支付債務利息 --- 它們甚至不代表運作的資本。這些債券只是虛擬資本。因而，各國創造的是虛擬金融資本。但是，管理這些國家的那些人譴責不合理的金融“繁榮”！國家債務的增長起源於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再生產困難。一方面，拯救瀕於破產邊緣的銀行---會膨脹信貸品質，從而增加虛擬金融資本，因而有這麼多的私人經濟機構 --- 和援助在困難中的“私人部門”（汽車業及其分包商，建築業）。另一方面，用“社會開支”吸納經濟衰退的影響（在需求方面），並著眼於穩定執政的政府。然而，今天，正是這些減緩社會震動的吸收措施受到攻擊。優先債權人！這是在歐洲層面上，在歷史規模上，對統治階級...也是對工人階級的一個社會政治考驗。

爆炸性局勢走向總罷工

桑德拉·德馬奇

法國的政治局勢占主導地位的是反對養老金制度改革建議的反對運動。這個改革是薩科齊緊縮政策的核心。雖然它表現為一個明顯的人口統計上必要性，但它遭遇到越來越多的公共輿論的反對。

自五月開始的動員和六月的第一天行動以來，運動一直在增長。九月初以來，三天的罷工和示威遊行（9月7日，23日和10月2日）每次帶出了300萬人。總工會（CGT）估計，動員開始以來，有5百萬人參加了罷工和示威活動。

在每個行動日，我們看到，有更多的私營部門的工人，更多的年輕人 --- 甚至高中生開始動員起來並罷課 --- 和更激進的要求。

民眾拒絕薩科齊的政策

反對養老金法律草案的戰鬥也顯示了大眾對整個薩科齊政治的拒絕。目前不僅是養老金問題，許多部門行業都針對各種主題全力發動罷工：郵局，醫院的護士-麻醉師，碼頭工人...面對這種反抗，政府越來越不得人心。這些重重的困難正在右派內部挑起危機。

薩科齊為了嘗試重新確立他的控制，加強了他的種族主義和安全政策，特別是有關羅姆吉普賽人的問題。而且在過去數星期，政府一直突出恐怖危險，以圖讓人們忘記社會問題。但用處不大。

不滿越來越烈，形勢是“爆炸性”的。面臨示威和罷工的成功，政府不為所動，說不會改變其提案。危機和債務是把改革合理化的可憐藉口。

薩科齊和他的政府希望做他們的改革。面對政府的決心，很多工人知道，為了贏得勝利，必須要立下社會決心。

在眾多的行業裏，現在是全面罷工的時機。例如，巴黎公共交通系統（RATP），法國國營鐵路公司（SNCF），還有化工行業也有可能從週二舉行一個持續的罷工。[1]

我們知道，10月12日星期二，罷工和遊行示威的第二天，一定會成功。而現在，我們能贏得勝利，這個想法，越來越強。

這場運動的狀態

► 目前，它是一個真正的政治運動。這次罷工力度強勁，但不意外。現今運動的自我組織性非常低。各部門行業的大會參與率非常低。

► 這是一個一致的運動。有一個跨聯盟協調委員會[2]，它給出了運動日程，但它是由政府的頑固態度和激進好鬥團隊推動的。

這一運動的特點是大規模的拒絕改革，是對權力，對薩科齊的一個巨大不信任，但我們不知道這場對抗會有什麼樣的最終結果。一切都是可能的。

在政治層面

新反資本主義黨與整個法國左派，包括了社會主義黨（PS），但不包括工人戰鬥運動（LO），參與了反對養老金改革的一致運動。

這個一致運動，由阿塔克和Copernic基金會推出，要求所有人在60歲可享有退休金，取消那個法律。

雖然所有的左派都同意這兩項要求，但有幾個分歧。圍繞訴求，同社會主義黨有特別的分歧。他們同意60歲的退休年齡的要求，但他們堅持認為，工人必須工作更長的時間才能獲得全額退休金。因此，他們投票支持右翼代表，增加領取全額退休金的工作資格年限。

在戰勝政府和撤銷該法律草案的戰略方面，也有分歧。不但同社會主義黨有分歧，同

共產黨和左翼黨（Left Party）也有分歧的。社會主義黨要求我們等待2012年的下屆總統選舉，其他政治力量要求全民公決，把階級鬥爭轉變為一個憲法問題。他們都拒絕了爭取勝利必須的社會對抗。

新反資本主義黨的行動情況

自運動開始，新反資本主義黨在兩個方向上行動：

► 第一：完全一致地行動，捍衛60歲的領取全額養老金的法定年齡。我們還要求撤銷新法律。奧利維爾是黨的發言人，參加了全國各地的一致行動會議。

► 對我們來說，主要的訴求是財富再分配和工作分享。我們的綱領很清楚，自去年五月以來，我們就一直為一個巨大的社會和政治鬥爭工作。

由於政府非常不得人心，我們的要求之一就是解雇勞工部長韋爾特和總統薩科齊。

2010年10月11日

► 桑德拉·德馬奇是法國的新反資本主義黨（NPA）執行委員會的成員，以及第四國際領導成員。

注釋

[1] 罷工是法國憲法賦予的權利。工會必須為被視為合法的罷工工人給出罷工“警告”（préavis）。在這些行業出現了一個“可再傳播的”或全面罷工的“警告”（préavis），這個罷工是每一天由工人再投表決定的。

[2] 在“工會聯合會”彙集了五個聯合會，其中包括兩個通常劃分為“右的”，CGT, CFTD, FO, CGC和CFTC；激進的團結工會和郵政，運輸和健康部門，FSU和UNSA（教師和公共部門）的重要植入。

爆炸性局勢走向總罷工

桑德拉·德馬奇

去年五月以來，法國形勢的特點是反對養老金法律的運動。動員一波連著一波，反對養老金改革的運動不斷深入發展。落實了一個深刻的群眾運動，它不僅拒絕退休金改革，還拒絕更廣泛的薩科齊反社會的，種族主義的和極權的政策。而且，無論是在年輕人還是在打工者中間，危機也加劇累積了不公正情況。

這就是為什麼雖然示威反復發生，它們不但未消退，甚至還衝擊著記錄，特別是 10 月 12 日和 19 日，當時有 350 萬人上街。集會越來越激烈和具戰鬥性。私營部門高度動員，現在連青年（現階段基本上是高中學生）也動員起來了。由於青年們懂得，他們在短期內獲得工作，以及在健康良好的情況下，獲得全額退休金的可能，因這項改革而岌岌可危。

環境一點一點地改變，我們很多人，非常的多，認為勝利是可能的，我們能夠打敗薩科齊。目前這個動員階段，政府已經在輿論的戰鬥中輸了。70%的人口支持運動和反對這項改革。今天，大多數從事不穩定工作的工人以及青年一代，瞭解退休金問題既不是一個人口問題也不是金融問題，而那正是幾個月來政府力圖讓我們相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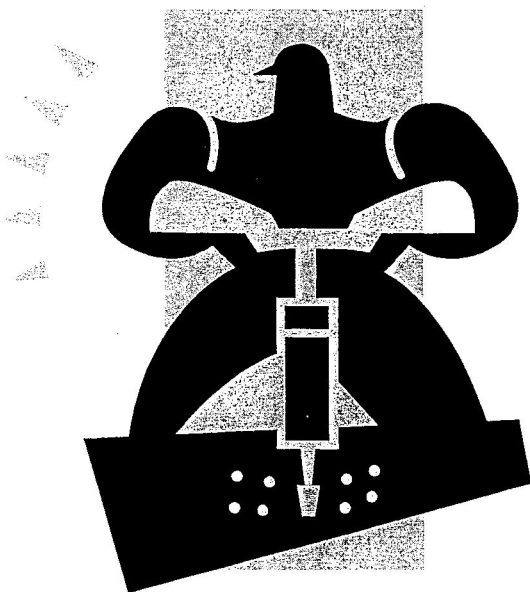
罷工已一點點地成為了景觀特色。隨著每一天的罷工和示威活動，對於許多階層，日益明顯的是，日復一日交錯的運動不足以打敗政府。事實上，正在舉行的罷工行動，從來沒有受到所有行動階層的最近幾個星期這麼多的討論，61%的人贊成延長罷工。問題正是工會聯合會的領導人，即使他們受到普通民眾催促，仍然力圖避免進行總罷工。運動開始時，工會的團結，無疑是一個成就，在罷工和示威的日子裏，它是成功的支持點。但工會之間並沒有

十月評論 2010年第2/3期

作協調，沒有訴諸於同政府作大規模社會對抗，並且不再要求撤回立法草案，反倒是建議舉行新的談判和修正。

經濟的關鍵部門已決定發動或擴大長期罷工。鐵路工人，法國電力公司和煉油廠就是這個情況。這些部門中的後者，並沒有出現在 68 年 5 月的運動中。自 10 月 14 日，13 個煉油廠舉行罷工，完全停止安裝和運送燃料到加油站和油庫。這次罷工是巨大的，其延續也是有默契的。

這一運動在各地進行，每天都有新的舉措，封鎖行動（收費站，道路，機場，工業區等），並且用團結的，跨專業的方式進行的地區示威。每一天都發生不同階層動員的群眾集會，開始是小規模的，現在越來越有分量了。但也應該指出，雖然在公營部門如同在私營部門一樣，到處都有不少罷工，但是持續中的行動還是過於分散，在全國大罷工的日子裏，少數派現象和罷工率很高，但並非不尋常的。



一些日子，特別是 10 月 19 日的罷工和示威以來，青年人充分參與了運動，他們是非常重要的和有活力的隊伍，還有許多高中罷課。在這裏有一種決心和政治，是以以前的動員裏沒有的。越是說他們被操縱，就越發激起他們示威的權利，他們的決心就越增長。在大學裏，運動正在一點點地起動。未來在高中假期前夕，這是一個大議題。

面對這種情況，右派，雇主，政府和薩科齊仍然決心捍衛這一不公正的改革。薩科齊意在測試強度。武力的使用是明顯的，例如員警對煉油廠罷工工人和對高中學生的干預，在國會採取強硬戰術，甚至拒絕同最溫和的工會領導人作任何討論。他們的決心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對他們來說，這項改革是他們緊縮政策的核心，要確保讓沒有危機責任的人為危機買單。這個改革的成功將推動金融市場，而且也是改變法國力量關係的機會，是讓財富分配有利於最富者的機會。它也是擺脫“社會和財政負擔”的機會，這是老的鬥爭傳統，是讓反抗最大的階層屈服的機會。對於薩科齊，也是在總統選舉幾個月前，凝聚自己陣營的關鍵因素。然而，他還遠遠沒有勝利，他還沒有打破反抗，讓反抗沉默。

這一動員的廣度，顯示了挫敗政府的可能性。這就是為什麼社會和政治左派的整體團結在鬥爭中是必不可少的。這就是在所有的統一和政治動議中，新反資本主義黨（NPA）承諾的意義，特別是通過 Copernic 和 Attac 基金會的全國共同倡議，讓我們重新集結。但是，圍繞這個“60 歲全額退休金和取消法律草案”口號的團結並不能掩蓋某些基本分歧，特別是同社會主義黨的行動戰略的分歧。後者捍衛 60 歲的全額退休金，但把票投給右派代表，贊成把領取養老金的工作年限增加至 41.5 年，這實際上破壞了捍衛退休金的理念。還有，面對日益增長的動員，我們在準備 2012 年的總統選舉。同左派的左派有分歧，特別是與讓-呂克·梅朗雄的左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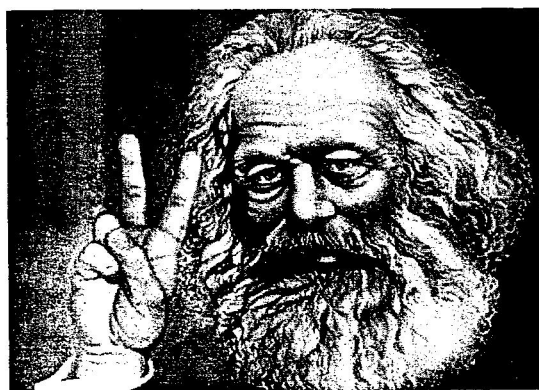
黨有分歧，他們關心主要的行動戰略。後者堅持這樣的看法，即舉行公民投票，當各個勢力的社會試驗仍然擺在我們面前時，公民投票會把動員從街頭運動轉向憲政體制方面！

動員開始以來，新反資本主義黨（NPA）就作為一個黨，組織鬥爭，尋求團結在政治目標和訴求周圍：撤銷，現在無疑是要廢除該法律，要為這些社會危機負責的人，薩科齊和韋爾特必須辭職。我們還提出了擊敗危機的緊急社會和政治計畫，展現了反資本主義觀點。

未來的日子將是決定性的。該法將表決通過，但不會讓這個動員保持沉默或停頓，因為對所有今天在街頭罷工的人來說，這個政權是非法的。另外，我們知道，在這個國家，一個制定的法律是可以被撤銷的 --- 2007 年，這個情況已經發生在首次雇傭合同法（Contrat Première embauche）上。

我們拭目以待...

► 桑德拉·德馬奇是法國新反資本主義(NPA)黨執行局成員，也是第四國際領導層成員



撒哈拉以南非洲在“獨立”50年後

約翰·南伽

21世紀第二個十年伊始，撒哈拉以南非洲一些過去的英法殖民地國家，就在慶祝其創建或獨立50周年。本文借此周年慶祝之際，謹表敬意。

這次50周年紀念處在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危機時期，危機對非洲經濟體的影響，不像對資本主義中心的影響那樣深。同時，在作為前殖民地和頭五個新殖民主義十年的西方列強之間經濟“合作”的現實批判中，我們又可以看到非洲與所謂新興經濟體的夥伴關係的一般發展，尤其是同中國關係的發展。

新自由主義調整

第一波獨立後的半世紀，撒哈拉以南非洲仍然只是在向資本主義中心的企業供應農業和能源及礦產原料，而且往往是戰略原料，有時其代價是新殖民主義戰爭，不過其表現形式往往是種族的或宗教的戰爭。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中，這種資本血腥的參與，往往是隱藏的，因為在世界貿易中，非洲的參與率經常只有2%，這是不可否認的邊緣化表現，所以被反復用來掩蓋資本血腥的參與。於是，發展商的使命被看成是把非洲插入或融入全球化。這個善意，它不幸地依據兩點，第一是篡改的世界經濟史，第二是無視這個事實，即：非洲是最為連接世界經濟的大陸，而非洲大陸不同國家之間只有15%的貿易交流。絕大部分是與世界其他地區（而歐洲內部的商品交流占60%以上）的貿易。而且，這個非洲邊緣化的一個非常特別之處，就是它給世界其他地區的幫助，是原材料，對於西方資本的最強大公司的某些表演，這確實是條件之一，而且是必要條件。因此，非洲邊緣化的定量表達，按照其弱點也可以解釋為，是世界市場不等價交換的持久性表達，因

為世界市場仍然由資本主義中心的經濟強權控制。

20世紀80年代開始，由國際金融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通過結構調整方案（SAPs），組織了所謂非洲經濟的新自由主義化，加劇了這個不平等的和非邊緣的狀況，這個狀況被認為是對頭20年的新殖民主義結構性危機的適當反應，它體現為非洲國家的主要債務——就像同一時間的拉丁美洲和亞洲國家那樣。因此，為了新自由主義版本的新殖民主義統治的鞏固，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上的這個地區已做了永久性的調整或重組。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積極支持下，在被認為最有利可圖的部門，施行了一個手術，而這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跨國公司以前就佔有非洲的國有公司[1]。

技術官僚，比如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的官員，視非洲大陸為外國資本實現投資回報率最高的地方（1990年代以來，投資回報率平均為24-30%，而在資本主義的中心僅為16-18%）。此外，這是國際金融機構工作成功的結果，這些機構包括像非洲開發銀行（ADB，其股東中包括非洲的非政府機構）這樣的非洲機構，另外，還由於地方統治者運用國家立法滿足資本主義積累的新自由主義要求。因此，第一個50年的下半段時間（1980-2000年）證明是一個新自由主義的“再殖民化”時期，其做法是最低程度地減少自治，這個已經非常有限的自治是宣佈獨立後所獲得的，它得益於“冷戰”的氣候。隨著所謂的歐洲“共產主義”集團的消失，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精英同帝國主義談判的餘地減少了。換句話說，我們已經看到了，在國有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在國家財富的限制較小的重新分配的基礎上，所有進步的民族項目計畫在

半消失中。也就是說，有些觀察家草率列為非洲社會主義經驗（從埃及的納賽爾到托馬·桑卡拉的布基那法索，馬里安·恩古瓦比的剛果和迪迪埃·拉齊拉卡的馬達加斯加的方式）的東西垮臺了，因為忘記了他們總是受到資本主義背景的影響，還要考慮同前殖民宗主國合作的所謂新殖民主義結構機制。

但是，隨著世界經濟的新自由主義化，非洲已不再被視為是舊殖民地宗主國專用區。自1998年12月（聖馬婁協定）以來，這些宗主國，希拉克-若斯潘的法國和托尼·布雷爾的英國，決定以協調一致的方式主宰非洲。從上個世紀末以來，非洲也是重組帝國新秩序的一個地區，是美國重新考慮其非洲政策並加強了其經濟存在的地區。因此，歐洲主要的新殖民主義機制，歐洲聯盟/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協定（EU-ACP，前 EEC-ACP）以及歐洲和非洲國家之間的雙邊“合作”傳統協定，已加入了非洲增長和機遇法案（AGOA，2000年），這個法案是克林頓總統任內提出的。安裝這個所謂的優惠市場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尋求更好地獲得非洲的能源資源（長期被低估），有時，當美國來自中東的供應變得不足甚至受威脅時，美國確實有控制它們的意圖。然而，在西非海岸，從尼日利亞到安哥拉，石油戰略利益（占美國2008年非洲進口量的92.3%）伴隨著其他非洲產品的利益（礦產，金屬，運輸設備，紡織品），伴隨著美國產品出口利益（2008年出口186億美元，進口861億美元），範圍從轉基因種子（蘇力菌抗蟲棉花等）到軍事裝備都有。

軍事帝國主義

美國的石油供應涉及國家安全，伴隨著軍隊的直接軍事存在，是長期間接干涉後的一種改變，例如，冷戰時期，通過南非和蒙博托的薩伊，對薩文比安盟反對羅安達政府的長期戰爭，提供後勤支援。因此，法國失去了在該大陸直接軍事存在的壟斷地位，其軍事基地繼承

於殖民化，冷戰幫助維持了它，並用它作為一種施加壓力，恐嚇和更糟糕的手段，反對它的前殖民地的某些政治和經濟取向。

十年來，美國軍隊擴大了與非洲國家軍隊的聯合軍事行動，包括那些傳統的法國領地在內。在布希的總統任期，決定給非洲大陸一個美軍指揮部，像在其他大陸一樣 --- 全球霸權的排他性 --- 於2007年，建立美軍非洲司令部（Africom）。儘管美國軍隊出現在非洲海岸，出現在迪戈加西亞-毛里求斯領土上英國維持的最後殖民地的巨型軍事基地上，已經幾十年了，但使得美國成為非洲一個軍事力量的，是美軍非洲司令部的建立[2]。不過，因為醉心於權力，很明顯的是，在小布希總統任期，要行政當局就有關該司令部在大陸的辦公處問題，徵詢非洲“夥伴”的意見，是不可能的。因此，美軍非洲司令部在大陸無法找到歡迎它的地方，而舉世皆知，這個大陸的統治者們喜好反對人民利益的一切事物。就目前而言，非洲聯盟（AU）似乎決心要阻止任何猶豫不決的狀態 --- 像利比里亞的埃倫·瑟利夫·詹森（新當選）--- 決心要擺脫非洲大陸和島嶼的外國軍事基地。即使摩洛哥，它不屬於非盟而且優柔寡斷 --- 根據傳言 --- 似乎無法逃脫其同儕的壓力。因此，美國的非洲軍事指揮部的基地仍然在斯圖加特（德國）。於是，就目前而言，美國在非洲大陸唯一的開放和永久的軍事存在，是在勒芒訥爾軍營（接著非洲司令部的建立），這是法國在吉布提的軍營之一。在1977年宣佈獨立後，吉布提一直是法國在非洲的主要軍事基地。

等待在泛非共識中出現裂痕，裂痕可能給美軍非洲司令部在非洲大陸獲得一個落腳點，在這個等待時期，非洲司令部的活動有定期培訓，聯合演習，還在非洲各個國家展開所謂的人道主義行動（健康衛生干預活動等）。不可忽略的是，通過這些軍事演習和所謂的人道主義干預，在地方軍隊裏面，特別在某些非洲精英中，美國軍隊鞏固了其有效性的頑強神話，

它似乎沒有受到20和21世紀歷史噩夢的影響，從越南到阿富汗，還有索馬里的方式（‘恢復希望和繼續希望’行動，1992-1993年），其特點是持續的侵犯人權，這些似乎都沒有影響。像各處的美軍一樣，非洲司令部組合成私人多國軍事團，他們的雇傭軍聲名惡張。應當記住，死亡行業是傳統的，是現存資本主義最賺錢的行業之一，美國的這個行業冠蓋一切。

這個美軍的非洲行動有其經濟意義。美軍非洲司令部的任務和其他活動也是為國家軍工企業做不折不扣廣告的機會。事實上，軍事開支增長了10年，儘管如此，非洲大陸並沒有被列入美國軍火工業的主要客戶。除了埃及（第9位），是非洲的主要進口國，其他進口排名在前50位的非洲國家 --- 阿爾及利亞（第15位），南非（第27位），安哥拉（第36位），蘇丹（第43位） --- 獲得來自美國的供應不到4%。阿爾及利亞（近年來主要的進口國）和蘇丹喜歡俄羅斯的武器（超過65%），而南非買的武器多來自歐洲，主要是德國（超過65%）。至於其他非洲國家，在這方面，一些小的客戶仍然是非常密切地聯結到殖民地宗主國。法國和其前殖民地簽署的後殖民軍事合作協定，再度限制後者的培訓和軍事裝備的多樣化。向不久就要擔任指揮職務的非洲學員軍官提供更多的訓練津貼，在這方面，非洲司令部可以幾乎不能掩蓋與其歐洲合作夥伴的某種競爭，雖然是北約成員，他們正在發展一個共同的歐洲防務政策，即歐盟部隊（Eufor）。看來，非洲是歐盟部隊部署最多的地方（剛果民主共和國，乍得和中非），由法國領導（因為承認它的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實地經驗），有德國參與，還有其他歐洲國家的定期參與，如瑞典，它是歐洲前10名的武器商[3]。然而，美國在北約內部的優勢地位有利於作為軍工企業仲介機構的非洲司令部。

然而，傳統的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這種競爭，不應該讓我們忘記他們的永久共謀，其目前的體現，是在一些新興經濟國家（中國，印

度，巴西等）為獲取非洲資源的野心面前的表現。

中國巨獸

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對在非洲的西方霸權展現了一個嚴重威脅。它喂飽其超常經濟增長所需要資源的一部份來自非洲。因此，過去十年，中國發展與非洲國家的經濟合作關係：在2008年，560億人民幣的進口（71%的石油產品），508億的出口，以及直接投資的迅速增長，已經從2000年的100億美元升至2008年的1060億美元，預計到2010年，超過1000億元。在中國的出口中，有小型企業的產品，因為考慮到要適合非洲大眾的購買力，它實際上受到二十年結構調整的影響。

這種中非夥伴關係引起了一部分西方資本主義知識份子的憤怒，並非因為它有利中國的不平衡特點 --- 儘管主要的非洲資本，南非的資本已經能夠投資10億美元在中國（相比之下，中國投資60億美元在南非） --- 也不是因為中期和長期的密集礦物開採對環境的影響。因為在這些領域，中國在非洲所做的並非新鮮事，有這樣擔心的那些人是選擇性地做批判，以便有利於西方公司及其國家的做法。也並非由於新的爆炸性的外部公共債務的危險，這些債務是中國向其非洲合作夥伴貸款而產生的（按照最適合國際市場的條件），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幹事斯特勞斯-卡恩想讓我們相信的，為了反對中國和剛果（金）民主共和國之間最近的合約，新自由主義技術專家政治的動員是有理的。

由中國企業（私人和公共）開採略多於100萬噸的銅和50多萬噸的鈷，作為交換，中國向剛果民主共和國提供90億美元資金（包括60億用在道路，鋼鐵，衛生和教育基礎設施的建設上，以及30億作為剛果參與一個中剛果採礦企業的融資）。據中國駐剛果民主共和國大使說：“從一開始，我們就避免任何可能導致債務增加的情況”[4]，讓中國銀行進出口分行，而不是剛

果國家作擔保人。因此，在金沙薩，經過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專家的幾次交流，“中方發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指責奇怪而站不住腳”[5]。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唯一剩下的武器就是敲詐：修訂中剛合同（包括抑制3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建設費用），以交換巴黎俱樂部對剛果的債務減免，以及儘早完成其重債窮國減債計畫的資格。中非合作目前不能完全克服傳統的新殖民主義機制，該機制仍然可以剝奪剛果民主共和國為其人民作基本設施的改善。

由於五個新殖民主義的十年“合作”和“發展援助”計畫，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公路，鋼鐵，水電，衛生，教育等）被忽視了，而這是中國正在發動的魅力攻勢的一部分。當然，上述基礎設施的能見度符合非洲領導人的選舉利益，也有利於中國對有關人權條件（是西方國家的偽善要求，而且這些要求也因地區不同而改變）的拒絕，有利於接收中國裝備用於鎮壓和戰爭。但是，這些新的基礎設施也有助於有關國家中某種偏愛中國之癖好的發展[6]，其中包括被視為親西方，但實際上相當親資本主義的精英。有一些新自由主義的專利技術官僚的說法：貝寧的阿卜杜拉耶·比奧·查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非洲區前負責人，西非開發銀行的現任主管）認為，“中國不是對我們經濟的威脅”[7]，或尚比亞的丹比薩·莫約（在高盛公司負責經濟戰略，是“發展援助”的反傳統的新自由主義評論家）的說法是“現在是非洲要正視現實，繼續前進的時候了--- 是它與其他準備出好牌的玩家坐下來另開一桌的時候了。今天，中國就是這種玩家。”[8]。

“中非現實合作”的影響[9]是這樣的大，它已經相當迅速地在傳統的非洲發展行動者中間引起一些現實主義：世界銀行和英國有關國際開發的政府部門已選擇中國作為非洲發展的夥伴關係。2007年，中國給非洲貢獻了90億美元的投資，而世界銀行在非洲項目上的合作融資為25億美元。在2009年6月南非世界經濟論壇十月評論 2010年第2/3期

上，世行總幹事和尼日利亞前財政部長恩戈齊·奧孔約·伊韋阿拉，再度更新了世行對中國在非洲投資的支持。這種夥伴關係很好地表達了中國作為一個非洲強權的地位，而且這個強權似乎不再在乎一些分析家的警告，這些分析家微妙地關係著非洲的命運。在2010年3月的新聞發佈會上，中國外交部部長楊潔篪指出：“中國從非洲進口的石油只占非洲石油出口的13%，而美國和歐洲的進口都超過30%。在非洲石油領域中，中國的投資僅僅是在非洲大陸石油總投資的十六分之一，而美國和歐洲的投資占的比例則高得多。”因此，中國不認為自己取代了非洲的傳統帝國主義列強，它譴責其家長作風：

“我想說明的是，非洲屬於非洲人民，非洲人民是非洲大陸的主人，其他人只是它的客人。客人應尊重他們主人也即非洲人民的觀點，尊重他們自由選擇自己的朋友和合作夥伴的自由。”[10]。

然而，中國外交略而不談中國與西方之間經濟交換的意義，在國際資本主義制度的再生產方面，可以認為它是至關重要或串通一氣的：對於美國，中國是銀行家，反過來，美國則是中國的主要市場。而由於與中國的交流，歐洲的企業已成功的擺脫了危機。因此，雖然中國持續的增長 --- 可以說，馬來西亞也是一樣的 --- 是對華盛頓共識準則的實際否定，但中非合作充分參與了讓資本主義制度持續的動力，其形式正是新自由主義。

如果阿卜杜拉耶·比奧·查內，丹比薩·莫約等人，讚賞中非夥伴關係是這麼的好，這是因為這些部門的非洲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設想這個合作夥伴關係，對非洲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一個要素，最重要的是，有一個時間，在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危機的影響面前，西方經濟證明比中國的更脆弱。在其他所謂的南方新興資本主義方面，無論是印度，巴西，馬來西亞，甚至伊朗或其他地方，對非洲經濟的夥伴關係的歉意謙虛態度同樣是真的。這是南方資本主義

國家之間的另一種關係的具體化，它對非洲統治者和經濟精英有某些吸引力，讓他們認為，“另一種資本主義世界是可能的”，從而刺激了他們的“非洲復興”計畫的經濟層面，即非洲發展中的新夥伴關係（Nepad）計畫。

非洲發展中的新夥伴關係或非洲新資產階級的新自由主義

自從新千年開始之際，在非洲聯盟（AU）組織內——從非洲統一組織（OAU）的廢墟裏誕生的——的國家達成了共同的經濟發展新夥伴關係框架（Nepad），該框架是按照華盛頓共識的原則制定的，但亞洲危機已經具體證明了它的無用。因此，所謂非洲發展的動力作用，被歸於私人投資，主要是西方跨國公司的投資。後者被邀請到達喀爾演講新的夥伴關係。非洲統治者從而正式承認他們從屬於帝國主義資本，附著於非洲大陸的新經濟瓜分。但是，對於在後殖民時代的頭四個十年積累的資本而言，它帶著希望，這一次作為跨國公司的私人小夥伴能更有效地參與以前的公共戰略性企業，這些企業在結構調整的背景下已私有化了。隨著市場自由化，非洲資本家原則上有可能性，進入同西方跨國公司的地方競爭。當然，這個原則不是經常具體化的。此外，這些非洲人有可能分享前公共企業，或控制所謂的戰略投資者不感興趣的經濟部門。在很大程度上，組成這個非洲資產階級的，是那些負責資源廢料的人，是共同為國家公共合同的帳單和其他犯罪行為負責的人，在第一次新殖民時期結束時，這些犯罪行為造成了重要的公共債務，是結構調整的一個因素。以公有制經濟為代價的古典原始積累或資本再生產，不再是非洲的專有權。

因此，一些年來，除了外國直接投資，有一定的非洲私營經濟活動，有地方投資，非洲內部的投資（服務：36%，生產：30%，農業：19%）。就像一個新自由主義的泛非洲主義者所

說的那樣，它是“對非洲的投資，有超過三分之一是非洲人的。”[11]。這些投資者中有一些是非洲的，就像道達爾（Total）是法國的一樣，因為這些機構也有不是非洲人的股東。

確實，有人注意到——沒有任何說法是徹底詳盡的——在馬達加斯加和莫三比克有毛里求斯資本，在烏干達有肯雅資本，在阿爾及利亞，尼日利亞，突尼斯或辛巴威有埃及資本，在象牙海岸，尼日爾，烏干達和盧旺達有利比亞資本。摩洛哥銀行，阿提恰利法瓦（Attijarifawa）銀行和摩洛哥外貿銀行正在擴展到西部非洲和中部非洲。1980年代，西非工商聯合會有一個聲稱是泛非洲的成果，即經濟銀行跨國公司（在洛美）目前存在於非洲27個國家。

在這一非洲資本主義的動力中，來自種族隔離制度下的積累而實現的南非資本，利用了自納爾遜·曼德拉任總統以來的黑人多數政府的權力，處在非洲大陸的領導地位。這是白人資產階級中的部分開明者所希望的，而在20世紀80年代，這部分人對種族隔離政權抱有敵意。緊接著納爾遜·曼德拉當選，直到2005年，南非資本超過了非洲大陸所有傳統的投資者（140億美元，而美國是100億左右，法國是60億，英國是45億美元）。從毛里求斯到摩洛哥，它出現在不同的部門，例如礦業，是其青睞的部門（在這裏，南非獲得的幾乎和剛果民主共和國一樣），或其他如農業，釀酒，港口管理，電信，石化等。到此，一場辯論開啓了，辯論點是後種族隔離期的南非在非洲大陸的地位狀況：帝國主義？還是次帝國主義？然而，南非不只是輸出資本，它也獲取資本——除了勞工（合格和不合格），還有受結構調整影響的該地區的國家——作為主要的區域金融市場，它還接受來自某些經濟體的資本，當然是欠發達的經濟體，像尼日利亞，肯雅，主要是銀行部門的資本。

非洲插入世界經濟的方式（主要是作為資本主義中心的經濟體的原料供應者）似乎比較好地庇護了它，讓它免受經濟危機的一些直接影

響，危機起于金融部門，而在這個地方非洲實際上涉入不深。不過，正如世界其他地區，非洲並沒有倖免於難。非洲大陸作為原料供應者的角色，受到了資本主義中心的生產下降的影響，因為一些原材料的需求下降（銅，鈷，鈳，鉬鐵礦石，鑽石，錫，石油等），價格下降了25%到50%，石油價格下降的情況尤為厲害，從2008年夏天的每桶140美元，降至2009年春季的每桶55美元。其他行業也受到影響，比如旅遊（例如毛里求斯）。這場危機的後果之一是一些國家貨幣的外匯儲備大量減少。因此，已經眼見持續了十幾年平均增長的非洲，在2009年經歷了一個相當明顯的下降：2.5%的增長，而2008年的增長為5.1%，2007年為6%，這是最樂觀估計，它考慮到了一年期間（2008年上半年到2009年上半年）中國投資（81%）的增加。最終，非洲 --- 或說非洲資本主義的技術官僚 --- 較好地抵禦了金融危機，並從中興起，好於發達資本主義的大陸，有關其2010年增長的預測也較好。

然而，按照資本主義的觀點，可觀的增長率背後，對外國投資者（受非洲大陸投資的高回報率的吸引）和領導層（經濟和政治的企業家，包括反對派，混合在一起）的利益，有不平等的結構發展。因為，儘管世界資本主義等級結構的內部分歧，目前困擾著所謂的南方新興經濟體，儘管有地方派系的分歧，這個非洲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並不能被認為是代表工人和非洲大眾階層利益的，它也不是真正社會進步的因素。到處一樣，這個非洲資本主義的積累適合於高貧困率，國際機構把該貧困率平均定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的50%的水準。

增長並沒有改善工薪工作者（中小型企業），小農階級（大部分是婦女），在校或失業的青年，私營企業解雇的人或一般民眾的命運。但無可否認，如果有一個“得勝中的非洲” --- 與他人有實在聯盟的那些非洲資本家 --- 那麼它首先是反對工薪勞工力量的，正如2008年危機之前國際勞工局指出的：“大約55%的撒哈

拉以南非洲的工人仍然沒有足夠的收入來生活，養活家人，雖然其收入高於1美元的貧困水準，80%左右的家庭每天的生活費不到2美元...” [12]。

此外，棉花，橡膠，紡織品等的價格暴跌，導致從貝寧，經由摩洛哥到坦桑尼亞一帶的工廠裁員和倒閉。從2008年10月至2009年3月，埃及裁員10萬人；僅在2009年的第一季度，肯雅就裁員1萬人；在摩洛哥的紡織部門裁員13000人，其中60%是婦女。南非的失業率已經從2008年最後一個季度的21.9%，升至2009年第一季度的23.5%，或者說失業人數從387萬升至418萬人 [13]。因此，另一種的成長是整個非洲大陸（包括島嶼）失業率的成長，失業者從2007年的30.8百萬人增加到2009年的35百萬人。

這個並沒有取勝的非洲，反倒在為一些食品的價格上漲支付費用了，這個漲價先於危機並伴隨著危機；是一個依賴性的後果，這個依賴性是殖民化產生的，在後殖民時期它仍不斷地發展。例如，要求優先出口以償還外債，犧牲糧食作物，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調整政策，讓缺乏糧食主權的情況更加惡化。在一些國家的某些單一種植，伴隨著進一步的地力衰竭後果。象牙海岸和其鄰國加納的情況就是如此，在這裏，自殖民時期以來，世界可哥生產的重要性是用地力衰竭做獎償的。這是土地衝突的一個因素，這個情況已經發生在加納或肯雅。在達爾富爾（蘇丹），新自由主義集約農業造成的地力衰竭，是導致戰爭的一個危機因素 [14]。

食物主權的缺乏和小農經濟形勢將變得更加惡化。部分原因是多國公司生產的轉基因種子及其控制或私人獨佔農業遺傳產權的企圖所發動的進攻。部分原因是私人佔有非洲肥沃及公共土地，這些佔有者是國際農業資本主義，是跨國公司，他們瓜分世界的渴望可媲美於四，五個世紀以前的公司。在象牙海岸已經有一個可哥跨國公司攫取肥沃土地的問題。在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調整的情況下，已經有必要改

寫國家土地法律，因為它保持公有財產的原則，要把它改成讓一切可能物商品化的原則。

這種土地的新殖民主義，使人想起英國頭幾百年的資本主義圈地運動[15]，它無疑將把獨立的小農階級改變成為奴隸和低薪勞工，促使農村地區的失業增長和人口流亡到城市，使城市棚戶區和流氓無產者膨脹，造成廉價的勞動後備軍。在這種人性荒謬的資本主義邏輯的特別受害者中，是傳統生活在森林中的人民，像所謂的“俾格米人”，狩獵採集者，分佈在中部非洲和大湖區的8個國家，從喀麥隆到烏干達，並包括兩個剛果。因此，問題不是南非的白人農民出現在剛果，或對海灣酋長國供應農產品這樣的問題，而是因此產生的財產關係的問題 --- 雖然沒有再現促成形成目前南非的布林人與胡格諾人歷史的風險 --- 以及給當地居民帶來的後果。那些已經移民的南非白人，中國農民或其他農民，並未設立一個故步自封的殖民地，他們利用或過度利用當地勞工，為滿足該地區的食物需求而生產，他們同當地小生產商合作，因為後者瞭解土壤生態，他們本身又不存在任何問題。但是，馬達加斯加的大字項目，或者其他讓非洲農業朝向農業燃料生產的計畫，就不是這個情況。例如，巴西有一個計畫，以南-南經驗交流為藉口，通過巴西出口投資促進局(Apex-Brasil)，發揮推動作用。在農業燃料領域，以及在非洲促銷轉基因種子方面，似乎巴西還不是一個壞榜樣，因為美國更壞。似乎要解決石油不足的問題，應製造另一個生態問題，即農業企業 --- 從象牙海岸到辛巴威，非洲寡頭們已經這樣做了 --- 的後果問題，對於已經受害於糧食短缺的世界人口的這個重要部分來說，這更是犯罪。儘管沒有提出在目前或在不久的將來食品會貧乏的問題，但提出了現有食品生產的分工和世界農業重組的問題，這也會避免目前的浪費並為後代人保持肥沃的土地。

經過新殖民主義的五十年，非洲大陸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組織，似乎依然命運如故，繼

續著其最有害影響的積累。因此，在全球氣候變暖方面，非洲不是地球上的主要污染源之一，卻要遭受資本主義的增長和生產主義後果之害，由史達林主義集團政權約五十多年的模仿，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報告：“新的研究證實，非洲由於其預期效果的多樣性，多重壓力和脆弱的適應能力，是最脆弱的大陸之一”。這並不能阻止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非洲遊擊隊推進一個“‘綠色企業’戰爭的非洲戰略”[16]。

非洲對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抵抗

非洲新自由主義的社會後果，首先產生於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造成群眾運動和社會鬥爭的動力 --- 由工會組織提供骨幹 --- 促成了後殖民單極整體制度的“民主化”。但這是在社會主義解放計畫失去合法性的國際背景下，等同於史達林主義的崩潰，等同於證明，通過構造新自由主義資本，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是歐洲資本主義的好經理。換句話說，超越資本主義的問題沒有再擺上議事日程。因此，這一新的民主開放的實現，無處不在偏袒政治潮流，有利於新殖民主義的管理，在某些情況下，新殖民主義也共同為新自由主義的戰爭負責。

非洲左派群眾組織在三，四十年的後殖民單極整體統治中倖存下來，現在幾乎到處被聲名狼藉的社會主義解放計畫掃除，在某些情況下，被重建新殖民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戰爭掃除。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較為獲得民眾支援的倖存組織，從南非共產黨(SACP)連帶其盟友非洲國民大會(ANC)到塞內加爾的共同行動/非洲民主社會主義黨(AJ/PADS)，都逐步融入了新殖民主義次序的管理中。同這些黨有聯繫的聯盟領導人陷入了這個趨勢裏，實行所謂負責的行業工會主義或成為雇主和統治者的“社會夥伴”[17]。

然而，激進的非洲左派積極分子或前積極分

子，“階級鬥爭”工會成員，已經成為所謂的全球正義運動的非洲主要領導人。在結構調整政策的重大社會影響的情況下，在對新自由主義批判的基礎上，反資本主義已經再次變得較有聲勢了。

但是，為獲得某些媒體能見度 --- 它這方面在普通民眾中往往仍然非常薄弱 --- 非洲全球正義運動並沒有逃過“公民社會”的組織/協會的霸權和個人的霸權，這些組織/協會和個人過去或現在都敵視任何超越新自由主義框架的批判，把資本主義的剝削，壓迫和污染制度作為其目標。因此，沒有任何徹底的和全球的解放計畫這樣的東西，可以作為資本主義的替代品。這不是非洲特殊性。它也是西方的大組織抓住潮流的表現，是“帶有人類面孔的資本主義”的動員，從這個角度，再造資本主義中心及其週邊之間的經典關係。給非洲全球正義運動的金融援助是有條件的，條件即反對運動中的激進的黨派方向。非洲統治者的腐敗可以予以譴責，但是以道德為基礎，而不能置於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背景之下。

有一個事態，也得益於非洲中間階層的不穩定的地位，而“公民社會”的領導人往往屬於中間階層。要成為一個積極分子或一個代表全球正義運動的“公民社會”的組織，意味著公開的對話，意味著與西方國家的使館，私營跨國公司，西方基金會和像世界銀行這樣的國際機構的十足夥伴關係，而且這個開放提供了擺脫這種不穩定狀態的一個工具。一個微妙的腐敗機制。

因此，10年來，經過全球正義運動，地方和區域社會論壇，反對生活費用上漲的示威，學生運動，工會和農民鬥爭，失業者運動等等，可以說，仍然等同於激進左派的非洲組織，在幫助工人與小農的自我組織方面，從把他們的鬥爭同資本主義決裂的整體計畫連接的角度看，沒有明顯的成就。獲取飲用水，電，醫療保健，體面的工作，土地，良好的學習條件，

十月評論 2010年第2/3期

反對針對婦女的暴力等，在這些方面，經常甚至永久性的運動，仍然是分散和不團結的。一個永久的分裂狀態，也可以解釋為，是激進左派組織的宗派主義表現，當然，它有存活於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壓路機之下的好處，但是，不幸的是，它花更多的時間自我陶醉在小差異上，而不用心於組織的聯合，不用心於建立地區的永久團結和民主的動力。

讓非洲擺脫其悲慘狀況

後殖民時代的五個十年，是新殖民主義的五個十年。一個造成不幸後果的新殖民主義：每一個國家都有社會不平等的發展，其中一些是新自由主義的戰爭，各種角色人物剝削工薪工作者。這個情況不幸地伴隨著有組織的激進反新殖民主義/反資本主義覺悟的衰落，這同一個世界性的現象有關，但更嚴重。道德主義已被判定為唯一可能的批評視野。這就是為什麼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避免認為統治的資產階級對非洲的背叛，是與政治無關的。因為，如果他們是非洲人，他們也受到他們的階級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引導和驅動。在這方面，他們同法國資產階級沒有根本的不同，例如，在納粹德國經濟的佔領下，他們絕大多數選擇合作。

為了使非洲擺脫它的悲慘局面，客觀上，除了反新自由主義以外，還要反資本主義，除此別無其他的道路。今天，既不是中國，也不是印度巴西或其他地方，可以展現任何幻想，因為這些經濟體的增長帶來的社會生態代價不容忽視。這些國家無法成為基於平等和社會正義，滿足每一個人和各個民族基本需要的社會榜樣。

向非洲進行反新殖民主義/反資本主義鬥爭的人們 --- 而不是向新殖民主義的“獨立之父”們 --- 致敬的一個最好方式，就是真正地列舉總結地區和非洲大陸所進行的鬥爭。吸取他們的經驗教訓，構建新的反新殖民主義/反資本

主義組織，促進雇員，小農，婦女，青年和其他所有被壓迫的社會階層的自我組織和鬥爭。建立反對經濟剝削，反對各種壓迫的團體，以及建立反對可避免的環境有害影響的團體。換句話說，構建社會主義社會，即這樣的社會，它是社會公正和平等的，女性主義的，反對歧視同性戀的和生態主義的。這種社會主義的構建，需要一個泛非洲的視野。還有，它得益於同樣的剝削性企業出現在一些國家，無論是非洲的或不是非洲的，得益於經濟一體化的區域集團。

因此緊迫的是，那些仍然確定為社會主義和泛非主義的組織，在地方和區域以民主的方式，發起真正主動的交流，團結，學習和共同行動。具有不同政治傳統的隸屬關係不應成為障礙，因為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特點就是不同的政治傳統。正是在這種協商和革命社會主義的泛非主義行動動力的構建中，每一個組織將最有助於一個非洲的建立，這個非洲真正和完全地脫離殖民主義，從資本主義中解放出來。恰如別的地方一樣，供非洲選擇的方案，就是爭取和建立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要不就是讓資本主義社會的災難日益嚴重。

■ 約翰·南伽是剛果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

注釋

- [1]根據“非洲經濟展望，2010年”，非洲的盈利率是12.1%，高於其他大陸的比率。
- [2]西班牙，法國，葡萄牙和英國仍然佔領的非洲領土：亞速爾群島，休達和梅利利亞，加那利群島，查戈斯群島，馬迪拉，聖赫勒拿島，馬約特，留尼汪島。
- [3]在2006年和2007年，歐洲聯盟7個最大武器出口國的總和（德國，法國，英國，荷蘭，西班牙，義大利，瑞典）超過了美國的出口，數字來自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瑞典）。
- [4]引自“中國商務合同：金沙薩政府發言人對北京

說理”，“光榮榜”（金沙薩報紙），2009年6月4日：
<http://www.digitalcongo.net/article/58575>。

[5]同上。

[6]根據皮尤全球態度調查計畫：“在整個非洲，有利中國的意見多於批評意見，比例為二對一，每個國家都是這樣的，除了南非，在那裏意見分歧”，華盛頓皮尤研究中心，2007年6月，第41頁：
www.pewglobal.org。

[7]阿卜杜拉耶·比奧·查內，“中國不是我們的經濟威脅”，阿比讓報紙發表的採訪，南·北，2007年5月30日。

[8]丹比薩·莫約“致命的援助。對非洲的不必要支持的損害和新解決方案”一書，尼爾·弗格森撰寫的前言，巴黎，JC通信，2009年，第189頁。

[9]中國總理溫家寶的報告，“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政府工作報告”，2010年3月5日，
<http://french-news-en/documents/2010-03>。

[10]“中國捍衛其非洲投資”3月8日，2010年，
<http://www.focac.org/fra/zfgx/jmhzt/662292.htm>

[11]萊昂內爾·津蘇，“超過三分之一在非洲的投資是非洲國家的”，“非洲”，第96期，2009年11月5-11。

[12]“總幹事報告”，國際勞工局，第十一屆非洲區域會議（阿迪斯阿貝巴，2007年4月）：“非洲體面勞動的議程”：2007-2015年，2007年，日內瓦。

[13]這些比率和數字是已申報的失業者資料，並不是所有的南非失業人數。

[14]見約翰·南伽（2004），“達爾富爾：致命的衝突問題”，

<http://www.solidarites.ch/journal/index.php3?action=4&id=1693&aut=244>；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報告，蘇丹衝突後的環境評估，內羅畢，2007年還確立了集約農業及其後隨的地力衰竭的關係，它是達爾富爾危機的因素之一。

[15]見卡爾·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二十七章：“從土地徵用農業人口”。

[16]非洲金融雜誌，“非洲”發表了幾期有利於“綠色企業”的專題報導，時間在2009年最後一個季度，與哥本哈根首腦會議同時。

[17]最近，2009年1月，以全國和解的名義，辛巴威民主變革運動（MDC）進入了穆加貝領導的辛巴威非洲民族同盟-愛國陣線政府，其領導人莫文·茨萬吉拉伊被任命為總理。辛巴威民主變革運動（MDC）創立之前，前礦工也是哈佛大學畢業生的茨萬吉拉伊先生，領導辛巴威工會大會。最近，MDC的部長們批准了辛巴威政府雇員的薪酬凍結案。

21世紀的中美洲表面上的民主制度

戴安·菲利

從1970年代到1990年代，中美洲5國中的3個——薩爾瓦多，危地馬拉和尼加拉瓜——陷入內戰，而第四個，洪都拉斯，變成了美國支持康切斯遊擊隊的後勤中轉站。由於戰爭和貧窮，這些國家遭受了巨大的動盪。鑒於經濟和/或政治原因，許多人被迫流亡國外，大多數逃到北部，墨西哥，美國和加拿大。（巴拿馬往往也列在其中，但它不被看著是中美洲國家。）



丹尼爾·奧爾特加：領導一個獨裁政權，
在自稱體現了桑迪諾傳統的同時，煽動暴力

金·穆迪在其發表於《中流砥柱》ATC(Against the Current)，又譯《逆流前進》第127期和128期（2007年3/4月和5/6月）上的兩篇文章中指出，美國移民在20世紀50年代下降了，在接下來的十年內，停滯不前，但從1970至2004年，外國出生的人口從九百七十萬增長到三千四百二十萬。三千四百二十萬人中，有二千一百萬人不是公民。據估計，在2004年，二千萬就業的或尋找工作的移民中，近一千二百萬人不是公

十月評論 2010年第2/3期

民。到1984年，差不多50萬薩爾瓦多人到了美國，多數定居在洛杉磯地區。

移民的爆增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當時，來自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那些人“逃離全球化的殘害。”在中美洲國家的情形中，美國的軍事干預是最重要的原因，但次要原因（對於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區而言是首要原因）是推銷對第三世界國家的貸款，它導致這些國家“開放”經濟。對外商投資和關稅的限制減少或取消了，工資被凍結，而物價則上漲並且生產企業私有化。在農業和種植園方面的美國投資將數以百萬計的人驅離土地，建立了加勒比和墨西哥自由貿易區。

據美洲開發銀行的資料，2007年，生活在美國的中美洲人能夠向國內彙出一百二十一億六千萬美元：

薩爾瓦多二十七億美元

危地馬拉四十一億美元

洪都拉斯二十七億美元

尼加拉瓜九億美元

（來自中美洲富裕國家的移民匯款五點九億美元到哥斯達黎加和三點二億美元到巴拿馬。）

這些匯款占這些國家各自的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在9.4%和25.5%之間。在危地馬拉，它們是外國直接投資金額的6倍，在薩爾瓦多是7倍，在洪都拉斯是3倍，在尼加拉瓜則是2倍。雖然這筆錢對於援助各個收錢家庭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它也降低了讓這些國家提供公共服務的要求，這些服務包括教育和衛生經費，失業津貼和養老金。壓低的工資鼓勵移民，而匯款是使國家撤出社會投資的潤滑油。匯款代表祖國的社會安全價值。何塞·路易士·沙帕是尼加拉瓜月刊《航行》的成員和一名研究人員，他得出結論認為，“因此，匯款的再分配效應

是一個有毒的禮物，因為它們讓許多家庭受益，但代表一個紛擾，非理智的和分裂的戰略，使他們更有可能在精英的戰略中被籠絡收買...”（〈匯款遠遠超過發展的靈丹妙藥〉《航行》雜誌，27卷，#320，2008年3月，59頁）。在這包含兩部分的文章的第二部分，沙帕檢查了該籠絡收買的性質：匯款使原住國的家庭購買手機和其他消費物，從而擴大市場。但是，這一增長戰略，沒有生產性的支持或“長期發展的眼光，也即除了其他事情外，還要考慮到一個物質問題，也就是居民和可供水之間的關係，或者向迅速日增的城市民眾提供食品和能源服務的能力。”（卷27，#31，2008年4月，48頁）

理想移民

從美國商業的角度來看，理想的移民模式是“圓的”。也就是說，目的地國需要勞動力，而“臨時工人計劃”可以調節勞動力市場。這一計劃把勞工送來就業，而當他們不再需要時，則把勞工送回去。因此，無管制的，特別是“無證件”的移民是一個問題：他們流動，他們換工作，他們同其他工人結夥以改善他們的工資和工作條件，當不需要他們時，他們可能甚至不回家（如果有一個家可去）。 ”

1990年至2007年，美國政府驅逐二千四百萬移民出境，有些人在他們試圖進入該國時被逐，其他一些則被移民官員逮著，還有一些人因被定罪而遭驅逐。1992年的羅德尼·金暴動後，加利福尼亞州實施打擊團夥法，檢察官開始起訴作為成年人的年輕幫派成員，數百人以重罪被送入監獄。隨著1996年非法移民改革和移民責任法的通過，被判處1年以上監禁的非美國公民會被遣返他們的原籍國。因此，在1998年和2005年之間，美國移民驅逐出境了四萬六千罪犯回到中美洲。其90%以上被驅逐到薩爾瓦多，危地馬拉和洪都拉斯。許多人是兒童時移民到美國的，有一些人甚至不懂西班牙語。不是去處

理貧困問題，美國反而發現了一種出口其社會問題的廉價方式。

2007年所有被驅逐者中，98.56 %來自拉丁美洲：88.92 %來自墨西哥，7.76 %來自中美洲，其餘1.9 %來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在另一方面，2007年獲得美國永久居住權的拉丁美洲人中有19%的墨西哥人和5%的中美洲人。

但是，有相當大量的中美洲移民被驅逐出墨西哥。2001年和2007年之間，美國驅逐472956危地馬拉，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移民出境時，墨西哥驅逐了1,128,256移民。

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與公平貿易

所論及的這四個中美洲國家主要是農業國家，有特定產品進口到美國。傳統上這些都是“甜點”食物：香蕉，咖啡，糖，但是也包括棉花和牛肉。最近，又包括了由鮮花到荷蘭雪豆的一些特別項目。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多明尼加-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 - 多明尼加共和國也簽署了該協定）通過的兩年後，該條約承諾的發展沒有在四個國家中的任何一個實現。基礎設施的經常性缺乏，阻礙了農村農民參與國際貿易的能力。例如，在尼加拉瓜只有10%的柏油或水泥道路。雖然電力使農民的生產能力翻倍，但只有一半的尼加拉瓜有電力。另一個不利於尼加拉瓜農民的是，他們無法完成檔工作以便購買進行跨國貿易必需的執照。

正當多明尼加-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實施時，投入的費用急劇增加的同時，農產品的價格卻沒有增加。2006年1月和2008年3月之間，食品價格上漲68 %，大米的價格增加了一倍，玉米上漲了128 %，小麥上漲168%。大多數小型和中型中美洲農場無法獲得信貸。另一方面，美國農業能夠以玉米，大米，肉類，小麥和乳製品，進入這些國家的市場，從而破壞當地的生產。就業沒有擴大，儘管較大的外國公司雇用了更多的人；通常這些工人來自那些農場和企業無法謀生的農村和城市地區。因此可能會

產生就業機會，但他們支付的工錢往往是低的。各個國家向外的移民也沒有停止。

多明尼加-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下的知識產權，把任何藥品賦予美國專利二十年，從而剝奪一個國家生產非專利藥品的能力。最後，多明尼加-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打開了大門，讓外商獨資企業設立如大型採礦和水壩那樣的巨型項目。最常見的是，這些做法把人民，尤其是土著社區，踢出他們的土地或者威脅毒害水，空氣和農場周邊的土地。（“多明尼加-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影響和選擇，” 停頓的中美洲聯盟的第三次年度報告）

多明尼加-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同100億美元的中美洲一體化和發展專案配合良好。墨西哥和中美洲國家已同意建立一個綜合運輸和工業走廊，將與美國和加拿大連接起來。這個農業現代化，生產和貿易的系統意味著，農村人口，尤其是土著人口，將流離失所，以便使這些國家的自然資源可開採和運輸。它們包括石油，礦產，木材和電力。在危地馬拉，許多當地社區組織動員起來，反對這些工程建設，從而破壞了危地馬拉政府與多為美國和加拿大公司的各跨國公司所作的“交易”。他們並不反對發展。例如，他們願意用分散的，公有的和可再生的能源，滿足其能源需求，如太陽能電池板或小規模的水電工程，而不是修建大型水壩，那將摧毀他們的土地。（見西瑞爾·蜜雪兒可在‘中流砥柱’第117和119期的文章。）

兩個中美洲國家，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還簽署了拉丁美洲玻利瓦爾省替代方案（ALBA），該方案由委內瑞拉倡議，並在很大程度上由委內瑞拉作擔保。拉丁美洲玻利瓦爾省替代方案（ALBA）被看作是多明尼加-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DR-CAFTA）的一種替代方案。它依據的概念是共用每個國家的合作優勢，從而創造一個團結局面。該想法是這樣的，區域補償資金的建立將意味著實現社會經濟目標的一個有區別的處理方法。為推動這項工作，一些機構已經

建立，包括中美洲多國石油公司Petroalba 和 Albagas，多國電力公司Albaelectric。這是為了方便獲取遠低於市場價格與付款時間較長的石油。Albacom，Telesur和ALBATV是發展通訊的平行機構，同時ALLBA-藥品是非專利藥品的進口機構，以及ALBA-食品負責農業和工業供應。各個國家將負責執行這些專案，但在實踐中，它們由公共和私營部門的聯結機構實施。

但是，在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兩國，拉丁美洲玻利瓦爾省替代方案（ALBA）的簽署沒有任何來自民間社會的參與或協商。雖然大多數組織同意ALBA的社會，分配，教育，糧食安全和減貧目標，但關於如何實行這些目標的資訊的缺乏，指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透明度的缺乏。應如何分發援助？將應用什麼樣的技術標準？農村的最弱勢群體如何才能獲得優先次序？會不會有偏袒現象發生，直接再生或強化現有的不平等？

另外一個觀察中美洲的很重要的因素，是通過華盛頓的同“反恐戰爭”交雜一起的“毒品戰”，在該地區再軍事化中的美國利益份量。朝南方看遠一點，看看哥倫比亞，這就最清楚了。自2000年以來，華盛頓在該國已花費了超過50億美元的軍事和反毒品援助。總部設在美國的公司（奇基塔商標公司：CQB，德拉蒙德公司和可口可樂公司）被指控勾結准軍事部隊。

2008年6月布殊總統簽署“墨西哥計劃，”可以撥出16億美元到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國家以制定和執行反毒品、反恐怖主義和邊境安全的措施。一個月內，大赦國際呼籲調查為什麼美國的私人保安公司教授一些這樣的技巧，如“把被拘留者按在一個充滿糞便和老鼠的深坑，迫使水浸到被拘留者的鼻孔，以確保資訊”給到墨西哥警察。儘管墨西哥和中美洲的暴力不斷升級，華盛頓還是於2008年10月簽署了一項二百六十萬美元的援助薩爾瓦多一攬子協定，以打擊團夥。

讓我們來看看中美洲國家今天的狀況。回到自己的原籍國後，那些被驅逐者或因某些原因自願返回者，發現自己面臨的是什麼情況？對於那些從未離開過，或已經返回的人，政治經濟形勢是什麼樣的？

危地馬拉

在36年的內戰（從1960年到1996年和平協定的簽署）裏超過200000人死亡。在1980年代初期，軍隊，憲兵和“民防巡邏”，在分散於農村高地的450個瑪雅社區，他們組織開展了大屠殺。成千的人逃入山區，部隊在那兒追捕他們，毀壞莊稼和轟炸他們的營地。一些危地馬拉人能夠跨越墨西哥邊境，在那裏設立了難民營。在內戰過程中，100萬危地馬拉人成為內部或外部的難民。對於留在村莊的那些人，日常生活受到軍隊的嚴格控制。綁架，強姦，酷刑和失蹤是軍隊恐嚇居民的方式。後來的調查確定，在內戰中，軍事或准軍事組織觸犯了所有侵犯人權行為的93%和所有對婦女的性暴力的99%。

在2008年1月的就職演說中，總統阿爾瓦羅·科洛姆·卡瓦耶羅斯承諾他的政府是“一個社會民主的政府，一個關注社會的政府。”但是他還談到他的當選為“政治奇跡”，表明國家的公民系統仍然多麼脆弱。

作為和平進程的一部分，越過邊界，生活在難民營的難民，在困難的情況下，組織了他們的返回，並在國際觀察員的陪同下，得到了一些補償和土地。今天，1200萬人在該國居住。所有中美洲國家中，它的識字水準最低（70%）而土著人民的比例最高。它還擁有西半球最不平等的土地分配，2%的人擁有70%的生產用地。違反了11年前簽署的和平協定，軍力一直在增加，部署在城市和農村地區，施行內部安全職能。鑒於一年有5000多人被殺，內戰結束的現在，公民並沒有更安全。在過去的選舉週期，有50多名候選人和政治活動家被謀殺，而且每年有500-600婦女被殺害，但警察，軍隊和司法系

統並沒有調查，追查或懲罰對婦女或其他平民的犯罪行為。在一個高失業率和就業不足的國家，青年都犯罪化了。5年前實施“掃蕩計劃”（“掃蕩行動”），在首都部署4000後備軍部隊，像對待成年人那樣處理未成年人上升的犯罪行為。

另一項尚未付諸實現的和平協定之條款，是開放和解密安全部隊檔案的要求，並找到被殺害者和失蹤者的屍體。婦女，政治活動家和工會活動家的謀殺案中表現出來的暴力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有秘密武裝團體，他們依賴腐敗政客以促進國際販毒（往往與哥倫比亞販毒集團勾結），並維持對群眾的控制。這些依賴於政治家和前軍官的團體，也參與針對團夥和婦女的“社會清洗”。

衝突的解決辦法是暴力的升級：自2006年以來，在克特薩爾特南戈地區的科阿特佩克鎮，市政當局試圖強行將那些傳統的市場移至城鎮郊區的一個大市場，後者是用美洲銀行的錢構建的。這個大市場靠近一個垃圾場和兩個墳場，但攤位的租金比集中在一起的市場更貴。驅逐始於2007年年底；一年之後實施戒嚴。正在2008年耶誕節前，阿曼多·桑切斯，一個向供應商提供諮詢意見的律師，被人開槍打死。2008年1月13號，阿曼多·可拉宗·蒙松在其市場攤位開業時，被殺害。

2008年，最後的工會化的危地馬拉加工業區卻那（Choishin）關閉，而且沒有支付包括政府規定的遣散費在內的全部補償。一些工作人員堅持要他們的遣散費以及重新安置的權利並且不能列入黑名單。這可能會提醒我們注意這些作為共和國視窗的工人和他們的成功靜坐，但危地馬拉的情況將不會有團結勝利的這樣一個結局。

該國仍有一些工會存在，包括六個工會中的一個，伊薩瓦爾香蕉工人工會（SITRABI），根據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的規定提出申訴（連同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AFL-CIO），

指控危地馬拉政府沒有堅持勞動法或起訴反對工會成員的罪行。幾天後，其一名成員被暗殺在德爾蒙特的危地馬拉子公司的場地。作為一個工會活動分子在危地馬拉是危險的。2008年的前5個月，有八起謀殺案，一起企圖謀殺案，兩起過路車輛射擊，以及綁架和輪奸一名工會高層官員的女兒。

據危地馬拉人權監察員辦事處的觀察，在2008年的頭3個月，從美國向危地馬拉的驅逐案增加了20 %。大多數是在大規模工廠掃蕩中圍捕的土著人民。

薩爾瓦多

該國是中美洲最小的，人口最稠密的（700.00萬）。它是該地區第三大經濟體（在哥斯大黎加和巴拿馬之後）。與危地馬拉的土著人口占多數不同，其土著人口在1932年的大屠殺中已經被消滅了。自那時以來，傳統上的統治階級咖啡種植者用武力爭奪權力，給寡頭提供了鐵腕，充實了其高級官員和操縱政府的權力。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叛亂在1980年推翻了傳統的寡頭統治，但是，最溫和的反叛力量基督教民主黨，幾乎立即開始為自己奪得權力，並把自己與軍方結盟。這導致新的內戰（1980至1992年），使一十八萬人死於這場戰爭。

內戰過程中，幾個重要天主教徒被國家安全局殺害。最有名的是1980年的奧斯卡·阿努爾福·羅梅羅主教謀殺案，他被殺於主日彌撒講道中。1989年，6個耶穌會教徒，知識份子和政治活動家，他們的管家和她的女兒被殘酷殺害。在另一起案件中，3名美國修女被阻停在一個軍隊檢查站，遭到強姦和謀殺。軍隊試圖指責遊擊隊犯下這些罪行。

真相調查委員會成員發表的1993年報告的結論是，前將軍羅伯托·德·奧布松下令，明確地指示其充當“行刑隊”的安全機構，殺死羅密歐。委員會列舉了一些姓名，並指出政府工作人員隨後的掩飾行為，確保為殺手們脫

罪。5天後，立法機關通過的一項大赦法，似乎關閉了此案，不對侵犯人權者作任何進一步的懲罰。

薩爾瓦多的法律保護辦公室的大主教管區把該案件交給了美洲人權委員會，後者於2000年裁定，薩爾瓦多政府應對執法不公負責，並提出三項建議：全面進行調查和懲處所有直接暴力罪犯，賠償所有這些受害者以及取消大赦。將近十年後，薩爾瓦多政府還沒有動作實施這些建議。

事實上，執政黨民族主義共和聯盟（ARENA），儘管由來自銀行業，進口，電訊和農工業部門的強大商人領導，仍然在繼續發揚軍隊的作用。另一方面，民族主義共和聯盟（ARENA）企圖使馬蒂民族解放陣線FMLN — 遊擊隊運動中出現的主要反對黨 — 非法化，通過譴責它在內戰中的一切暴力，並把它同恐怖主義、暴力和今天的混亂聯繫起來，使它成為非法組織。

2006年9月，立法機關通過了一項特別反恐怖主義法，此舉全不顧社會運動，基督教民主黨和馬蒂民族解放陣線的反對，後者一致認為，該法案更多的是社會控制一個法律工具，而不是去阻止可能發生的恐怖主義行為。該法案似乎已經是民族主義共和聯盟（ARENA）計劃的第1號法令，其目的是懲罰其停滯的私有化計劃。

在整個1990年代，薩爾瓦多是該地區的新自由主義模範。它執行了一項結構調整計劃，放鬆管制基本菜籃子，促進了合作農業改革土地的銷售和放鬆對銀行的管制。推動一項稅制改革的實施，取消咖啡和食糖出口稅，取消資本財富稅和實施了累退增值稅。包括機場，電話和電力分配服務，城市住房研究所在內的大多數的國家經濟活動實行私有化。到2001年，它的經濟美元化。接下來的是供水及衛生系統和大部分教育的私有化。

反對衛生系統私有化的大規模動員，由衛生部門工會和在2002-04年佔據街道的衛生工作者帶領，成功地制止這一右翼專案。但成千上萬的薩爾瓦多人的參預，也使該國政府注意到，它將不得不訴諸更強硬的手段，制止社會運動破壞新自由主義項目的穩定。

在推出新的和有爭議的分散公共供水服務系統的計劃時，政府選擇在蘇奇多多（Suchitoto）市開始，該市自1994年以來一直由馬蒂民族解放陣線治理，政府以最挑釁的方式，精心準備軍隊和警察。2007年7月2日，社區組織在主要廣場舉辦了水論壇，並邀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社會組織參加。據大主教區的法律監護辦公室說，到早上7時，一個防暴警察特遣隊，警方突擊精英部隊和軍隊，配備裝有大口徑機槍的半坦克抵達。一位軍隊排長告訴在九公里外設立了路障的居民，他有總統命令，鎮壓任何公路抗議。居民要求停留3小時，他給了他們5分鐘。居民組合在一起，等待警方的行動，隨後該排士兵，在兩架直升機的支持下，發射橡皮子彈。在這一天，兩個社區遭到武裝部隊攻擊，14人被捕，62人受傷。在幾個月前新成立的特別指令法院上，這14人被指控。許多法律專家認為這些法院不符合憲法，這些法院的建立是為了處理涉及有組織犯罪和綁架的案件。這14個人被指控犯有造成嚴重破壞和對公職人員的恐怖主義行為。

薩爾瓦多有高額的犯罪和侵犯人權行為，據推測，這些行為與販毒和雇傭殺手團隊有關聯。因此，薩爾瓦多已處於“幫派戰爭。”2003年7月，立法機關通過了一項“馬諾度拉”（“鐵腕”）法律，主張12歲以上的青年人只要有幫派紋身或顯示幫派符號，立即入獄2-5年。2004年8月，儘管共有20000團夥成員被逮捕，但當最高法院宣佈該法律違反了關於兒童權利的聯合國公約時，其中的95%就被釋放了。

在2004年新的“超級馬諾度拉”（“超級鐵腕”）被立法機關通過。雖然，以團夥成員罪控告青年時，證據是必要的——從而正式遵

守聯合國公約——新法律加重了處罰（團夥成員處以2-5年的監禁，團夥頭目處以9年的監禁）。在過去的5年，監獄人口已從6000增至1.2萬，其中40%是幫派成員。然而，犯罪率仍在上升。

在過去兩年，16個以上社區積極分子、工會會員和馬蒂民族解放陣線（FMLN）的活躍分子被殺害，但當局意欲剔除殺戮的任何政治動機，而且這些殺戮真相仍未解開。例如，米格爾·安赫爾·瓦斯奎茲，電氣工人工會領導人，被兩顆子彈擊在頭部，是內戰期間的暗殺風格。

刑法於是作了修改，為“嚴重擾亂公共秩序”創建一個特殊的類別，增加對公開抗議的處罰。但是，人民運動仍在繼續，特別是圍繞著布埃布拉-巴拿馬規劃的道路，反對如熱電廠或集裝箱港口那樣的超大項目，因為它將破壞家庭和商業的捕魚活動。

選舉定於2009年初，先是市政選舉，然後是總統選舉。雖然執政黨有控制選舉機器和利用媒體傳播恐懼的優勢，馬蒂民族解放陣線（FMLN）還是全面領先。薩卡總統宣佈給公務員（1.84%的人口）加薪和19措施的所謂“同家庭結盟”一攬子計劃，其目的在選戰，而不是為社會投資。只有6-7%的國內生產總值將用於如教育和保健這樣的基本社會項目，薩爾瓦多人均社會投資在該地區最低。（拉丁美洲平均值為13%。）即使面對恐嚇，生活水準的下降和社會運動的恢復還是使馬蒂民族解放陣線（FMLN）在所有問題上，處在它享有的最有利地位。

到2007年底，估計每天有740薩爾瓦多人離開自己的國家去美國。

洪都拉斯

雖然洪都拉斯沒有遭受內戰之苦，在20世紀80年代它成為康特拉訓練營和美國的空軍基地的一個後勤基地。政府對付左派的方式是秘密地安排法外處決。

這個七百四十萬人的國家，每四名工人中就有一個以上的人失業。它有一個腐敗政客的歷史，這些政客使用他們的職權獲取財產，並且盲目支援美國在該地區的政策。去年春天，一群年輕檢察官的38天絕食迫使審查一些案件，這些案件記錄著著名商人和政客的腐敗。然後在9月份，其中最激進的絕食發起人，路易士·哈威爾·桑托斯被槍擊9次。雖然他活了下來，但他的腎臟和膽囊被摧毀；他的肝臟，膀胱，腸和肺被擊穿孔。洪都拉斯人要求做廣泛調查，要弄清楚總檢察長辦公室或最高法院裏是否有人要負責。

類似薩爾瓦多和危地馬拉設立的“強硬”措施，2003年8月，受紐約市長朱利亞尼政策的鼓勵，洪都拉斯採納了“零容忍”政策。除了幫派成員的12年徒刑（後來延長至30年），法律允許警察和軍隊合作，在城市地區的巡邏。在洪都拉斯，團夥對鎮壓措施回以不斷升級的暴力，並要求廢除該法律。隨後的一年，襲擊公共汽車，打死打傷乘客，這些事件頻繁的發動，通常是對團夥成員的法外處決的回應。在每個事件中，給總統的資訊被遺留掉了。然而，可怕的幫派謀殺案以及幫派已成為方便的替罪羊——似乎鎮壓他們就會解決該國的毒品，謀殺，暴力問題以及一個不公正社會長期存在的問題。

雖然梅爾·塞拉亞總統已經簽署了查韋斯拉丁美洲玻利瓦爾省替代方案（ALBA），它既沒有引起美國使館的強烈抗議，也沒有導致塞拉亞放棄新自由主義政策。一位記者稱它是純粹的“戲劇”。然而，被查韋斯稱作為“牛仔指揮官”的塞拉亞，可以用他對ALBA的懷抱迷惑基層人民。洪都拉斯開始在有利的條件下接受委內瑞拉的石油，還有在洪都拉斯加勒比地區勘探石油或建造一個水力發電廠的說法。然而，塞拉亞處在其總統任期的末尾；洪都拉斯在2009年將有全國選舉。



尼加拉瓜

有五百五十萬人口的尼加拉瓜是中美洲人口最稠密的國家。在1979年7月桑地諾革命把索摩查獨裁政權推翻，並建立一個基礎廣泛的政府，其政治領導層是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他們開始發動規模巨大的成功的掃盲計劃。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政府發現該國處在列根政府的圍困中。即使國際刑事法院譴責華盛頓在尼加拉瓜港口佈雷，令其賠償修復，也未能阻止列根政府推翻其政府的企圖。後索摩查時期的首次選舉，在1984年舉行，反對派抵制，而丹尼爾·奧爾特加當選為總統。美國資助的一個統一的反對派，參加了第二次選舉。當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很清楚會在1990年的選舉中失敗時，領導層本身準備移交權力給新任總統奧萊塔·查莫羅。丹尼爾·奧爾特加宣佈，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將從下層工作，也就是說，FSLN將與群眾組織一起工作，以防止20世紀80年代的革命進程倒退回頭。最重要的是，沒收索摩查和那些精英的巨大財產，大眾掃盲和一個民主政府的建設。這包括向公民負責的警察部隊，以及政府的第四個部門最高選舉委員會，其任務是執行透明的選舉進程。

1990年選舉的失敗，是由於美國給反對派的政治和財政支持，以及該國因為康特拉戰爭而筋疲力盡，康特拉戰爭得到非法的華盛頓協議的重大資助和武裝。另外一個因素是桑地諾民

族解放陣線（FSLN）政府的一系列錯誤：不適合農民或者國家的發展水準的一個模式的土地改革，以及誤解大西洋沿岸土著人民的期望。這些錯誤加強了康特拉支持者的基礎。

傷害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使它離開政權的是“皮納塔”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把政府財產轉移成了黨的財產或其最高級別官員的財產。當權時，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領導人從未設想過失去政權，因而並沒有區分政府財產和黨的資源。許多FSLN官員當時解釋說，他們獻身革命，現在一無所有。因此，他們認為自己有權確保自己的未來。

在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所有這些失算下面的是這個現實，即FSLN是一個奪取政權的軍事形式。一旦索摩查政權被推翻，它從未重新評估自己的角色。FSLN的軍事性質導致一個等級組織文化，使它不容易轉變成一個更適合於合作重組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的較多方面任務的組織。1990年的失敗後，在黨內開辦的質疑討論中，FSLN似乎願意討論和評價自己的錯誤，然後自行調節。但有跡象表明，討論只是表面上的，因為現實是：它的道德委員會從未評價“皮納塔。”過程（1998年，當奧爾特加的養女和FSLN成員祖拉莫利卡·納瓦埃斯，指控他性虐待時，FSLN道德委員會證明無法調查該項指控。10年後，她終於在美洲人權委員會撤回她的案件。）

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的內部對話，從來沒有產生過一個集體體制的黨。相反，丹尼爾·奧爾特加集團越來越多的佔據FSLN，擠掉然後驅逐那些提出了不同觀點的人。選舉失敗後，FSLN締造和領導的群眾組織，不管1979年革命之前還是1979年革命之後建立的，都採取步驟實現自治，婦女運動也取得明顯成功。但隨著FSLN在1994年的分裂，其領導人，如朵拉·瑪麗亞·特列斯和塞爾希奧·拉米雷斯離開另立黨派，就是今天所謂的薩迪諾革新運動

（MRS），其中許多組織回歸到政黨狀態。

在籌備1996年總統大選時，黨再次選擇奧爾特加作為他們的候選人，並且被保守和腐敗的阿諾爾多·阿萊曼挫敗。然而，FSLN在立法機構仍然佔有重大份額的成員，而且正如夏莫洛政權初期的情形那樣，能夠領導學生，工會和農民的群眾組織，走上街頭，反對政府的政策。阿雷曼需要購買社會和平，以穩定他的政府，而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需要重新在政府機構中出現，從而為重新掌權奠定基礎。經過30多個秘密會晤，協議出爐了；它導致基層組織的解散，使新自由主義成氣候。1999年，FSLN在最高選舉委員會只有一名裁判官，在最高法院只有一個或兩個法官。在總審計長辦公室設立了更多的職位，在最高選舉委員會（CSE），在最高法院，阿萊曼和奧爾特加塞滿了他們的支持者。

當公共服務系統私有化和出售國有資產時，該條約給阿雷曼，奧爾特加及其圈子中的人以不公平的優勢。國家銀行在2000-01年度破產時，該集團獲得數以百萬計的補償方案，這就突顯了該不公平優勢。

協議期間，針對阿萊曼的劣勢，奧爾特加獲得了權力。雖然2000年的選舉，奧爾特加輸給了時任阿雷曼的副總統的恩裏克·博拉紐，一旦博拉紐看到阿雷曼因腐敗被起訴，奧爾特加就能鞏固對司法和選舉機構的控制。阿雷曼被判處20年，是奧爾特加任命的法官允許他大部分時間在他的莊園服刑，過舒適的生活。

阿雷曼-奧爾特加協議，已經成為三方交易，增加了紅衣主教奧萬多·y·布拉沃和保守的天主教特權階級的一個部門。僅2006年總統選舉前一個星期，大回報就來了，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議員投票通過一項法律，撤銷19世紀後期的治療性墮胎法令。現在，尼加拉瓜與薩爾瓦多和智利一起，是少數幾個墮胎完全非法化的國家之一。在頭一年，就至少有80尼加拉瓜婦女死亡，因為他們無法獲得墮胎。這些

死亡主要是流產的結果。

由於選舉的時間安排，一些評論家認為，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被迫採取反墮胎的立場，但丹尼爾·奧爾特加和羅薩裏奧略·穆利羅，他的妻子和競選經理兩者都維護黨的立場。（作為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合作夥伴，奧爾特加和穆利羅2005年在奧萬多結婚。）

協議還允許對選舉法作兩個重要修改。首先，剔除了地方政黨或聯盟可以運作的機會，從而把系統推向兩黨模式。第二，特別規定，總統候選人不須贏得50%加1的選票，而只需多數，如果最高得票者，得票多於第二高的候選人至少5%就可以了。如果沒有這兩個修訂，在一場三方參加的選戰中，贏得38%選票的奧爾特加，就不可能成為總統。

即使在2006年選舉前，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給奧爾特加提供了他的政治和經濟支援。他承諾向尼加拉瓜提供價格優惠的石油，以及建立一個煉油廠，一個石化廠，連結比爾維（大西洋沿岸）與太平洋地區的高速公路，以及資助農村信貸計劃。然而，奧爾特加政府一直拒絕把這些援助包括在國家預算中，因為那意味著被國民議會所控制。民間社會，反對黨，媒體，甚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大家都要求讓這些援助的管理透明化。

由於奧爾特加的當選，很多人把他的勝利，同莫拉萊斯在玻利維亞，查韋斯在委內瑞拉和科雷亞在厄瓜多爾道的當選相提並論。儘管有分歧，即使在這麼短的清單中，丹尼爾·奧爾特加是比他們中的任何一人更為妥協的總統。他維持了同阿雷曼的協議，加深了他與保守的天主教特權階級的合作，沒能利用他上臺的第一年，迫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接受尼加拉瓜預算，優先考慮社會支出和進行避免財務透明度的戰爭。似乎沒有人確切知道，2007年委內瑞拉援助尼加拉瓜多少錢。總統奧爾特加宣佈為五點二億美元，一個月後，他報告的只有一半；中央銀行總計金額在一億八千四百九十萬美元。

雖然尼加拉瓜簽署了拉丁美洲玻利瓦爾省替代方案（ALBA），但沒有提供如何實施的詳細說明，還有擔心FSLN將利用其地位獎勵其基層。全國農業聯合會和農工合作社（FENACCOOP）質疑政府分發委內瑞拉化肥的方式，但被告知將根據“緊迫性”分發。然而，他們發現三個不同的價格：“黨員價格，一些協會領導人的價格和這兩組之外者的價格。”

就職時，奧爾特加建立公民權利諮詢會（CPC），把它作為一個“直接民主”的模式，穆利羅為其領導人。公民權利諮詢會（CPC）將是一機制，國家有關的任務，包括教育，住房和健康，將通過它開展。零饑餓和零高利貸專案（由穆利羅經管，由委內瑞拉的金錢資助）的受益人也由公民權利諮詢會（CPC）選擇。但是尼加拉瓜已經有民間組織的歷史。地方民主與發展網路同在農村，地區和市一級的公民委員會編織在一起。它獨立於任何政黨。其市政委員會力爭讓公眾討論市政預算，目前已被幾項法律承認。該網路獨立於任何政黨。儘管如此，奧爾特加政府仍致力建立一個與其競爭的組織，即公民權利諮詢會（CPC）。他的政府有意與反對派就他們的地位發生衝突，圍繞立法，用法院做最終的運行，通過下落不明的委內瑞拉金錢，建立了一個忠實的基礎。去年春天，丹尼爾·奧爾特加表示了他的決心，要給公民權利諮詢會（CPC）以憲法地位。在籌備2008年的市政選舉時，他要求FSLN的所有候選人簽字承諾，如果當選，他們將“服從”公民權利諮詢會（CPC）。

與此同時，奧爾特加政府在尼加拉瓜的300個非政府組織挑出17個，指責兩個組織——英國牛津救濟會和瑞典悉德論壇——非法給婦女自治運動資金。在這裏再次看到，正像卡洛斯·費爾南多·夏莫洛（他自己就是政府攻擊的受害者）所說的，政府要對社會運動作規範和控制，以便製造“民間社會的一種模式，一個不思考，只保持平靜而且簡單地服從的模式。”

（早在上世紀80年代，他一直是FSLN報紙‘擋風牆’（Barricada）的編輯。）

全國警察女警分所的總監，梅賽德斯·安皮警官指出，在2007年犯下的所有罪行中，40%是家庭中針對婦女和兒童的身體虐待或性暴力。馬那危婦女醫院的主任報告說，10個在他們醫院分娩的母親中，就有4個在15歲以下。其中一些已是第二次懷孕。鑒於對婦女的暴力行為，為什麼女權主義組織受到攻擊？首先，它是所有尼加拉瓜的基層組織中最自主的，第二，它一貫捍衛婦女的性和生殖權利。它講出了關於該國高頻的家庭暴力，並為爭取制度上的改變而奮鬥。然而，奧爾特加政府否認這些問題的存在。

2008年9月和10月，有一次，政府使用官方媒體作攻擊，攻擊著名的女權主義作家和活動家索非亞·門的內哥羅以及保護自治婦女運動。正如公民權利諮詢會（CPC）企圖取代FSLN無法控制的民間組織，該黨在2008年9月22日創建了桑地諾婦女運動（MMS）。其性別觀點是通過政府提供保健服務，信貸，教育和培訓。

由於路易莎迪·艾曼達·諾薩尼加拉瓜婦女協會（AMNLAE）是桑地諾婦女成立的一個組織，他們被迫加入桑地諾婦女運動（MMS）。僅僅因為他們不太明白邀請，其馬那危中心的兩個組織就被強力接管。但是，一旦有60個中心的AMNLAE加入運動，然後運動就要求其主席朵拉·澤勒東（前FSLN國民大會代表）辭職。澤勒東的辭職信概述了摧毀AMNLAE自主權和工作的訛詐和威脅。在新的領導班子下面，AMNLAE恐怕將接受再教育，學習什麼工作適合婦女運動。清楚的是，它將不會爭取恢復治療性流產的權利。總統本人就宣稱“希律王在尼加拉瓜尋找兒童殺害。”



事實證明，政府的反非政府組織運動所產生的敵意水準，是2008年市政選舉的熱身。最高選舉委員會（CSE）把登記選舉聯盟和候選人名單的日程提前，取消了北部加勒比海地區7個城市的選舉，然後接受和認證保守黨和桑地諾革新運動的候選人名單，取消了他們法律地位。廢止了愛德華多·蒙特亞萊格雷作為一個黨的候選人的權利，該黨就是他所創立的尼加拉瓜自由黨聯盟（ALN），並授予他一個接近FSLN成員的地位。最高選舉委員會（CSE）也拒絕認可觀察員小組。

大選前夕的暴力發生在萊昂和馬那危，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成員和其支持者在街頭攻擊對手。在馬那危大多數人口最多的社區，一隊隊的公民權利諮詢會（CPC）成員，身穿FSLN T恤衫，挨家挨戶地走訪，當面詢問居民，他們打算投票給誰，並寫下他們的回答，製造一種緊張局勢。

選舉日唯一允許在投票站的觀察員是黨的監察員。由於在選票上，五個政黨中的三個是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或其支持黨派，氣氛往往是恐怖的。當晚宣佈了初步結果，雖然FSLN的候選人被認為是劣勢者，但它卻在領先。

選舉後的上午，全國獲悉，馬那危電腦中心被軍管了，只有執政黨的技術員在裏面。第三，最高選舉委員會（CSE）公佈的初步計票結果，報告說FSLN 在90多個城市獲勝，但提供的是百分比，而不是投票的數量。

從垃圾堆發現部分燒毀的選票到發現一批尚未分發的選民身份證，當獨立的媒體記錄到越來越多的欺詐證據時，不信任在增長。選舉後的兩天，9名主教在尼加拉瓜主教會議發表了一項聲明，指出選舉的問題，並要求監測人員與最高選舉委員會（CSE）一起審查選舉的過程。道德與透明度監測人員（透明國際尼加拉瓜分部）沒有被准許以觀察員地位，儘管如此，他們仍然發表了初步報告，概述了9項嚴重違規行為。

在馬那危，最高選舉委員會（CSE）的結果表明，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的亞曆克·阿圭略擊敗了愛德華多·蒙特亞萊格雷（作為一個自由候選人）20000票。但是蒙特亞萊格雷堅稱，他擊敗阿圭略29000票，並且有證據。鑒於越來越多的國內和國際壓力，最高選舉委員會（CSE）同意迅速重新點票，但排除獨立觀察員在場。蒙特亞萊格雷不同意驗查。相反，他訴諸輿論，在新設立的網頁（www.voto2008.org）發送城市大多數投票站的點票結果的副本，並向‘新聞報’發放資訊。有趣的是，阿雷曼全力支持蒙特亞萊格雷的挑戰。立憲自由黨（PLC）拒絕承認選舉結果，並命令其代表和法官不要去工作。在立憲自由黨（PLC）裏發生了裂痕，阿雷曼的領導力下降而蒙特亞萊格雷的領導力則上升。

一群群的破壞者遊蕩了首都的街道，恐嚇人民。有報告說公共雇員用了數個鐘頭在街頭角落揮舞著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的旗幟，總檢察長克雷·埃斯特拉達對該報告作出反應，對一些記者說，“如果國家元首和FSLN政治領導人，丹尼爾·奧爾特加，決定號召他所有的支持者走上街頭，那就不會有一塊石頭靜

靜待在這個國家，或靜靜待在任何反對他的電視頻道或其他媒體裏。要感謝他沒有這樣做，由於這個管理著我們的人的智慧和平靜，他沒有這樣做。”

在過去的十年裏，尼加拉瓜團夥已決定暴力對抗，以同越來越多的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馬拉的團夥暴力相比較。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內戰結束時已經放下了武器。但是現在暴力正在醞釀。在最近的‘新聞報’一篇文章中，80個以前的幫派成員現在與‘和平青年’聯合指控說，政治煽動者已被招募，並供以頭盔，手槍，棍棒，迫擊炮和嶄新的砍刀還有午餐，巴士車費和金錢（3-5美元）。這是一些破壞者，他們包圍了反對黨並阻止他們抗議欺騙性選舉。幾天後，他們被捧為不下於羅薩裏奧·穆利羅的革命鬥爭的象徵。

公眾有質疑，為什麼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不退一步，允許最高選舉委員會理清最明顯的案件，以幫助該進程合法化？

首先，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計劃贏得100個市長席位。因為黨必須把自己弄成是多數黨而它卻不是，所以把欄杆設高。FSLN必須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工具以減少反對派。這包括使用國家機器滿足黨的需要；也包括使用恐嚇和暴力強制執行其權力。這次競選活動，就像總檢察長指出的，顯然是上層指導的。第二，“贏得”包括馬那危的105 市長席位，FSLN的市長們簽署了一項協定，服從公民權利諮詢會（CPC）的命令，CPC是由黨工作人員運作，由羅薩裏奧·穆利羅指導的機構。因此，市長們都陷入了一個對奧爾特加-穆利羅團隊負責的籬笆裏，控制的鉗子擰緊了。（立憲自由黨（PLC）獲得37市長席位，黨內只有4個會傾向蒙特亞萊格雷的勢力。）

獨立勢力哪里能反對這一合併的權力？一旦最高選舉委員會（CSE）有合法性，但他們就已被阿雷曼-奧爾特加協議腐化了。

警察受憲法制約必須服從總統。在萊昂選舉前的暴力的對抗中，警方提供了一個分裂的反應。但是，有證據顯示，奧爾特加正在增加一般指揮官，提升他的支持者並把最有經驗的警官退休掉。

仍然獨立的兩個機構是立法機關和媒體。對非政府組織發出的恐嚇，在競選期間結合反對派政黨和候選人的荒漠化已使兩黨制和一個國家-政黨-家庭規則的進一步鞏固。

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表示有興趣於進一步的憲法“改革。”目前，總統不能連任；奧爾特加要改變這種狀況。另一種變數可能是羅薩裏奧·穆利羅在2011年競選總統。奧爾特加還表示，他希望把公民權利諮詢會（CPC）寫入憲法，是否取代立法機構或作為額外的政府部門，還不明確。另一個可能的憲政改革將走向一個更加議會的制度，其中獲勝的政黨選出總理。即使FSLN是協議中較強大的合作夥伴，它仍然需要阿雷曼和立憲自由黨（PLC）。對於連續兩年的立法會議，它至少需要9個立憲自由黨（PLC）的立法者，以便通過憲法改革。然而，鑒於該欺詐的選舉，阿雷曼可能無法結束談判，並幫助推動修改憲法。

選舉立即導致立法危機，2009年預算沒有按照計劃的時間批准。在詐騙之後，歐洲聯盟凍結其付款（約80%的政府公共投資預算），美國也這樣做（大約為8500萬美元，它也是同一億三千萬美元貸款聯繫在一起的）。不過，12月1日丹尼爾·奧爾特加宣佈，任何因國際援助的凍結或撤銷造成的預算“黑洞”將改由委內瑞拉付款。

所有這一切權力紛擾對於大多數尼加拉瓜人是毫無意義的，他們每天的貧困壓倒一切。雖然奧爾特加談論“社會民主”的復興，譴責美帝國主義和歐洲殖民主義，奧爾特加政府第一個財政預算案的關注仍然是支付（不正當的）國內債務的新自由主義議程。查韋斯提供資

金，但奧爾特加分錢，彷彿是他自己的零用錢，從而加深該國的腐敗文化。

奧爾特加-穆利羅團隊是一個專制政權，煽動暴力，而自稱體現了桑迪諾遺產。它結合了左派面孔和銳利拳頭。

參考資料

我的主要參考來源：

- envio，一份月刊，涵蓋中美洲，但重點是尼加拉瓜。分英文和西班牙文在馬那危出版。其西班牙語網站www.envio.org.ni。
- NACLA美洲報告，雙月刊雜誌，涵蓋拉丁美洲。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摧毀治療性流產法律的這一醜聞已經被廣泛報導在美國主流媒體，這條法律見諸書本已經有一個多世紀。見卡倫·坎普維的文章“不左也不右：反女權主義時代的桑地諾主義”，2008年1-2月，第二卷，41，#1。
- 同樣重要的是聲援危地馬拉人民的網路以及支持薩爾瓦多人民委員會的網站。
- “多明尼加-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DR - CAFTA）：影響和替代，”停滯的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聯盟的第三次年度報告。非常有用的40頁的報告。

戴安·菲利是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和“中流砥柱”雜誌編輯。菲利是一名從零部件行業退休的汽車業工人。她是鋼鐵工人聯合會235地區的會員。

托派戰士的忠貞妻子——今年（2010）冬至有感

秋月

回憶1952年的冬至夜，反動的中共斯大林派將全國革命的托派，一網打盡。判囚由5年到30年左右的冤獄，有些受不了在獄中被折磨而死去了。至於坐滿多年刑期的人，被釋放回家時，已是白髮蒼蒼的老年人了！

在獄中他們堅持自己是「馬克思主義真正的革命者」。但掌了權的中共「背叛了無產階級」，反要革命者向反革命者下跪、「認錯」、寫悔過書，否則殘酷拷打，並經常召開群眾大會「莫須有」地鬥他們；除這種痛苦和委屈外，再殘酷的是要恩愛的夫妻離婚，增加精神上重重的痛苦。更令愛妻刑滿出獄後，會失去原先的工作。例如英文教師趙青音不肯和丈夫周仁生離婚，不但失去教師職位工作，連普通的家庭助理傭工都不給做。結果，只好做那些人們不肯做的工作（例如有傳染病危險的工作），這種血汗換來的錢，維持兒子和翁姑們的生活，堅持了二十多年，等到了丈夫出獄全家團聚。當周仁生見到愛妻的外表老到同他的母親差不多時，即刻向愛妻下跪。（此時我回憶周的下跪情景，忍不住流出了感動的眼淚！）

此外，我知道還有一位是李平的前妻：羅麗萍，她是織綢熟練工，同上述趙青音一樣的遭遇，不屈從中共的威脅，不和丈夫離婚。出獄後，政府不給她做正常的織綢工作。她只可做臨時工（若有人休假時），每個月平均只能做到人民幣30元。她將其中10元給丈夫的父母，給10元自己的母親，餘下的10元是自己每月的生活費。她沒有兒女，住在母親處，順便照顧母親。她也和趙青音一樣，守到丈夫出獄，夫妻團圓了幾年。不幸，她因癌病失醫而早逝了，享年七十歲。她是我所要好的工友、同志。

更有一位是周履鏘的愛妻錢慧初，她也同趙青音、羅麗萍她倆一樣不肯離婚，也同樣等

了許多年，和負責養大了兒子。恩愛夫妻令人敬佩！可惜她也如羅麗萍早逝！至今已三十年，正如其夫周履鏘以詩「十年生死兩茫茫」、「二十年生死兩茫茫」，今年是「三十年生死兩茫茫」，紀念亡妻。更特別的是：周履鏘三十年來「守孤」，不再婚。這樣的男子三十年來不再婚，全世界少有吧！

當然，除了上述幾位不屈服反革命者那些不合情理的威脅外，也有幾位無情無義的妻子，自私自利，接受政府壓力『同丈夫離婚』。

無良的中共繼承全世界有名的「千古罪人！遺臭萬年」的斯大林。斯大林背叛革命、背叛無產階級、背叛馬、恩、列、托，實行一國社會主義、實行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陰謀奪了權，用「莫須有」的罪名，殺了十月革命所有的領袖，甚至列寧、托洛斯基、高爾夫……也被叛徒斯大林害死或謀殺了！

斯大林以金錢和大量軍火，協助中共奪了當時腐敗透頂的國民黨的政權。中共爲了酬謝斯大林，在3年內滿佈全國特務，於1952年「冬至」夜一網打盡托派，作爲送給斯大林的生日禮物。以後中共實行和斯大林一模一樣的反動政策。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背叛了革命，背叛了無產階級，對勞動大眾專政、施壓，和大財團勾結，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窮富兩極、社會不安、戰爭四起、全世界人民生命受威脅。種種現象證明：資本主義已處於沒落了，它已無能解決現實的失業問題。唯有人民大眾團結起來實行革命，推翻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實行真正的民主無私的社會主義，人類才有前途！。

團結就是力量！這力量是鐵！這力量是鋼！比鐵還硬、比鋼還強！

所有民間的進步力量，請大家放棄成見，

團結一致。實行真正的社會主義。號召工廠工人罷工、農民罷耕、商人罷市、學校罷課、海、陸、空罷行，將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打得落花流水！組織公平合理的社會主義。唯有這樣的革命，才能解決全球的失業問題。沒有現時的一個人要做兩個人的工作，做得失魂；有人失業，無以生活、犯罪處處、社會不安。實行社會主義，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飯吃，公平合理，社會和諧，沒有戰爭，沒有人殺人。沒有將人民的血汗錢製造人殺人的核武、化武各種武器，這些武器將毀滅全球生命！自私的、戀權的統治者們自知現時的世界資本主義已到末日，於是想出向其他星球侵略，謀取地球需要的物質和市場。或者企圖自己移居月球、火星等的夢想？各國統治者也不願放棄自己既得利益和權力；他們寧可看著人類走向戰爭和死亡。

所謂：勝者王，敗者囚。現實是：反動者

王，革命者囚。不是嗎？請回顧俄國十月革命勝利推翻沙皇後，謀奪了權的斯大林就背叛了革命，培養特務，殺盡了十月革命的領袖們，再殺了劊子手特務滅口。斯大林自己有意令特務謀殺了同志後，再製造「莫須有」的罪名嫁禍革命領袖，而後再將革命者一一處死；跟著殺了劊子手特務滅口。斯大林自己培養的特務奧爾洛夫著書《斯大林罪行秘史》，暴露了斯大林所有的反革命實情。結果斯大林於1953年7月被他自己培養的特務害死了。活該！這位全球殺人千萬的「千古罪人遺臭萬年」斯大林，今竟然還有反革命繼承人！這些人也許是被權迷了心！

六四要平反！托派要平反！

2010年冬至夜

緬懷淑青大姐(轉載)

周履鏘



翁淑青大姐2010年7月27日逝世，終年84歲。今年四月我寫了短文《監獄之花》，寄給她審核補充，她回信提了一些修正意見。僅隔三個月，她就去世了。當雲芳電話告訴我時，噩耗使我驚呆，我事先不知她生病，未能去探視她。原來是她不讓家人告訴朋友。

淑青在中學讀書時，就接受托洛茨基思想加入托派多數派的社會主義青年團（SY），1948年高中畢業後到了上海，在一所小學任教，是SY教師支部的成員。她的終身職業是教員，是一名小學園丁，她一生為社會培育了多少花朵是無法統計的。

她作為托派的一員，對宣傳托洛茨基思想，很難說她有多大的貢獻，但始終是一位忠誠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在最困難的歲月，默默地堅持原有的信念。她與趙青音、羅麗萍等同志一樣，是為革命事業，為丈夫不惜犧牲幸福的俄國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式的人物。

1952年12月22日（冬至），中國共產黨大肅托派時，翁淑青也被捕，她除了與其他同志一樣受牢獄之災外，還多一層苦難。因為她當時已懷孕足月。經產前檢查，胎位不正，可能難產。她於12月19日住進上海寶隆醫院（現名長征醫院）婦產科候產。我的妻子錢慧初曾去醫院看望翁淑青，祝她順利生下寶寶。就在1952年12月22日夜間，住在產房的翁淑青也被捕了。因已臨產，直接押送到提籃橋監獄醫院，關押在一間小房間內，由二名女看守日夜監管。12月24日因難產施行全身麻醉產下一女嬰。監獄醫院條件很差，也不會有婦產科，翁淑青就在那樣艱難條件下，育下了“監獄之花”。產後經過四十天短暫哺乳，即被押到南車站路看守所和錢慧初、李淑荷等一起受審，還不許帶嬰孩。當時沈雲芳翁淑青夫婦都沒有親人在上海。沈雲芳是戴千里會計師事務所的職員。戴先生為人仗義正直，他毅然頂著立場不清的帽子，把翁淑青的女兒接回家中，專門雇了保姆撫養。

翁淑青、錢慧初、李淑荷等被視為受托派思想影響較輕的青年婦女，後來給她們辦學習班，1953年秋後釋放，由教育局另行分配工作，翁淑青分到靜安區第二中心小學，錢慧初分到市二女中，名義上繼續當教員，實際上是受管制的，以後的每次政治運動，都逃不脫受批鬥的命運。

翁淑青的丈夫沈雲芳判刑十年，期滿後還被迫留在青海勞改工廠就業。直到六十歲以後才回到上海與妻子團聚。翁淑青艱難地撫育女兒長大，她是為信念，為丈夫作出了很大的犧牲。

十多年後，沈雲芳和翁淑青團聚，後來又育一子。戴千里先生那時已年邁，過著艱難的生活。一次沈雲芳和翁淑青去看望病邁的戴先生，感謝他養育女兒之恩，而戴先生竟不把此當作一回事，毫無圖報之想。戴先生不僅對沈翁有領養難女之恩情，而且當年沈雲芳把會計師事務所作為托派對外通訊聯絡點之一，戴先生也是聞而不問的。戴先生已去世多年，他也是一位值得我們懷念的好先生。

還有，席時佳是溫州社會主義青年團負責人之一，1948年入英士大學外語系，解放後英

士大學併入浙江大學，席時佳畢業後隨丈夫到大連某大學任教。已沒有繼續從事托派活動，但1952年12月22日也在大連被捕，當時她已懷孕，1953年在獄中育下女嬰，又是一朵“監獄之花”。1952年後，我們與席時佳失去聯繫，三十多年後才通訊，見面時，幾十年後的重逢，談的話題很多，關於獄中育女之事，僅提及而未詳談。

翁淑青因為產後沒有得到調理，身體一直不好。但晚年仍關心政治，收集有關托派的文章複印寄給朋友。翁淑青思想純正，待人熱情，是同輩中公認的好大姐，大家都為失去了這位好同志、好大姐而惋惜。

我於今年4月21日，將《監獄之花》初稿寄給淑青，請她修改。她於4月28日給我回信。那可能是她寫的最後的文字。改正了我的一些記憶錯誤，還補充我所不知的內容。她的來信中寫道：“我和雲芳都想到，還有方則正的妻子夏秀嬋，夏建勳的妻子王崇媚也在上海監獄中產下女兒。現在方則正夫妻在美國，無法聯繫。夏建勳在溫州，我已和他通電話，詢問當年情況，他說妻子1953年7月在上海監獄產下女兒，只說那時很苦，其他不願多談。唉！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只有我們這些親身經歷過這場災難的人，才能體驗到其中苦味。”她的最後一句話，道出了常人無法體驗到的苦楚。

錄此作為對她的紀念。



煉獄(轉載)

周履鏘

我自從接受托洛茨基主義，投身革命，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SY)組織，對於被捕入獄，是有思想準備的。我一生被國民黨和共產黨逮捕三次，坐牢和變相坐牢長達三十五年，從二十五歲到六十歲，都是在獄中渡過的，受的苦難不少，但對革命無所作爲。



第一次被捕

1949年4月26日，我被國民黨逮捕，罪名是“共產黨嫌疑。”那次是國民黨對上海大學生的大逮捕。當時我是上海師範專科學校的學生。

1947年秋，我考入上海師範專科學校。那是一所由教育家董任堅爲校長的戰後初創學校，目標是培養中學教師。董校長聘請上海各校的名教授來兼任系主任和教授，孫大雨是外語系主任，陳仁炳是社會系主任，施蛰存、戴望舒是中文系教授，學校雖是初創，但師資是一流的。當年國民黨統治下的師範學校，是全公費的，吃飯也免費。學生大都是貧寒子弟，思想傾向比較進步，有中共或傾向中共的學

生，有托派一個SY支部；也有少數反動學生，大家視他們爲國民黨的狗腿子，背地裏破壞學運，向反動派告密。在對待反對國民黨的學運時，托派和中共同學的行動是一致的。托派SY支部的周履鏘、周儀、伍恭聖都是溫州人，當時溫籍學生有十多人，我們的活動主要在同學中，向他們介紹《青年與婦女》、《求真》等托派刊物。

學生自治會（解放後改稱學生會，似乎共產黨對“自治”二字犯忌）由進步學生掌握，實際上受中共地下黨的學聯領導。除了校內活動，包括出刊物等外，還組織同學參加學聯領導的學運，參加在交大學行的晚會，參加“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遊行。我也是學生自治會的成員，我負責宣傳，主編《師專新聞》，姚雪琴（親中共學生）和錢慧初負責與學聯聯繫。

1949年解放軍渡江後南京解放，到了4月，上海已成孤島。國民黨瘋狂地捕人殺人，1949年4月25日午夜後（即26日凌晨），國民黨在上海全市大肆逮捕進步學生。軍警包圍學校，師專全體學生從睡夢中被強迫集中到禮堂，一個戴面具的人（校內特務學生，不發聲）持黑名單指認，凡認定的，讓軍警押走，一共抓了15人，其中托派有我、周儀和同情者錢慧初三人。我們被捕的人先被押在附近的看守所，下午三、四點鐘，又把我們押上囚車，在市區鳴著警笛呼嘯西去，在達人中學（現在是建國西路的上海市監察局）門口停下，進去後已有數百名學生，以交大、復旦的學生人數最多。達人中學沿馬路樓房是教室，院子內是一個很大的天井，往北的一幢樓房都是小房間。後來我們知道，達人中學原址是法租界巡捕房之一，小房間就是當年的小牢房。當天被捕的學生都沒有

帶衣被，入晚，拉來一卡車軍用被子，一人一條。起初要將男女學生分開關押，交大學生怕女生吃虧，提出抗議，結果以學校為單位關押在沿馬路的教室，大家睡地鋪，一條被子當墊，二人合蓋一條被子，我和黎國華合睡，錢慧初和王佩清合睡。

當天被捕的約有三百多人。真正的中共份子或學運中的骨幹不多，大部分是參加學運的群眾。可能是共產黨事先得到消息，通知重要成員離校了。交大被捕學生中的陳唐堯是我在哲學班認識的，是托派的同情者。其他學校的學生沒有我認識的托派成員。

這次被捕的人都沒有受到刑審逼供，5月23日(我記得是21日?)起允許保釋，我和另三位師專同學由我的叔父保釋出獄。大約放了三分之一以上。其餘的被轉押到虹口中州路上海商學院。上海蘇州河以南25日解放，全市27日解放，當天看押的看守逃跑了，所有的人都出獄。這次四·二六被捕的三百多人一個也沒有被殺害。但後來得知，黑名單上當晚沒有被捕的人事後在校外被捕，有些人被秘密殺害了。交大的烈士穆漢祥、史霄雯就是兩例。至於為什麼沒有被害，大家也不知原因。

1996年5月25日上海新民晚報發表一篇《黎明前的鬥爭》，作者嚴祖初。文章談的就是“1949年四·二六事件”。文章披露，當時地下黨進行營救，交大黨總支成立“營救被捕同學黨組”，派38級支部書記徐光裕負責營救工作，找到名報人嚴獨鶴，請他聯絡一批被捕同學家長，他們向市府提出釋放無辜被捕學生的要求，並設法衝破新聞封鎖，把被捕人員三百五十二人的名單在大公報發表，使反動派當局十分被動。在社會各界輿論壓力下，偽市政府不得不從5月23日起陸續取保釋放學生。讀了此文，才知四·二六事件被捕學生沒有人被殺害，是地下黨營救，巧妙地與敵人鬥智鬥勇取得的勝利。新民晚報文章只說是交大成立“營救被捕同學黨組”進行營救，但我想此決非交大總

支部的自行行動，背後一定還有中共地下黨市委的領導。

第二次被捕

1949年11月×日(日期忘記了，相關的人都記不清，我記得是10月×日)，我被共產黨逮捕，罪名是托派。這次被逮捕的經過，我在《關於江浙臨委及其被破壞》短文中已有敘述，不再重複了。

這次共產黨的目的是取締托派的活動，逮捕了錢川、丁毅、劉毅、王國龍、趙養性、沈雲芳、胡振東，我本不是逮捕的對象，我當天到沈雲芳家被守候的人逮住的。當時被警告不許再活動，除錢川、趙養性關了十多天，其餘的人第二天都釋放了。

這次逮捕我的姓名不是黑名單上的，且只關了一天，所以我一直不把此作為一次被捕。

1952年12月22日全國大肅托時我被捕了，1954年宣判。我的判決書上寫上：“1949年11月被我公安機關逮捕教育釋放後，仍不悔改，……”這樣就判定我不是“初犯”了，而是再犯了，當局認定我被逮捕過，我自己再不承認，豈不有些“不識抬舉”了。所以把此算做一次逮捕，也成為我的第二次的被捕。



第三次被捕

1952年12月22日全國大肅托，一網打盡。我在福建海澄被捕，同時被捕的有周仁生、王禹石、趙養性、趙青音，還有幾個同情者。1954年底宣判，周仁生無期徒刑，王禹石十五年，趙養性八年，周履鏘七年，趙青音五年。

1955年我和趙養性被押到內蒙古集寧勞改，修築集二鐵路路基。所在的勞改隊是內蒙古勞改局第十四管教支隊，對外名稱是第二築路工程隊。開始我和趙養性同在第五大隊，但分屬二個中隊。這年年底調到包頭修包白鐵路，趙養性所在的中隊留在集寧，從此分散不知下落了，我成為孤單的一人，三十多年竟沒有和一個托派朋友在一起，全憑信念支撐著原有的思想。1956年調去修包蘭鐵路，從包頭一直往西。築路犯人幹的路基土石方工程是最苦最重的體力活，我從來沒有從事體力勞動，但身體尚好，托派雖然大都是知識份子，但歷來信念上重視體力勞動，不斷號召成員到工廠去，所以我在觀念上並不輕視勞動，只不過要過第一關。經過幾個月的咬牙苦練，終於過了這一關。從1955年到1957年二年多時間大都從事體力勞動。施工要掌握工程規格品質，幹部文化水準很低，於是在犯人中找文化較高的人做這項工作，我被選中了。於是成了犯人中的“技術人員”，也就是被“廢物利用”了，全天可以有一小部分時間從事非重體力勞動。

1957年冬，在我所在的勞改支隊近萬名犯人中挑選了三四十名犯人，其中有工程技術人員、醫師、技工。被告知調到一個勞改農場。坐了三天的火車，到了內蒙古東部呼倫貝爾盟紮賚特旗保安沼勞改農場。那是一個大型待開發的農場，占地三十多萬畝，宜墾地二十萬畝。農場有一個犯人技術室，我被分配到該室水利組，組內有一位犯人是水利老工程師，我作為他的助手，邊學邊幹。直到我七年刑期期滿，孤獨一人，沒有一個托派朋友在一起。後來知

道，1956年分散在各地的托派犯人集中到上海，組織到各地參觀，有些人提前釋放。可我對此一概不知，似乎我是被遺忘了。

1959年10月1日，十年大慶，頒佈了特赦令，之前還頒佈了刑滿釋放人員安置條例，釋放後不許回大城市。有一天管教幹部找我談話，對我說：“根據你的條件，可以特赦，但你的刑期快到了，準備把名額留給其他人了。”還問我釋放後有什麼打算，我說要求回家。他說：你家在上海，大城市的釋放人員不能回去，只能留場就業，但可把家屬接來，也可以請假回家探親。

到1959年12月月22日，我到期釋放，整整七年，一天也不少。釋放後不許回家，被強迫留在勞改農場就業。正式身份叫做勞動改造釋放留場就業人員，其實是變勞改分子為管制分子，當地人叫做“二勞改”。生活、學習（實為受訓）、勞動和勞改犯人沒有區別。只不過每月有十八元至二十多元的工資。就業人員發牢騷說：“勞改是有期的，就業是無期的，是變‘有期’為‘無期’了。”

從此，我從“勞改犯”變為“二勞改”，變“有期”為“無期”。我就這樣又“就業”了二十八年，前後加起來，共計三十五年。也即我從二十四、五歲一直到六十歲退休，處於被關押或變相管制的狀態下，把一生最好的年華都虛度了。與外界隔絕，沒有一個托派老朋友，世界的訊息都不知曉，唯有信念支撐著，毫無“悔改”之意。後來從中蘇的爭論中，讀到蘇共指責中共是托洛茨基主義者，中共反譏蘇共是托洛茨基主義者，從這可笑的對罵中，推度托派的“幽靈”仍然存在，內心得到欣慰。

我的這次坐牢、勞改、變相勞改的時間很長，半輩子的辛酸，非我笨拙的筆所能寫出來的。擬試在以後另文再寫。

2010年12月

記沈文銓(轉載)

林東

1952年全國大肅托後被捕判刑投入勞改的托案人員，1956年6月突然被從各地勞改單位調回上海監獄，集中起來編成三個小組進行學習（後來知道在那同一時期，武漢地區和重慶地區也是這樣做的）。上海地區集中了四十多人，這些人的刑期不同，五年、十年、十二年、十五年、無期，還有幾個尚未判決的。

北京來的托案承辦人員在市監獄長的陪同下，向我們講話，大意是：把你們集中起來學習，還要組織你們出去參觀，讓你們看看我們共產黨人是不是搞社會主義？！我們擺事實，講道理，用事實改造你們的反動思想……

這已是六十多年前的事，爲了說明承辦人員講這番話的口氣，我離開要講的主題，先絮叨點當時的實際情況：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徹底動搖了中國托派的一個傳統觀念：認爲農村包圍城市和農民戰爭是打不敗占城市的國民黨的。托派成員大都讀過馬列原著，腦子裏裝了一些有關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的概念。共產黨打敗了國民黨建立了新政權，有托派思想的人，不能接受新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社會和人民民主專政的概念。1952年被“一網打盡”，並判刑強制改造，在專政的壓力下，仍然是認輸不認罪。“成者王敗者寇”這句成語，是中國二千多年歷史演化的簡明寫照，具有中國特色文化。認輸不認罪，是當時托派成員的一個解不開的思想結子。1956年三大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宣佈進入社會主義了，同時又宣稱人民民主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看你們托派們還有什麼解不開的思想結子？我就是這樣理解承辦人員那番講話口氣的。現在回顧起來，1956年組織那次突然參觀學習，共產黨收到了一定程度的“教育”效

果。參觀學習結束後，繼續勞動改造，有的人就自認爲也在和人民一起建設社會主義了，勞動表現熱誠，受到獎勵等等，這是題外話，不談，言歸正傳，說沈文銓。

1956年集中起來學習時，我才認識沈文銓的。認識後，我和他很能談得來，知道他是讀東吳大學化學系的，在抗日戰爭快要結束時期，他與一些青年朋友組織過一個交朋友求知識性質的“翼社”，後來他和這個社團的一部分人參加了托派少數派。1952年被捕，被判五年徒刑。到1956年集中學習時，他的刑期還有一年多一點，當時我們都樂觀地猜測，參觀學習後，五年的減刑提前釋放，判重刑的也會減刑等等。沈文銓是個樂觀開朗又直爽的人，心裏有啥講啥，與人爭論問題時，他堅持他認爲對的，不怕得罪人。

參觀了兩個剛剛建立起來的農業初級生產合作社，公私合營的信誼制藥廠，公私合營的一家棉紡廠和國營第一棉紡織印染廠，彭浦機器製造廠和柴油機器製造廠，第一百貨公司，曹陽新村，復旦大學和一家市立醫院等。一個星期，每天上下午分別參觀一個單位。每個單位的負責人都向我們宣讀一篇事先準備好的報告，引導我們認識共產黨領導的正確、偉大。聽完報告後允許我們提出問題。

沈文銓是個最喜歡提問題的人，常提別人注意不到或不會提出的問題。比如，參觀曹陽新村時，沈文銓提問：“是不是勞動模範才有資格住？”大概給我們做報告的負責人沒有預料到我們會有人公開提出這樣問題，急促地回答：“是的，這是應該的。任何人都好爭取做勞動模範，也照顧到住房特別困難的職工。”又如，參觀上海第一棉紡織廠時，廠黨委書記詳細講了從國民黨手裏接下這個爛攤子如何改

造成今天這樣規模的全過程，這個廠生產的花布全部出口外銷，賺外匯購買我國急需要的機器，他還講了解放後工人精神面貌的改變和全廠職工人數等。黨委書記念完講稿後，沈文銓提問：“職員人數的比例是不是太大了？”負責人立即回答：“管理幹部有一部分是不脫產的。”

產生這些問題的思想根子是不相信史達林宣傳的蘇聯是社會主義，中國一邊倒，從老大哥那裏學來的是不是社會主義？

參觀學習結束後，刑期較短的調回原單位，據說，大都提前釋放，但都留在原勞改單位當留場人員，繼續受管制。沈文銓調到哪里去了，我好像當時就沒有留意這件事情。再次知道他的下落是1958年的事，在一次監獄內的廣播教育大課中，我聽到了沈文銓的名字，被上海虹口區中級人民法院宣判加刑十年！罪行有兩條：一是誣衊偉大革命導師罪，一是不服從管教罪。

據後來所知，他同其他犯人編組在一起勞動，不知在什麼情況下，他講了一句：“如果不是史達林，我就不會吃這五年官司。”他這句話，成了別人檢舉揭發立功爭取寬大，用來打小報告的材料。至於不服從管教罪，就是因為講了那句話本身，投入勞改時，政府工作人員，一再關照我們不准向任何人暴露案情，不能讓人知道我們的政治身份。

沈文銓所以講那句話，顯然是受1956年二月蘇共二十大提出的斯大林問題影響在思想上的反應。那時我的思想也產生過波動，好在我看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文章，知道中共的立場是極力維護斯大林，赫魯雪夫否定斯大林，鐵托全盤否定斯大林，明白了這其中的區別，我的思想波動受控，沒有亂說亂動，沒有說真話。這些又是題外話，還是言歸正傳。

1968年，沈文銓十五年徒刑期滿釋放，但只是由勞改犯人變成了留場場員，繼續留在安

徽白茅嶺勞改農場受管制。直到1983年以後才允許離開勞改農場回到蘇州老家，他祖上在蘇州留有房產，他無家室，無兒無女，與他的侄兒侄女同住。

從1952年12月22日被捕算起，原只判五年，後來加刑十年，整整關了十五年，之後又被強迫留在勞改農場管制十多年，前後共計三十多年，生命最美好的時光留在專政的大鐵門裏面了。

定居蘇州後，他常來上海訪友，托派思想反而更堅定，也曾替鄭超麟抄寫文章。平時省吃儉用，省下錢寄給困難的老朋友。每次到上海來，總到我這裏聚談。1991年，要我陪他到四川北路虹口區中級人民法院遞送申訴書，他要求為他的加刑十年平反。後來，我聽說法院通知他，撤銷了對他的加刑判決，還給了他幾百元的補償。沈文銓曾對我講過：當時法院的人問他有什麼要求，他要求連那五年都平反，法院的人說：“這要問北京”。

去年，俞益敏告訴我，沈文銓已不能自理生活，住進了老年公寓。我想到蘇州去看看他，也因自身多病未能成行。今年先後收到他的三封信。二月是賀年信，七月的信上告訴我一件事情，二年前，蘇州平江區刑事審判庭庭長突然到他家宣稱托派案是冤錯案，問他有什麼要求，他回答說，既然是冤案他要求平反，庭長說：“這要看北京”。八月，他知道我因病住院，立即寫信慰問，信文簡短情誼深，全文抄錄：“接小俞（益敏）來信，知道你近來身體不大好，特向你問候，祝你身體健康。想你收到我的信，心裏會高興一些，對健康也有幫助。我身體很好勿念。”僅僅是兩個月時間流逝，沈文銓也隨時間流去，不可再見，不會再收到來信。感歎萬分，寫此文祭悼。

2010年11月24日

[沈文銓2010年11月18日在蘇州病逝，終年90歲。]

追思沈文銓(轉載)

俞益敏

我和沈文銓，是1946年10月10日《學生日報》創刊時，當時總編輯包敬弟請我和沈文銓到編輯部擔任校對工作而認識的。他是“翼社”發起人之一，年齡最長，被尊為大哥。他在東吳大學化學系讀書時，曾患上肺結核而輟學在家休養，1946年的翼社召開社員大會，他也沒有參加。

1948年4月，我從國民黨中統局監獄交保釋放回家時，他已到上海和俞碩遺同在啓秀女中教書。當年8月周祖德任臺灣興台公司上海辦事處主任，請我參加工作，也請沈文銓兼任辦事處的會計，於是我和沈文銓又在一起工作了，對他也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他祖籍蘇州吳江，為吳江工商業地主。他有一個哥哥和二個姊姊，哥哥在上海錢莊工作，大姊在蘇州任小學教師，小姊在上海交大圖書館工作。他從小酷愛運動，尤擅長單杠。他的兄姊都很高大，唯有他長不高，他自己說是從小練單杠所致。

1949年春，他舊病復發，回蘇州休養，他在啓秀女中的課由我去代。1950年秋，他病癒回滬，到復興中學任教，住在校中，每星期六就去俞碩遺家。此時俞碩遺父親去世，他的繼母帶了二子二女共五人來上海居住，這樣俞碩遺經濟負擔很重，加上不善理財，我和文銓每月資助他才得以維持全家生活和弟妹的讀書。沈文銓的收入很大部分被俞碩遺花掉的。朋友有通財之義，但像沈文銓這樣仗義尚屬罕見。

1950年春，我加入了國際主義工人黨（中國托派少數派），才知道1949年少數派統一建黨大會時，俞碩遺糾集了沈文銓、楊寶驄、周祖德和嚴西成，以馬克思小組參加了建黨統一大會。俞碩遺當選為中央委員。我參加後與俞碩遺沈文銓三人成立支部，從此我們三人經常見面，支部會就在俞碩遺家召開。1952年12月22日對托派大逮

捕時，我們都被捕了。但分別關押，我們無法來往了。

1953年9月底，我從車站路看守所轉押到提籃橋監獄。沈文銓也押來了，雖沒有住在一個監室，但對我們管理較松，各室間能夠說話。1954年春，對我們判決下來了，我和沈文銓均判五年，我們二人沒有送去勞改。

1956年6月底，突然又把我們聚集在一起，在各地勞改隊勞動的托派也調來了，一起關在一號監二樓的東部，共約三、四十人。一天下午，將我們帶到一、二號監之間的小花園裏坐好，張芬、劉靜貞等女托派也來了。一位政府人員對我們講話，宣佈對我們實施參觀學習，看看這幾年共產黨在工農業、商業、教育等領域的建設成就，是否在建設社會主義？沈文銓和我在同一監房居住，從七月初開始每天帶我們外出參觀，整整一個星期，以後讓我們討論，再寫思想小結，這樣前後搞了一個月。我們估計是要被釋放了，但一直到9月下旬還沒有動靜。月底時，突然叫我和沈文銓拿好行李，將我們送回車站路看守所，關在新建監房底層一間大監房內。原來是俞碩遺受刺激太深而發瘋了，知道我們是俞碩遺的好友，希望我們在一起時可給以精神慰藉，同時也給我們任務，觀察是裝瘋還是真瘋。俞碩遺來時，是由兩個大漢扛頭扛腳扛進來的，蓬頭垢面，衣衫襤褸，一面還在高聲吵罵。沒有被服行李，我們走過去招呼他，他也不理我們，自歸自地用飯罐頭敲打地板和罵羅瑞卿，這樣共處約一個半月，政府幹部召見我們二次，我們均認為他是真瘋了。後來將他送精神病醫院治療，我們也就回到老監舍二人同室，每天除了在室內走動以活動手脚外，給我們看解放日報，也討論一些理論問題。我們知道赫魯雪夫秘密報告批評史達林個人崇拜問題，讀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等文

章，也得知波匈事件，蘇聯出兵匈牙利和蘇伊士運河事件等。我就對文銓說：我們的問題恐一時難以解決了。

1957年3月間，又把我們送到第九勞改隊（建築隊）勞動，在江灣建造體育學院，我們在泥工組，生活在一起。在斗室中關了四年多，一旦可以在較大範圍內活動，我很興奮，在腳手架上跑來跑去挑泥桶，扛水泥等；文銓體弱，就做些拌水泥等活。勞改時可以寫信給家人來接見，文銓就寫信給在交大圖書館工作的小姊來江灣見了面，並送了些錢和食品，我只有老母親一人，故只寫信報了平安，沒要她來，我被捕時身上也有些錢，我們就在“開大帳”時買了點副食品 and 訂了一份人民日報。

1957年6月初，又把我和文銓調到提籃橋監獄，住在關押監內服勞役犯人的三號監，我和文銓沒有關在同一監舍，但白天牢門不鎖，可以自由出入，沒有安排我們做勞役。和文銓住在一起的是二個年輕人，文銓與他們似乎很談得來。我對文銓說，這次把我們調回來，按刑期，我們還有半年多時間，我估計是要釋放我們了，這時要注意一點，這些年輕人都是小阿飛，不要與他們搞在一起。文銓認為他們都很講義氣，與他們談談沒什麼要緊。幾天後，其中一個年輕人不知為什麼對抗管教而關了禁閉，文銓竟走過去和他談話，並送餅乾給他吃，看守看到後阻止時，沈文銓非但不理睬，還與看守爭論起來，於是文銓也被關了禁閉。接著我被調離三號監到一號監二樓，見到鄭超麟等人。與文銓咫尺天涯，不能見面了。

1957年6月17日，公安局曹元良科長（帶我們參觀學習的負責人）找我談話，給了我上海市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書，認為我有悔改表現而提前釋放。就這樣我和錢思敬等多人，凡五年的提前釋放，七年的則為假釋。

我獲釋後在新成區聯合補習學校教書，1957年12月中旬，一天校長對我說：“新成分局有二位同志要找你有事，”就陪我到分局，我見到曹

元良在等我，見面後，就嚴肅地宣佈我被逮捕。我提出我又沒犯法，逮捕證上沒有寫明白逮捕事由，我拒絕簽字。當然仍被拷上帶到車站路看守所。我詢問再次逮捕我的理由，曹元良除了說有人檢舉揭發我不老實外，講不出具體事由。這樣我第二次被關進了車站路看守所。

1957年底的一天，車站路看守所要我們聽提籃橋監獄開寬嚴大會的廣播，我聽到了沈文銓的資訊：“沈文銓不認罪悔改，不服管教，加刑十年。”這是分別後聽到的唯一資訊。

我後來被送到軍天湖農場勞教，1980年1月我釋放回家，由街道介紹到吳涇中學教書，同年10月的一天傍晚，我從學校回家，先到我大哥家看望母親，聽到有人敲門，開門一看竟是沈文銓和鄭良，驚喜之餘，互訴衷腸。原來文銓被加刑後先是和鄭超麟等人關在一起，1970年1月被押到安徽白茅嶺農場勞改，刑滿後仍被強迫留場做職工，實際上是受管制。

後來我對再次被捕勞教，沈文銓對被加刑提出申訴，結果都得到撤銷，我們要求原判的五年一起撤銷，不予受理。

沈文銓於1983年才離開白茅嶺勞改單位回到蘇州老家。他加入過托派，也沒有做什麼工作，只判了五年，後來無辜被加罪十年，到期後還被強迫留場十五年以上，共計三十多年，一生最好的年華都在苦難中渡過了。沈文銓沒有結過婚，回家後已經六十多歲了，無兒無女，蘇州雖有房產，侄子對他也很好，但畢竟思想溝通困難，不免有寂寞之感，所以他經常到上海和鄭超麟、鄭良等老朋友聚會，來時住在我家，我們好作徹夜長談。還結伴外出旅遊，去過普陀山，長江三峽，龍虎山，北京，揚州等地。一次我和沈文銓，周履鏘三人，遊天下奇秀溫州雁蕩山，在溫州會見了王國龍、周仁生、錢思敬等十來位提籃橋關在一起的老朋友。有一次沈文銓和我到南京旅遊，晚上去逛夫子廟，天黑人多，我叫他注意不要被擠散了，結果不幸言中，還是跑散了，我四處尋找，也不見人影，只好到派出所報案，並要求民

警幫助尋找，一直忙到半夜，毫無資訊，害得我一夜不能安睡。第二天打電話給他的侄子，打算請他一起來找，他的侄子說，叔叔已經回來了，正在睡覺。原來他走散後又記不得旅館的店名和地址，急中生智，乘火車回蘇州了，我急得到處找他時，他已在家中睡大覺了。

1986年我突患坐骨神經痛住院，我寫信告訴了他，他接信後立即趕來上海，他說：“你住院沒人照顧，我來照顧你”，我聽了很感動。1999年我住處拆遷，所得的補償款不夠購新房，他得知後要匯給我一筆錢，我請他自己留下養老，購房款我已準備好了，但他還是執意給我。結果他特意從蘇州來上海，將錢給我，我一再婉謝，他說：“我到上海來沒地方住，你給我留個床位可以睡覺總是可以吧。”原來他大姊去世，遺產中分給他十多萬，所以一定要分給我，我只得收下。2000年，他80歲，我把他請到上海，老朋友二十來人爲他祝壽，聚餐甚歡。2006年，我也虛齡80了，他特地來上海爲我祝壽。這次也是兩桌二十來人，除家屬外，老朋友有十多人，而其中陳道同、周履鏘、沈雲芳、翁淑青、曹家聰、白素冰、黃慶榮等人也都屬免80歲，正是一群共同受過苦難的兔子大祝壽。大家歡聚暢談，互道珍重。

他離開勞改農場後，退休工資還是由農場發的，數量很少，只夠維持最低生活。他雖出身工商地主家庭，但平生自奉節儉，衣以蔽體，食以果腹。生活上非常隨便，毫不講究，帶有文人傳統不修邊幅陋習。可是他得知朋友生病或生活困難，只要他手中有錢，總是立即慷慨解囊幫助，周仁生生病，他得知後立即寄去數千元。

文銓生活在蘇州，又沒有說得來的朋友，過去常到上海會晤老朋友。我與文銓相識六十多年，情同手足，近年他對我說：“我現在老了，腦子記性衰退，耳又聾，聽不清，以後你要到蘇州來看我了”。我說：“可以，只要我能走得動，每年來看你二次，春秋兩季各一次。平時可多寫信聯繫”。自此以後，我每年去蘇州二次，在他家住三四天，陪他談天，他總是非常高興。他患

有糖尿病，治療過度，導致低血糖昏迷過幾次。有一次走在路上突然昏倒，幸路人打110後急送醫院。他的侄子爲防萬一，和他商量，請他進養老院，可以有人照顧，他覺得也是辦法，於是住到養老院。但他侄子怕他獨自一人外出時，又會發生跌倒等事，對養老院講不能讓他獨自外出，他外出時，要養老院派人陪護，這樣養老院阻止他外出。這犯了他的大忌，試想一個被剝奪自由三十多年的人，對自由是多麼地渴望，沒過幾年自由自在的生活，又要把他關在養老院裏不准自由出入，他怎麼受得了，於是吵著要回家，不願住養老院了。吵得他侄子沒辦法，只得打電話給文銓在上海的侄女，並打電話給我。我和文銓侄女就一同到蘇州，在養老院裏大家商談。我見到他身體尚佳，腦子清楚，以前因過度治療而引發低血糖致昏迷跌倒，現在吸取教訓，不過度治療，養老院有衛生員每週測血糖，可不致發生意外，應該可以讓他自由進出，但出門時對門衛講和記錄一下。他侄子總覺得不放心，我就對他們說，文銓失去自由三十多年，他心裏不能承受再被關養老院不能自由出入。以他目前身體和精神情況，獨自外出，應該沒有問題。在我的一再勸說並保證下，侄女侄子終於同意讓他自由出入而解決了問題。緊接著文銓又提出一個問題，他說：

“我每月的養老金，只夠付養老院的各項費用，這樣我就沒有零用錢了，寫信買郵票錢也沒有，何況訂報刊雜誌的錢，當然我還有點存款，但能用上多少時間呢？還有看病的醫藥費用更是無從籌措，若在家中，就可省很多，養老金就夠開支了。”文銓侄女說：“阿叔，你放心好了，儘管安心地在這裏怡養天年，當你的存款用完後，需要的費用全部由我負擔，一直到爲你養老送終。”文銓說：“你能對我這樣，我當然非常喜歡，但也覺得慚愧，當年我曾答允送你一輛自行車，那是你非常渴望的，結果錢都給俞碩遺拿去化了，沒有履行諾言，至今心存歉疚。”他侄女說：“我們小時候，你對我們的關心愛護，有時勝於我父親，我們是永遠銘記的，你就放心吧！”我當時

就將他們的談話記錄成文，由他和侄女侄子都簽了名，一式四份，各人都執一份，另一份存養老院，這樣總算解決了他不安心住養老院的事。

我仍和他約定，每年春秋二季去蘇州陪他住幾天。因為他進養老院時，與其他入無法相處，故他自己包了一室（三人住的），並留了一張床，為我去時可睡，所以我去時，也住在養老院，並在養老院搭夥，倒也方便。

今年10月17日，我又如約赴蘇州，我老伴認為我年紀大了，不放心我獨自前往，陪我同去。蘇州火車站正在擴建，只從北門出入，我弄不清楚，兜了幾個圈子才找到公車站，老伴走累了，就坐計程車，到達養老院已過了下午5時。在進大門時，門衛就對我說：“沈文銓已經連續幾次到門口，看你來了沒有。”可見他渴望和我會面的急切心情。我進去後，他正在吃晚飯，見到我們非常高興，要張羅到食堂去為我們買飯，我阻止他，說到外面吃算了，另外還要為老伴找旅館。

我吃好晚飯，為老伴找好旅館後回到養老院時，已經晚上8時，交談了一會就休息。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後到外面散步活動，6時30分，聽到服務員叫大家起床準備早餐，我就回到房間，見文銓還沒起床，覺得奇怪，因為以往我起床後，他也跟著起床，從沒到6時30分還不起來的，我走到床前叫他時，只見他眼睛發呆，人沒有知覺，我急忙去找到服務員，還打120急救車，服務員又打電話給院長，院長囑急送醫院，我就伴著同往附近的蘇州中醫院急診，醫師診斷為低血糖，立即為之吊點滴葡萄糖鹽水等，約一小時後，他醒過來了，問他怎麼搞的，他說大概昨夜服胃藥時，拿錯了藥，吃了降糖藥了。醫生囑住院治療，但他堅決不同意，說：“低血糖只要補糖就好了，我現在已恢復了，不必住院。”在他堅持下只好伴他回到養老院。

下午和他談天，一切很正常，到晚上9時許休息。19日早晨起床，我發現他床上被子翻開，人不在，我以為他去廁所了，走去一看，也沒人，就走回到他床的另一面，見到他倒在床下，一隻

夜壺則翻在他一旁，幸好裏面是空的。我將他抱到床上蓋好被子，去叫來服務員，又急送醫院，還是低血糖，進行了急救。他醒來後我說今天不管你怎樣，定要住院治療，他也答應了，但醫院沒有空床位，他侄子急速去人民醫院四院，找到熟識的醫師預定了床位，我就回到養老院拿了行李，待老伴回來就回上海，他坐三輪車上，匆匆告別。想不到竟成永訣，思之慘然。

11月18日上午，我去醫院開藥，回來老伴說，文銓侄女來電，說文銓今晨去世了。我急電他侄女。原來當天住進人民醫院四院後，第二天他就私自從醫院出來，走路不慎跌了一跤，把手跌痛了，且迷了路，由交警送他回養老院。在養老院沒幾天，又昏迷過去，只好再送醫院，診斷結果是雙肺纖維化致呼吸困難，嚴重缺氧，只能靠吸氧維持生命，因醫院病床緊張，只能將他轉入護理醫院。在護理醫院沒幾天，就在18日晨2點多去世，他侄子得到醫院通知後，就來電告知。他侄女又說：“準備20日大殮”，並徵求我對骨灰處理意見，我說：“沒有意見，你們決定好了”。我並對她說，追悼會我不去參加了，請她代送花籃，我將匯上200元，花籃上寫我和姚變成、鄭孝鑒、衛傑生四人，他們都是文銓的好友，一人在國外，一人在四川，均已年邁，不可能來蘇州送別了。我又順便發E-mail給計天明，他是藉雲龍和湯雪華的兒子，和文銓相識，我告知了他文銓去世的消息。

22日文銓侄女給我電話，謂匯款收到，她為我們獻了一隻花籃，寫上了四人名字，又說計天明大殮時去了，還和他們談了一會。又文銓骨灰安葬在他父親墓邊。

沈文銓，1921年9月8日出生，2010年11月18日去世，國人慣用虛齡，他終年90歲。文銓是一位抱有人生理想的一個好人，性格隨和，但他也很執拗，認准了的事，他會一往無前地去幹。他很重友情，很仗義。

為寄託哀思，作文如上。

2010年12月20日

青東農場管制七年

林東

(一)釋放證收回

一號監是重刑監，無期犯人都關押在這裏。我在此已被關押二十年。外部世界有春、夏、秋、冬四季的變化，有白天和夜晚的交替。監內的生活是日復一日地重複著，沒有任何變化。

每天早晨哨聲中起身，三人關一個小監室，內務整理得像部隊一樣，有角有楞。各層樓面的夜班主管幾乎是同時快速地開小監室門。鐵門、鐵鎖、銅鑰匙相互的撞擊聲，像一陣急風暴雨呼嘯而過。初來乍到時，震得頭腦發脹，嚐盡鐵窗滋味。天長日久，聽慣了，神經麻痺了，這陣金屬撞擊聲，變得像一曲生命交響樂。小監室門開後，馬桶拎到門外，樓面勞役犯把馬桶拎到樓下，一陣倒馬桶、刷馬桶的聲浪自樓下糞池邊傳來，有時因風向關係，還會飄來陣陣臭氣。勞役犯把馬桶送到每個小監室門口後，馬桶拎回室內，隨手把鐵門咣啷一聲關上。三人靜坐室內，等勞役犯送洗臉水，每人一大號搪瓷杯水。勞役犯收倒污水後，又送來早飯，飯裝在鋁盒裏，每人一盒。飯畢，空盒收走，整個監房變得靜悄悄的，等待日班主管來開門。

又是一陣鐵門、鐵鎖、銅鑰匙的相互撞擊聲，一陣震耳欲聾的交響樂。犯人都走出小監室，分組學習。學習到遠處伙房方向傳來飯盒裝車聲響，此曲只應天上有，心情振奮。只等樓面主管：“回房間”！接著是一陣咣啷關門聲，坐等吃午飯。飯後，自動勞動起來，把針織布的邊角料拆成回絲。樓上樓下又是一陣開門的聲響後，仍坐室內不動，一面拆回絲，一面等待分批下樓到兩幢樓之間的院內放風半小時。放風回來，隨手把鐵門咣啷一聲關上，繼續勞動，等待吃晚飯。晚飯後，日班主管來點人賬。所謂點人賬就是看看室有幾個人，同鐵門上的番號對一對；所謂收封，即將鑰匙插進鎖孔裏旋上兩圈——三道包險鎖。一天到此結束，只等哨聲睡覺。

明天，一切又重複一遍。年復一年，月復一月。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上午，該是開小監室門，放出犯人學習的時辰都過了，整個一號監都還靜悄悄的。

托派犯人都關在一個樓面，樓面主管開了我們的小監室門後，沒有再開其他監室的門就回他辦公的前陽台去。

這個不尋常的動靜引起我注意。三個未判決的人被通知拿好自己的東西下樓去了。他三人已被關押了二十年，尚未宣佈判決。

不久，兩個改造表現積極的被通知拿好自己的東西下樓去了。他們都是無期，已服刑二十年。

像是發生了甚麼事情，我陷入了胡思亂想。不知過了多久，我被通知拿好自己的東西下樓。走進一間辦公室，先調走的鄭超麟、喻守一、黃鑑桐、王國龍、葉春華、周仁生、蔣振東等幾個人都在那間辦公室裏，沉默地站在辦公桌周邊。

在一九九二年，鄭超麟寫的回憶中寫道：“公安局有人來向我們宣佈釋放，而且給了釋放証，我們都蓋了手印，但承辦單位立刻把所有釋放証收去，因為我們不能回家……”（《史實與回憶》第二卷二二〇頁）。

我不記得發釋放証的情節。那天我最後到那間辦公室的，或許在我到那間辦公室之前，發釋放証和收回的事情已結束了。既然又收回去，也就不必再給我了。

一位面孔陌生的幹部，在我走進辦公室時，向我招手叫到身邊對我說：“你的改造表現不怎麼好啊，今後你還要好好地改造思想！”這位幹部就是從那時起開始接管我們的事務一直管到九十年代退休的郁洪飛。

宣佈我們分別去勞改工廠（南匯縣周浦勞動玻璃廠）和勞改農場（青浦縣青東農場），繼續勞動改造。

煉獄的路，何其修遠！

(二)準備養起來

在辦公室吃過一頓監獄給我們準備的午飯後，在眾多幹部的陪同下，分乘兩部汽車離開上海市提籃橋監獄。

汽車馳出監獄大門後，鐵門在車後又重重地關上了。二十年的青春年華留在這兩扇鐵門的裏面。

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八年，曾分別在兩件玻璃器皿上，用一小塊金鋼礦石磨製上了我的生命印痕：在一個小瓶杯上磨上了個“笑”字和我的番號“七六〇”；在一個瓶茶杯上磨上一座橋和橋下的流水、磨上了一朵牽牛花和一行字“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各表述了在那兩個年代裏我的心情和心態。兩件器皿被我帶出了大鐵門，成了紀念品。

汽車馳出喧囂的市區後，在一條備戰公路（路面特寬，把路兩旁的護路樹砍倒，就是一條起落戰機的跑道）上奔馳著，車行路當中，兩側成了農家的打穀場和曬穀場。藍藍的天穹下碧綠的田野，呼吸著新鮮空氣，回歸大自然，心曠神怡。遠處農舍傳來雞鳴犬吠聲，幽然引發無限鄉愁，想起童年，想起童年的歡樂。

天聖莊甲一號是介於青東農場場部與農場幹部家屬宿舍之間的一排座北朝南的平房。它的西面隔一條拖拉機土路是幹部家屬宿舍；它的北面是片水稻田；它的東面隔著一片水稻田是農場場部；它的南面是塊桃樹林，桃樹林瀕臨一條可航行機船的河，河上有一座可供小型拖拉機行駛的石橋，橋南是個自然村——天聖莊。

這排座北朝南的平房共有十二間，每間約二十方米，每間朝北一窗，朝南一門一窗。這排平房的大門開在第二間，東面的一間供管教幹部住，西面十間的門上都寫了房號，一號是我們的學習室，二號到七號分住我們六個人，我住三號。八號放勞動工具和堆放雜物。九號和十號是十二中隊的倉庫，堆放蜂窩煤磚。

有一個很大的院子，東西長約三十公尺，南北寬約十公尺。院內有一棵棗樹，一棵蘋果樹，一棵梧桐樹。入住後，我們自己動手移植了十棵葡萄，割了很大的棚架。

室內已放好一張雙人床，一個書桌和方凳，都是新製作和油漆的。政府幹部宣佈我們每人每月生活六十元，公費醫療，可以接家屬

來同住或來探望。

農場派一位姓潘的幹部專職負責我們的事務，是一位因殘疾轉業的軍人，農民出身，文化程度不高，政策性很強。從他的談話中知道，對我們的安置是按照中央文件規定，他舉例說，這排平房頂高不達標，農場調了一百多勞教人員，用上幾十個千斤頂，硬是把這排平房的屋頂抬升了一尺。我們每月六十元的生活費高於農場普通管教幹部的月工資（平均四十五元），更高於刑滿留場職工的月工資（十五元），而我們在農場的身份是戴帽的三類人員，可我們又不同農場的勞教人員同吃同住同勞動，單獨安置一個住的地方，規定不與任何人員隨便交往。因此，這位潘隊長認為，政府把我們這些人養起來並且是養老到底。以當時全國的政治形勢和對我們這些人安置的種種措施看，潘隊長的講法並非他個人想像，可能是有根據的。

到農場的當天晚上，我把自己的屋門關了，電燈開著，在書桌前默默坐了良久。又把電燈熄了，在室內來回踱步，思緒萬千。昨天晚上，還關在監獄裏躺在小監室的木地板床上，等待次日早晨開門時那一陣鐵門，鐵鎖，銅鑰匙相互撞擊的交響樂。今天晚上，我用自己的手輕輕地關上屋門，又輕輕地開了屋門，走到院子裏，抬頭遙看滿天閃爍的繁星。人啊，生活在夢一樣的現實中。

到農場安定下來後，由農場醫院的醫生給我們幾個人全面檢查了身體，有病的治病。一九七二年下半年，我先做了內痔脫肛的手術治療，又用了幾個月的時間拔光全口殘牙，裝配了一口義牙。多年來不能嚼咬的困難解除。

政府把葉春華的妻子曹家聰從安徽白茅嶺農場調來青東農場，我們六個獨居漢有一人有了家室，是天聖莊甲一號院子裏的一件大事。

在“不反對，不支持”的政策規定下，鄭良積極找對象謀劃成家，也是我們這個院子裏的人都關心的一件大事。

周仁生的妻子趙青音陪伴婆婆，攜帶兒媳抱住小孫女從溫州來探親，一家老少四代人團聚，更是天聖莊甲一號院子裏的一件大事。

周仁生的母親是位心地善良的老太太，對人對事都很達觀。特地帶來溫州特產——老酒汗，送每人一瓶。此酒係用黃酒蒸餾而成，無色狀如白酒。又親手用老酒汗烹製油煎荷包蛋

給每個人品嚐，酒香蛋香，好吃。使人感受到人世間的溫情。

從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就有一個署名趙青音的人負責上海同南京的通訊聯繫，信上以姐姐自稱。一九四七年秋，我從南京來上海，在周仁生的住處，經介紹彼此才認識的。初次見面給我留下的印象，是個學生模樣的少女，喜歡說笑。二十多年過去了，人大變樣，沉默寡言。背負著托派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家屬雙重身份，在劫難逃，文革初起時，經常被拉出去挨批鬥，折騰得心力交瘁，連自己的兒子都不理睬她。

與周仁生初相識時，他尚未結婚。現在看到他一家老少四代人團聚，我為他感到高興。

周仁生住四號，我住三號，緊相鄰。回到屋裏，想到自己，一幅無兒無女無依無靠，無言話淒涼的黃昏晚景，感到無限悲傷！

(三)兩次回鄉探親

一九七三年八月，一天潘隊長交我一封從山東鄉下寄來的信。我們個人的信件，都是先由管教幹部老潘收下，然後再分送我們手中。

“家裏還有啥人？”我看信後，老潘問我。

“只有老母一人。”

“不能來麼，該回去看看。”

他這句話使我感到溫慰，也感到疑惑。安置農場時，對我們宣佈家屬可以來探望或同住，沒有宣佈我們可以回家探親。

“能行嗎？”我試問了一聲。

“你可以打個申請報告。”

想不到，批准了。老潘通知我做好準備，接著上海市公安局幹部鬱隊長和貝科長到農場，向我宣佈了路上和到家以後應遵守和注意的事項，又宣佈：“由潘隊長陪你回去，沒有別的意思”，解釋說：因為我離開社會久了，發生了很多變化，許多事情我都不熟悉了，買票、轉車、住宿等手續都由老潘辦理方便，等等。

其實不解釋我也明白，一個判無期徒刑的反革命犯人能夠獨自到社會上跑來跑去嗎？“沒有別的意思”，就是這個意思。這也是他們的政治職責。

列車是在黎明時分到達濟南站的。走出車站，即看到街上掛著橫幅，牆上貼滿了標語，

滿地是撕碎的標語紙屑在晨風裏翻滾著，兩家”革命造反派”為奪權還在惡鬥著。

從火車站到長途汽車站的路上，一些年輕小夥子拉著地排車奔跑，有的拉著空車奔向市區，有的拉著裝滿了垃圾的車運向郊區。他們是為生計而忙碌的農民，每天一大早趁在允許他們拉地排車進城的時間裏，進城撿拾垃圾積肥。在化肥還沒有發明出來的時候，北方的農民就有起早背著糞筐到村頭地邊轉轉，撿拾狗糞人糞回來倒在豬圈裏積肥的習慣，是祖上傳下來的一種肥田方法。

做官的忙於奪權，種地的忙於撿拾垃圾積肥。

人類社會歷史和自然界一樣，它們有各自的內在規律，都按步就班地發展著，變化著。

從濟南到我家一百八十裏路，在離我家五裏的公社所在地的集鎮有汽車停靠站。老潘住了公社的招待所，我還要步行五裏才能到家。

“近鄉情更怯”。我怯的是分別整整四十年後，將要見到我娘，不知她已老成甚麼模樣。分別時她三十五歲，陪送我走到村頭，我走遠了，回頭看，她還站在那裏望著。那時我十二歲。

“少小離家老大回”，唐朝詩人賀知章在京城做官，告老回到家鄉時的心情是輕快愉悅的。我”老大回”卻是回來與老母見上一面又要生離死別地”回去也”，淒慘！

看到我娘時的一瞬間，幾乎不敢相認。四十年間，時刻想念著她，三十五歲時的面影同眼前已蒼老的面孔復合不起來。視覺神經迅速地調整了焦距，還是認出來了。我喊聲：“娘”，扶她坐回坑沿上，相互對視了好半天，都講不出話來。無言的對視，代替了千言萬語。我察覺她用懷疑的神情注視著我的嘴巴，我立即明白了，她看不到那粒靠右嘴角的爆牙而疑惑了，我把全口義牙取出來給她看後，她滿臉皺紋中閃出一絲笑容。”和你老爺爺一樣，換了一口假牙啦！”認出來了，確信了，就好了。又是一陣沉默，又是相互望著，看不夠地看著。此時不講話比講話更能表述內心的深情。

屋門口走進一個人來，手裡提著旱煙袋桿大踏步走進屋裡，我三叔一面打招呼一面給我介紹：“劉大麥，是咱村支書。”我一聽官銜，肅然起立，頷首致敬。彼有幹部豐度，就像到

了自己家裡一樣，自行找了個小凳子坐下，先塞滿一煙袋鍋煙，用火柴點燃了，吧嗒吧嗒吸上兩口，對我三叔說：“我從公社回來，知道安東回來了，嗯，嗯……”。

“要感謝毛主席、中央偉大革命人道主義呀！”對我說的，我敬聽著。我猜想，他在公社裡一定見到了老潘。

“回來能坐多久哇？”

“批准一個星期。”

“那好，那好，能回來看看就好，嗯，嗯，忠孝不能兩全哪！”

我想不到他噙出了一句“忠孝不能兩全”。回來看望老母當然是孝，那個“忠”從何說起呢？看樣子他還有話要講，我只好等他又吸上兩口煙後，他又說：“家裡燒的，吃的都有哇？有困難向我講。”

“不缺，不缺。”我三叔代我回答。我跟著說：“我這回來，政府補貼了二十斤全國糧票。”

他走後，我才知道，他小時候沒有念書，當了幹部後，才學了點文化。

我回到家的第二天一大早，每家出一個勞動力到黃河灘割草當飼料。這是頭一天晚上通知的。我決定拿把鐮刀跟著去。割草的時間很短，很快把幾輛獨輪車裝滿了。他們推著獨輪回去後，吃過早飯還要到大田裡收割高粱。

我一個人留在黃河岸邊呆了一會，泥漿一樣的黃河水仍然是浪打浪地向東奔流不息，四野的景象同四十年前沒有兩樣，只是剛才來割草的一群人，都還不到四十歲。

回家的第三天是農曆七月十五，舊時稱鬼節，是給去世的人上墳的日子。我娘由我的堂弟用獨輪車推著到十多裏外去給我外祖母上墳，我沒有跟著去。一因，是上海公安局幹部貝科長要我注意的事項之一，要移風易俗；二因，我三叔也不主張我去，要我注意政治影響。

我娘是想要我同去的，說舅舅很想念我。我說不去，也沒有向她說明不去的理由。天下做母親的都是無條件順從兒子的心意的。我不去，她失望，但不勉強我。如今每想及這些事，總感到痛苦、難過，欠了一筆心債！

沒有跟娘去上墳，我跟三叔三嬸還有生產隊上的人，一同到河堤邊濕地裏去收割蠶麻。生產隊有一個搓繩小組，在我三叔的技術指導

下生產各類粗細不同的繩索，是生產隊的一項副業。

在我臨走前，我娘從木箱裏拿出一條新棉被給我。是她親手紡紗，親手織布縫製的。織被面的紗線先染成深淺不同的靛青色，拉配經紗，被面織成古樸的小方格圖案，被裡布是淡靛青色。共縫製了兩條，一條給我，一條給我弟弟。兩條棉被在她的木箱裏存放了三十多年，一直想親自交到我們兄弟倆手裏。等啊，盼啊，三十多年流水逝去，我的一條總算親自交到手。我弟弟的一條沒能親手交，那時我弟弟當軍代表在四川某高等院校支左。我娘去世後，弟媳回家帶走的。

走的那天早晨，我娘由我姪女著站在屋門口看我走。無言地分別了。上一次分別，一別四十年。這次分別，竟成永別。

第二次回鄉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上午收到三叔打來的電報：“母病危，速歸”。

老潘在把電報拿給我之前，他已同上海幹部通了電話，並已作出了決定。所以他說：“準備一下，下午走”。口氣是肯定的，申請報告也不要打了。

半夜時分，車過蚌埠，廣播裏突然響起一陣哀樂後，傳來了周恩來病逝的噩耗。整個車廂靜肅下來，有人發出悲慟的歎息聲。

在濟南換乘長途汽車，我在離家五裏的集鎮下車，老潘繼續乘車七十裏到惠民縣城終點站下車。因為是冬天，公社招待所條件差，他要到縣城找個好點的旅店住。約定好，他把住址通知公社轉我，有事電話聯繫。

我三姑家就在集鎮上，我先到三姑家，三姑一見到我就哭了，我什麼都明白了。

“把喪事辦完了，你三叔才給你打電報的。”

“你娘的墳就在西坡地。”西坡地就在我村的西邊。

有幾棵楊樹，有幾個墳堆，一家新的當然是我娘的墳，墳頭上的幡在寒風裡飄動著。我立在墳頭默默沉思娘的一生。在那父權和夫權的宗法社會裡，我娘命裏註定是時代變遷的悲劇角色，成了“五四”時期個性解放、婚姻自由新思潮祭壇上的犧牲，被丈夫遺棄。戰爭與革命的年代，兩個兒子捲入歷史的旋渦，被打成“反革命”的大兒子坐牢；當了革命軍人的

二兒子轉戰南北。反差太大了，精神上，感情上，不知她怎麼受住了。如今，期待與希望、不幸與痛苦都已埋入黃土，一切都得以安息。

辭母墳(一九七六年，一月)

西坡墳頭風微微，
漠漠落霞孤雁飛。
呆呆癡想空垂淚，
不聞慈母囑早歸。



回上海路經徐州，下車去淮海大學看望父親。陪行的幹部老潘也要拜訪他的幾位轉業到徐州地方的老戰友。他同我住進了徐州飯店。

自從“文革”開始以後，同父親斷了訊息。他受到了沖擊，挨了批沒有挨鬥。紅衛兵把他下放到農場勞動，校黨委書記又要回來，下放到圖書館當管理員。

我向他：“教育革命搞得怎麼樣了”？

他想了一會說：“幾個女學生，跑到圖書館閱覽室，坐在看書的桌子上，嗑著瓜子問我，‘老同志，我問你一個問題……’咳，師道尊嚴一點都沒有了”！

過了六年，一九八二年，我已解除了管制有了公民權後，去徐州看望他。談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日子裡，他說：“那時有許多教授挨批鬥，胸前掛一個牌子，牌子上寫著姓名，有的不寫姓名，就寫上‘X叫獸’三個字”！說這些話時，還是心有餘悸的神情。

我同老潘住了徐州飯店，買好了火車票回上海的前一天，他帶我去參觀淮海戰役紀念館和淮海戰役紀念塔。館與塔離徐州市十多裏路，位於雲龍山的南麓。那天是休館日，不開放。老潘拿出了兩個證件到值班室交涉，竟獲准了。兩個人在空無一人的幾個館這裡觀看了好

半天。出館後又去紀念塔。塔建在一座小山頭上，有一圈半人高的圍牆。我倆拾級而上進入圍牆後，看到紀念塔身四周堆放了許多悼念周恩來的花圈。看得出，前兩天在這裡進行過悼念活動的。幾個工作人員正在奮力地把一個個花圈拋到圍牆外的山林裡，有一個人清掃地上的紙屑，順手倒到牆外去。看到這一切，我正在納悶，把這些花圈亂扔山林裡，為什麼不燒掉呢？老潘喊我：“走！咱們回去！”

在下山的路上，老潘對我說：“回到上海，不要把看到的情況講給他們哪！”

(四)學習

一九七二年九月安置農場時，政府幹部宣佈我們要在學習與勞動中繼續改造思想。學習為主，勞動次之；以自學為主。還規定了我們每人自備必讀書籍和報刊：《馬恩選集》、《列寧選集》、《毛澤東選集》、史達林《列寧主義問題》和《論反對派》；每人訂《紅旗》月刊，六個人合訂《人民日報》。《解放日報》和《文匯報》是農場訂給管教幹部老潘的，轉給我們看。

每月我們六人可以集體到青浦城鎮購物一次，每年由老潘帶領到上海市區購物一次。到青浦城鎮我們總是先到新華書店看看。到上海市區，我們要先去福州路的幾家書店轉轉。我們可以自由地選購各自喜歡和需要的書籍和報刊。周仁生預約訂購《列寧全集》，他是讀外語的，在外文書店訂閱英文和法文報刊，置購了《英漢大辭典》和《法華大辭典》等，劉平梅預約訂購《馬恩全集》和《列寧全集》，黃繼桐預約訂購《列寧全集》，還買了《資本論》等書；葉春華買到《勘大林全集》和《列寧哲學筆記》等。我喜歡農場的生活環境，購置了有關農業知識和蔬菜生產的書籍。

管教幹部老潘看到我們每人都買了這麼多書，為顯示對我們關心盡職，叫我們自己動手做書架，順口念上一句語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林彪雖已葬身蒙古沙漠，人們還習慣“語錄不離口”。材料他想辦法，去請示了場政委和副場長後，他帶我和鄭良到農場場部的大院子裏鋸倒一棵已成材的樟樹和兩棵柳樹，我用勞動車拉樹幹到一個中隊的鋸木車間鋸成板料和木條，到場部倉庫借了全套木匠工

具。我們六人竟各自製作出了雖不像樣卻很實用的書架。葉春華手藝不錯，周仁生手藝最差。在農村環境，就地取材，因陋就簡，自己動手，添置點傢俱，別生一番情趣在心頭。

除了參加集體學習和參加勞動，我們大都是呆在自己的屋做自己的事情，很少到別人屋裡串門，一則免得影響別人的自學，二則那已不是“千杯少”，“半句多”的古樸時代。階級鬥爭（實是人鬥人）鬥得神經緊張，鬥得人與人之間無言語及真思想，無言表達真感情。象形文字“獄”字做得多麼惟妙惟肖！我呆在自己屋裏時，常把屋門關上，在朝南窗下的書桌邊，泡上杯濃茶，從右手牆邊立著的書架上取一本想看的書，潛心求索智慧，積累知識，自得其樂，陶然忘形忘機，也忘卻集體學習會上那些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偽的枯燥表態發言和無事生非的口舌仗。

一號房間是我們集體學習室，室內有一張長方形台桌和幾條板凳。每逢學習，各自捧著《紅旗》月刊和筆記本圍桌而坐，煙茶自備，態度彬彬然，氣氛肅肅然。我大都是到一號室坐下來才打開《紅旗》翻看指定學習的“社論”或“專論”，把“社論”或“專論”的主要旨意寫在筆記本上，以備表態發言時引用。學習小組長周仁生，稱職盡責。管教幹部老潘有時端一杯茶來坐一會，以示對我們學習的重視。其實，我們學什麼和怎麼學，他是管不了的，他只是傳達上海幹部的佈置，盡一點督促的作用。

主要學習兩報一刊的社論，學習各大批判組署名的重要專論。現在我還能記住幾個常發表重要專論的署名：梁效、羅思鼎、唐曉文、初潤、等等。

我們安置農場時，九一三事件剛剛過去一年。批林整風運動，批林彪極右路線和無政府主義思潮。繼之，批林彪極右實質。極左怎麼一下變成極右？有了個「形左實右」的說法。揭發出林彪題寫橫幅：“悠悠萬世，唯此唯大，克己復禮”，把林彪同孔孟之道綁在一道，批林整風運動變成了批林批孔運動。批孔子，批孔孟之道又掀起了評法批儒運動。歷史被想像化，大捧法家，大批儒家。在儒法問題上談古論今或借古喻今的文章越做越大：兩千多年的中國史是儒法兩條路線鬥爭史；秦始皇焚書坑

儒是一場革命，是對反動奴隸主代表人物的革命專政，是維護新的生產關係的革命行動，是新生地主階級的自衛措施等等。

楊榮國教授著文論證：“孔丘是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我在學習會上講了一句：“孔子是農業宗法制社會的思想家，怎麼會成了奴隸制的思想家？”小組裏有人批評我並引起了爭論。批評我的人並不同我爭論對孔子的歷史評價，而是因為楊榮國的論文收進了江青主編的並經毛澤東批傳的《林彪與孔孟之道》小冊子中，中共中央把它轉發全國當作學習資料。當時我們人手一冊。

對欽定的學習資料上的文章產生疑義，那還了得！“反對黨中央，一頂帽子放在桌上了！對批評者的立場、態度和動機，當時都是無可非議的。我只有力爭辯護我沒有反對黨中央的思想。我還說：孔子的思想是代表封建制還是代表奴隸制，這是對中國古代歷史分期有不同觀點的學術問題等等。記得有人提了一條不是批評的批評：「人家馮友蘭教授都寫了批孔孟之道的論文，批判他自己過去對孔子的評價。」這樣的意見，當時也是不能反駁的。（八十年代，馮友蘭教授對參加評法批儒鬧劇大合唱隊一事，作過反思自責：“只是附合當時流行的意見以求得某一方面的吹捧，這就是偽，這就叫做嘩眾取寵。……我在當時的思想，正是毫無實事求是之意，而有嘩眾取寵之心，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偽。”）

學習會上的爭論，引起管教幹部老潘的注意。晚上他到我屋裏來，對我講了如下一段話：“你們爭論的問題，我也弄不明白。從前我也聽說孔子是封建社會，現在又說是奴隸社會，到底是怎麼回事？你若認為你的講法符合馬列主義，你就堅持。如果不符合馬列主義，你就要接受他們的批評。堅持錯了，是不得了的。”

在小組學習會上我掛免戰牌，承認思想沒有改造好，但否認有反對黨中央的思想。

一場爭論的結果是，別人的批評都寫進了我的1974年半年思想改造小結，以後又寫進年終思想改造總結。

1975年，半年小結和年終總結時，仍要舊話重提。那是個只有向他人臉上抹黑才能顯示自己正確的年代。別人對我的批評仍然寫進我的半年小結和年終總結。

一九七六年是我國極不平凡的一年。一月八日，共和國總理周恩來病故；四月四日清明節天安門事件，鄧小平第二次被打倒；七月六日，共和國元帥朱德病故；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死傷二十多萬人；九月九日毛澤東主席逝世；十月六日，一場宮廷事變的現代版——“粉碎四人幫”，為鄧小平的復出填平道路。

一陣沙塵暴式的評法批儒鬧劇落幕。

看完戲，我鬆一口氣，不再擔心在集體學習會挨批評。一九七六年終總結時，小組會上誰都沒提去年前年事。我也沒提，是考慮到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的思想改造總結中，小組裏某幾個人給我提的批評意見，是受到上海幹部贊同的。

(五)勞動

安置農場後，分派我負責勞動方面的事項。

我們居住的那排座北朝南的平房北邊，有一塊低窪濕地，雜草叢長，蠅蚊孳生。我們安置下來後，一九七二年冬在這塊窪地的西、北、東三面開挖了一條長一百公尺，寬、深各一公尺的排水溝。挖溝的土方，填地墊高，溝邊栽種河柳條圍成籬笆牆。經過一九七三年大半年的陸續平整，修理成塊菜圃地，種上青菜、小白菜、茄子、辣椒等，還有黃瓜架、絲瓜棚；扁豆，紅豆爬上籬笆牆。自種自食，有田園生活樂趣。

每當集體學習結束後，我常帶件工具，到這塊菜圃，或鋤草，或捉蟲，或整修菜棵菜苗，或看蝶紛飛蜂忙忙，藉以調節已在集體學習會上弄得疲憊了的腦神經，舒展一下心情。

按規定，我們六個人是不參加大田勞動的；但每年六月，還是安排我們到大田勞動一個星期。收割冬麥和插早稻秧這兩項勞動我們是做不了的，叫我們到稻秧畦去拔稻秧供大田插秧用。每年六月搶三夏是農業最忙的時節，副場長用一句話形容這時節的忙字：“早上一片黃，下午一片黑，明天一片綠”。黃指的是成熟了的冬麥，黑指的是收割冬麥後耕翻的土地，綠指的經過一夜灌水耙平後田裏又插上了早稻秧。在全靠人力和畜力的時代，不這樣搶時間，就會誤了晚季稻的生長期而造成減產。

法國畫家米勒畫的《拾穗者》，在收割後的廣闊田地裏，有三個農婦，二個彎著腰用右

手在地上拾穗，另一個稍抬起上身，狀似累了喘一口氣。“粒粒皆辛苦”，中國這句詩詞在這幅畫中畫得傳神。我唸中學時，在一本畫書上看到這幅畫受到震撼，知農民的艱辛。

每年六月三夏大忙的那幾天裏，我在農場以及附近的農村公社的田野上，到處看人們忙收割，忙稻秧；牛們在鞭子驅趕下奮力忙耕田和耙田，到處都在忙，我們幾個人也去幫忙。對“粒粒皆辛苦”的涵義有了更深層的和更現實的感受。這才真是勞動改造了思想，提高了覺悟。

(六)給予公民權

一九七九年六月五日，在周浦勞動工廠受管制的六個人——鄭超麟、王國龍、蔣振東、喻守一、林華、李培，和在青東農場受管制的六個人——周仁生、劉平梅、鄭良、黃鑑桐、葉春華、熊安東，共十二名托派重刑犯人，集中到青東農場的小禮堂，參加了由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聯合舉辦的給予公民權的儀式。一個人一個人地從高級人民法院幹部手中接到《裁定書》。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裁定書

XXX，男，五十八歲，山東惠民縣人。

因反革命罪，於一九五五年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委員會軍法處判處無期徒刑，並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在服刑期間，有悔改表現，已於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寬大釋放，現決定給予公民權。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一九七九年六月五日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被逮捕。一九五五年五月，根據《懲治反革命條例》第四款，判處無期徒刑。經過二十年的監禁關押，於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以“在服刑期間，有悔改表現”為由，“寬大釋放”而不放，又送到農場嚴加管制七年後，於一九七九年六

月五日，“決定給予公民權”，才結束了從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被捕算起的二十七年關押管制，回到社會上，成了個無家無業者。

是因為「反革命罪」，“有悔改表現”而“寬大釋放”，不是平反。平反應是沒有罪才平反。那時候說托派無罪是不可能的，因為對托派的反革命定性是以一九五二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一版第一卷（直排本）的一六二頁“注三〇”為基調的。在半個多世紀裏，我國的政治書籍，《辭海》，《辭典》中有關托洛茨基、托派等條目，都是照抄“注三〇”的，這是個非同小可的“注”。在這個“注三〇”裏引用了斯大林於一九三七年在蘇聯共產黨中央全會上的講話：“……現實的托洛茨基主義，……是一夥無原則和無思想的暗害者、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兇手匪幫，是受外國偵探機關僱用而活動的工人階級死敵的匪幫。”那時代，蘇聯和中國，雖然還沒有發明出“最高指示”這個名詞，但斯大林的講話比“最高指示”更具有權威性。所以在這個“注三〇”裏也對中國托派作了個定性結論：“完全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反對人民的卑污工具。”中國托派被認為是反革命，托派份子被判反革命罪，正是這個“注三〇”所說的那些理由。

在二十七年的關押管制中的所謂思想改造，就是要接受“注三〇”的定性結論，承認自己是反革命。如果做到自覺地承認是“托匪”，甚至做出些變態心理的言行，那就是改造積極份子了。一九六五年，鄭超麟填寫一首詞《驀山溪》中，給這號人做了素描畫像：“不見舊相知，競低頭，然然可哥，徒勞爭取，照樣十三年。抬望眼，企天鵝，何處來寬大？”他那裏會想到，又過了一年，一九六六年“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風暴驟起。“競低頭，然然可哥”的「舊相知」，竟然像是出自內心地懷著一種義憤的樣子用手擦他低頭，他才明白了：“原來，犯人要表現積極，爭取寬大，甚麼事都做得出來的”（參看《鄭超麟晚年文選》第二卷二一九頁和四三二頁）。“舊相知”狂廢心機，徒勞爭取，照樣二十年加七年！

一九八八年蘇聯最高法院給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八年的幾起莫斯科審判案平反，証明瞭加給托洛茨基和托派的那些嚇人的罪名都是

莫須有的。那些審判案都是按照斯大林的口徑製造的冤假錯案。

一九九一年為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七十週年，出版了《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二版的第一卷一六八頁“注三三”，修改了第一版時第一卷一六二頁的“注三〇”。上世紀九〇年代出版的《辭海》、《辭典》等也相應地做了修改。在第二版第一卷一六八頁的“注三三”中，斯大林對托洛茨基主義的定性講話不加任何說明地撤銷了。對中國托派定性的那一句話也撤銷了，對撤銷的原因做了說明：“把托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共產國際內流行著中國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有關係的錯誤論斷所造成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一卷二七〇頁“注十八”和第二卷五一六頁“注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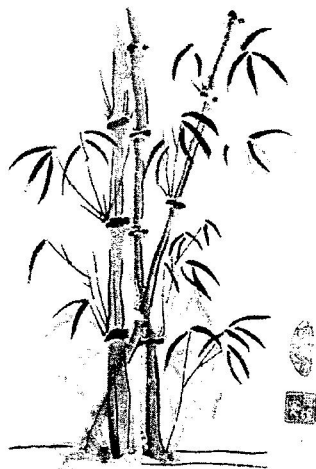
原來如此，是“錯誤論斷所造成的”！魯迅也大上其當！

中國沒有因“錯誤論斷所造成的”後果而給按反革命罪判刑的人平反。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前，我是上海市立長寧中學教師、教育工會會員、人民共和國公民。十二月二十二日被逮捕，判反革命罪，成了人民共和國的“敵人”。時年三十一歲。

一九七九年六月五日，“決定給予公民權”後，不分配工作，不安置工作單位，成了無業者，時年五十八歲。

二〇〇六年一月寫於石泉新村，八十五歲



2009 年工人及工會運動：聯合與分裂

卡林那·克萊門特

在 2009 年初，俄國工人階級以相當被動的方式遭遇到危機，儘管在 5 月至 7 月，我們看到一個激增的活動，最初是爆炸式的街頭行動，和其他形式的抗議，有關工作衝突解決的立法不能控制也沒有設想到這些抗議活動。隨後，我們看到一些勞資糾紛在緩慢而持續地增長，還有更多的集會在舉行。緊張局勢的增長，表現在公共空間以外，包括個人行為（絕食，靜坐罷工，有時候，甚至自殺）。

根據集體行動研究所（IKD）的資料來源，全年有超過 183 件的勞資糾紛（可能是低估了的數字），而且有上升的趨勢。在 2009 年上半年，有 62 個勞資糾紛——其中的一半發生在 5 月至 6 月。在該年的下半年，有 116 件糾紛（其中一半採取了集會抗議的形式）。

與 2007 年相比，抗議形式有變化：我們看到，取代罷工的是街頭行動。這是危機的一個結果（這使得停工成為高風險形式的行動），但也是勞動法的一個結果，因為勞動法使法律框架內的罷工現在幾乎不可能。由於缺乏解決糾紛的有效機制，工人被迫訴諸不受勞工法涵蓋的動員形式，如街頭的行動。

糾紛的地理分佈很廣——幾乎所有地區都受到或大或小程度的影響。最緊張的局勢出現在單一工業的城市[1]，那裏的城市居民站在工人的一邊。受影響最大的部門是汽車業，軍工業，農業，冶金業。但事實上，糾紛數量的增加，影響到幾乎所有部門。

工人主要的要求關涉到工資的支付和拯救公司免於關閉。換言之，防禦行動為主，這在危機時期完全不足為奇。但面對非常強大的雇主壓力，以及剝削率的增加，甚至防禦行動也給出了一個反擊的徵象。

事實上，問題不僅在於危機和所謂的客觀經濟困難。通常工人和工會會員無法相信自己所見到的：公司運行正常，甚至製造利潤，銷售情況良好，但這並不能阻止管理層利用這場危機，節省花在工人身上的費用：工資，工作條件，安全規範等。做各種事情以圖掩飾真實的財務狀況，不讓公眾和工人及工會會員（至少，真正的工會會員）知道真相。

事實是，由於危機或利用它，雇主對開始組織起來的工人，發動了全面進攻。自 2007 年以來，我們已經看到工人覺悟的興起，更大的自主性，以及組織起來的真正能力。顯然，在過去的一年，雇主盡一切努力要粉碎抵抗中心和自我組織的榜樣，這一趨勢越來越明顯。

他們的主要目標是真正獨立的工會。隨著加劇競爭的危機，同時也因為政府本身依賴寡頭資本，其政策是犧牲納稅人和工人的利益，給寡頭資本以慷慨的幫助，讓他們可以無重大損失地渡過危機，因而雇主的這些咄咄逼人行動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

對工人階級的全面進攻

私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經理人都肆無忌憚地侵犯勞動法。

首先，是採取不支付工資的方式。正如 20 世紀 90 年代發生的情況，工人轉化為奴隸，被迫無償地工作。此外，儘管勞動法規定需要雙方協定，雇主卻單方面降低工資，停止支付獎金，並且減少工時連帶大減工資。

更為嚴重的是，開始了大規模的裁員，這些裁員基本上都侵犯了法律，還威脅工人，強迫他們“自動辭職”。有時解雇被掩飾起來，其做法是把工人轉移到創立僅一天的公司（在陶裏亞蒂的奧托瓦茲汽車廠發生的事，顯然就是這種情況）。

我們看到了非標準就業形式的倍增，這些工作沒有任何保障。工資的削減，往往不符合實際的金融問題（情況難以核實，因為對賬目作系統性的掩蓋）。

談論官方的失業數字沒有意義（當局只考慮在職業介紹所簽過名的人為失業者）：在現實中，很少有人願意爲了可憐的津貼，排隊等候數小時，津貼在 890 間 4900 盧布（相當於 25 至 120 歐元）之間。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方法（依據能夠工作而且正在找工作者的申報人數）得到的資料，在 2009 年 11 月底，失業者爲 6 百 30 萬人，占職業人口的 8.1%。至於“隱性”失業者，即仍然視爲在工作，但沒有工資者，或因爲停工而只收到三分之二薪金者，還有非常多。許多人貸款還債，更不用說他們的基本生活品和服務的目前支出，這些東西的價格不像工資，它們在增加。

通常情況下，解雇意味著剩餘工人的工作量加重，而且，他們的工資則減少了。工廠檢查員注意到，精神壓力和超時工作時間的增加，導致生產事故，有時是致命事故大幅增加，使這種情況更加嚴重的原因是這個事實，即雇主毫不猶豫地克扣化在安全方面的錢，並用失業威脅敢於抗議者。

總之，工人要不是被拋棄到街上，難以生存，要不就是像檸檬被擠壓，被迫工作更多而賺取得更少。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中的大多數只限於被動的抗議示威。不少人寧願屈服並忍受現況，寄希望於雇主的善意和保住他們的工作。許多人求助於個別形式的調整適應，尋求與管理層達成協議，爲自己的一些益處討價還價。儘管如此，還是有一些人設法尋找第二職業，或者勒緊腰帶等待較好的時機。因爲危機，這些可能性大爲減少，我們已經看到絕望的人越來越多，他們起而進入自發的無人控制的群眾活動。

最重要的事是新工會數量的增加。越來越多的工人正試圖以集體的和有組織的方式，抵抗對他們權利的進攻。此外，這些新的工會在迄今爲至沒有工會的行業裏發展，比

如：媒體，食品，商業等部門。在百姓不滿的壓力下，許多傳統的工會被迫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

正是最強勢的工會組織，不僅是雇主，也是政府某些官員和代表的尖銳攻擊的目標。

雇主和政府：鎮壓與分化工會

俄羅斯資本家從來沒有把工會當作一個正常的現象，一直竭盡所能，要麼消除他們，要麼中立化他們，訴諸的手段有貪污，或者把他們納入公司的行政機構。今天，面對危機，面臨新的戰鬥工會的形成，加上也有一些目前仍然被動且忠誠於雇主的工會又有蠢蠢欲動的跡象，雇主及其經理們爲之恐慌，發動了加倍的攻勢。整體來說，他們得到政府和各級地方當局的積極支持。

應當指出的是，迫害，壓迫和歧視性措施，不只毫無節制地加在獨立工會上，也被用來反對隸屬於 FNPR[2]的工會，如果他們採取任何步驟動員其會員的話，也會遭受同樣的打壓。

是 OAO 康斯坦卡林信託公司（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地區）的總經理提出了這個反工會運動的標準。2009 年 10 月 5 日，在接受一個網路報紙的採訪時，他宣稱：“幾年來，工會像蟑螂和臭蟲一樣，一直努力用各種手段對公司進行滲透，讓我憤怒不已。對我來說，工會就像教派。如果一家公司出現了戀童癖者，嗜血者，撒旦信徒，如果他們變得比較強大，並開始吸引集體成員到他們纏人的粘網裏，人們就應當更易理解我爲什麼要攻擊他們。對我來說，工會激進分子也是一樣的：他們是損害公司，追求其物質和政治目標的操縱者……”

鎮壓工會的形式非常多樣。工會領導人被各種員警機關傳喚去“談話”，他們試圖控告他們組織非法抗議行動，或用他們蓄意犯罪作藉口控告他們。皮奧特爾奧·佐洛塔廖夫遭遇的就是這種情況，他是奧托瓦茲工廠團結工會的領導人，經常被各種機構傳訊。而不幸事件的代表者是維楞亭·奧如索夫，他是普若弗斯沃博達的工會領導人，遭到非法逮

捕，被判以 6 年監禁，藉口是擁有毒品。或用更加精心設計的方法‘CentreE’，該法尋求證明，成立工會的訴求 --- 就如在特維爾的琛特羅斯瓦爾瑪琪公司的汽車工人工會（MPRA）[3]派發的傳單內容一樣 --- 置於反“極端主義”法條下。

還有另外一個手段，在反對工會的戰爭中，現在廣泛為所有雇主使用：2009 年 11 月 3 日，憲法法院宣佈勞動法第 374 條違反憲法，因為該法條禁止未經工會領導班子的同意而解雇非專職工會代表，從而消除了工會活動分子在反對雇主任意決定的鬥爭中的唯一法律保護。獨立工會的中堅分子很少是專職的，而其活動讓雇主極為不滿，所以他們特別需要這個法條的保護。他們是特別被盯上的人，更加特別的是，拼湊所謂的罪行，並不是複雜的事。

最近的一些例子包括：依據一個“工作規則”，在 10 月 21 日，再從 11 月 11 日- 20 日，解雇通用汽車公司（GMAuto，在聖彼德堡）的 MPRA 工會主席 E.伊萬諾夫，以及一個女性工會骨幹 O.查菲科娃。他們的要求包括以下幾點：保證獎金納入工資，員工有權要求他們的假期，取消工作時間按年計算和引進每週 40 小時的工作。

但雇主的想像力並不止於此。有時，工會辦公室沒有絲毫理由地被去除（10 月 26 日的例子就是這個情況，根據民航當局的命令，空中交通控制者工會，一夜之間，就看到自己失去了在莫斯科的辦公室）。還有，工會活動分子被剝奪了通行證，讓他們無法自由地行走於各個工間場所。

在一些公司，散發傳單抹黑工會活動分子。有時，管理層召來民兵或特種部隊（內政部特種部隊）阻止一個抗議行動，一個資訊發佈運動或者很簡單的一個工會大會，10 月 20 日的卡熱爾斯基歐卡提奇公司的案例就是例子，當時索特斯普羅夫工會在那兒舉行一個大會。

反工會軍械庫的另一個發明是在罷工後扣押個人物品，比如圖阿斯平斯基海洋商業

港口工會主席 A. 史可阿卡洛夫的遭遇，他被 TMTP 海港公司管理層帶到法院前受審，要他賠償罷工造成的損失。

對工會領導人的攻擊，首先是替代性工會的領導人，尤其是屬於 MPRA 的那些人的攻擊，在數量上有所增加。然而，與 2008 年底的攻擊高潮相比，我們目睹了某種平靜，也許是大規模抗議運動（包括從境外的）一個結果，但也是由於雇主和總統任期這方面的戰術變化。某些媒體和一些專家把最近的這些風風雨雨同高層官僚操作聯繫起來，同中立化戰鬥性工會並控制它們的試圖連接起來。他們指出，2009 年 9 月至 12 月底，已有 3 個人事變動，為在總統任期內追隨工會負責。顯然，工會領域被視為敏感的問題，需要高度警惕。

政府正在玩一個挑撥離間損人利己的遊戲：一方面它默默地鼓勵雇主發動訴訟和實行其他歧視性措施，另一方面又同傳統上效忠政府的工會簽署協定，但協定內容相當空洞。因此，它是一個發展偽工會同時打擊“極端主義”工會的問題。

在建立虛幻工會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索特斯普羅夫新工會，自從 2008 年初以來，這個新工會由謝爾蓋·沃斯特列佐夫領導，這個人絕對沒有與工會運動有聯繫，但卻非常有可能同政府高層有非常穩固的關係。政府正在努力改造蘇聯解體後創建的第一批替代性工會聯合會，要控制它們並讓其擁護政府，同時給其一個獨立好鬥組織的外表。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事，這些做法的唯一結果是索特斯普羅夫事實上的分裂。

不過，整體而言，首選的策略似乎是“分而治之”：創建一個黃色工會（用下命令的方式），以便把它同一個過於棘手的替代性工會相對照，但是也賄賂某些領導人，允諾他們將在政府裏得到發言權，或挑起分裂，讓工會相互對立，或在消費者和工會之間播種不和諧。因此，去年冬天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所謂的駕駛者顛覆活動登場，反對的是俄羅斯汽車工廠的工人。

面臨所有這一類的伎倆，工會的反應是捍衛自己的獨立和團結高於一切。誠然，有某些領導人受賄，有的（極少數）嚇壞了，但多數人選擇了齊心協力和加強團結。

因此，福特工廠（聖彼德堡地區）工會發起聲援運動，他們的口號是：“聖彼德堡的工人，不是遠東工人的敵人”，對這個口號，俄羅斯積極公民會（在 2008 年底成立的一個網路型運動，抗議進口汽車關稅的增加）的回應是：“遠東的工人不是彼得堡工人的敵人”。至於獨立工會，他們發起了一個團結進程，準備融合全俄勞工聯合會（VKT）和俄羅斯勞工聯合會（KTR）。

最近，各部門，地區或行業聯合會的工會簽訂了互助協議。巴爾蒂卡公司的雅羅斯拉夫子公司的 APK 工會（屬於 FNPR），與福特汽車公司的 MPRA（VKT 的一部分）之間的協定，就是這個情況。另一個例子是包裝公司工會與樂華梅蘭（FNPR 的“商務”部門）工會之間的協議。

可以看出，我們正在目睹工會運動內部的矛盾動態：一方面，我們看到的是分散，另一方面是聯合。

至於政府，一方面它幫助雇主中立化工會，另一方面，它盡力減少勞工力量，但小心不要碰觸股東和董事的獎金，利潤和其他分紅。因此，來自聯邦預算的這筆錢用於支持大企業。另一方面，它大幅削減社會福利支出，削減工資隨生活費用的上漲而增加。2010 年，無論是公務員的工資，還是軍人的工資，最低工資，甚至失業補助金都沒有隨同價格上漲而增加。

用這一政策，政府向雇主發出一個明確的資訊：節省員工的開支。並幫助他們做到他們計畫不尊重勞動法的事：去年 4 月，政府，雇主和 FNPR 簽署了一份檔，申明了“暫時中止某些集體談判協定條款的”可能性。

很可能是這樣的情況，如果政府為了大企業的獨佔好處，繼續讓工人承擔危機的全部重量，它遲早最終將會遇到強烈的反應。

自發抵抗

2009 年，路障和工作場所外面舉行的集會是抵抗的主要形式。

一開始，工人面臨其情形的惡化，他們首先自己致力於解決公司管理層的問題，由工會出面作談判和訴諸勞動法規定的其他形式的行動。但這些方法沒有作用，於是他們越過公司的界限，訴諸公共輿論和向當局發話。這樣做，他們就不再是行動在勞工法的框架內，這也明確地揭示了這些法律的局限性。而那些採取行動者，是對以任何其他方式取得其工資感到絕望的人，以及非常擔心他們公司前景的人。

過去的一年中，可望有不少於 88 起的街頭工人抗議行動，主要是群眾聚會，經常在政府機關的辦公室前面舉行。從 5 月至 6 月，我們看到，在皮卡利奧沃（Pikaliovo）事件[4]後，設置路障的事件猛增（18 例）。

一般來說，至少每當工會加入他們的時候，街頭抗爭行動就被用來作為施加壓力的附加手段，並與其他措施相聯。他們的目的是訴諸公眾輿論和政府當局，以便突破與雇主的正面交鋒討論。在單一工業的城鎮和其他工人階級地區他們已經是大多數了。他們往往涉及大量的人，因為整個鎮或周遭地區的命運，就靠救援建立在那裏的唯一工廠。

在一般情況下，地方當局至少要裝著採取措施的樣子。但經驗表明，需要聯邦政府的干預，雇主和地方當局才會有真正的動作。這就是為什麼在大路設障（或這種設障封鎖的威脅），加上其他的行動，已經成為最有效的工具。皮卡利奧沃事件發生後，政府自己是這樣說的：“如果你想討回你的工資，就阻斷道路，否則政府不會理你！”迪米特裏·梅德韋傑夫總統威脅他的代理人和省長說，如果皮卡利奧沃事件的類似事件發生在其管轄區，就要解除他們的職務，這個訓斥開始生效：有時僅僅阻礙一條道路就足以令地方當局同意為私人雇主的債務承擔責任。

國家是否有足夠的手段來滅火和彌補竊取成性與不負責任的雇主的行為呢？顯然不

是。當年底，政府吹響了警報，向國家杜馬提交了一項法案，針對“非法干擾交通運行”（包括在主要道路設障）的犯罪者，設計了非常嚴厲的制裁措施。這個資訊是明確的：不，沒有錢，不，也沒有可能在工作場所的限制內獲得公平，儘管如此，但不要冒險上街頭！

下面是一些重大的街頭行動案件：

***皮卡利奧沃鎮（在聖彼德堡地區）**是這一波新抗議浪潮的象徵。2009年6月2日，這個城市的居民阻斷了從聖彼德堡通往沃洛格達的主幹道路。來自城市工廠的工人及其家庭成員，大約有300人，參加了這次自發行動。他們非常堅定地要求支付所欠他們的工資並且重新啟動生產。眾所周知，普京立刻以一個決定性的方式做了回應：在鏡頭面前，他迫使巴色爾特瑟-皮卡利奧沃的業主德里帕斯卡簽署檔，重新啟動其已經停產的工廠。在某種意義上，問題解決了。讓我們記住，2009年5月20日，絕望之下，居民試圖“風暴式地接管”市政廳，那裏正在開一個會議，專門討論這個城市的問題。參加本次會議的是本地公務員，檢察官辦公室代表，城市燃氣供應商，和本地公司的業主們。

***阿勒泰地區：ATE-配件公司**（以及從前蘇聯時期的巨型拖拉機廠解體而產生的其他公司）的員工開始發出一個新的皮卡利奧沃威脅。他們在公開信中宣佈，他們要封鎖主要道路和鐵路的意圖。從6月18日起，他們組織了一個反對阿勒泰地區政府當局的未經授權的糾察。引發這一行動的是弗拉基米爾·普京抵達巴爾瑙爾的消息。經過警方的干預，行動停止了，但當局不敢鎮壓示威參與者：不僅是因為他們對於被拖欠工資這一部分負有責任，而且還因為他們試圖暫時填補一下公司的訂單。7月，阿爾特拉克（Alttrak）工廠的工人，其家庭成員和羅布索夫城的居民與他們團結一致，進行了一系列街頭抗議行動，包括一次在主要道路設障的新嘗試，但他們被內政部特種部隊（OMON）擊退。從9月起，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地區分支機構動員起來，為組織示威和抗議行動提供後

勤支持。然而，一些觀察家認為，這種支援的實際目的是防止社會暴亂和新的道路封鎖。阿爾特拉克工人的最後一個行動發生在2009年12月1日，在新西伯利亞的RATM公司辦事處，該廠歸屬RATM公司（1100多工人參加了這次集會）。由於羅布索夫城（15萬居民）完全依賴阿爾特拉克工廠及其分包業務，工人的兩個基本要求是重新開工和支付拖欠的工資。

***基洛夫地區：**基洛夫地區的單一工業城市也有工人們動員起來，以挽救他們的工廠和城市。他們得到了RKRP[5]在當地分部的大會代表土如羅的支持。

►維傑斯基坡爾加尼鎮的摩洛特（Molot）軍備工廠的工人多次走上街頭。2009年6月26日，一場抗議集會在工廠管理辦公室前舉行，當時那裏在開股東會議。這並非是工人的第一次動員，他們已經數個月沒有收到工資了。同一天，工廠獲得國家補助金，工人得到了3個月的拖欠工資。2009年10月14日，發生了一個新的行動，警告要罷工，後來轉為自發的集會，要求全額支付拖欠的工資。

►基洛夫地區車帕提斯克的居民動員起來，拯救他們的小鎮免於生態災難。9月8日在Velkont工廠門前舉行的集會，導致了一個城市安全維護委員會的成立，其任務是在生態水準上控制公司和地方政府。

►在斯特熱基鎮，工人爭取保持矽酸鹽廠，包括把它轉變為一個在工人控制下的工廠（從司法角度看，這是非常複雜的）。在夏天，發生了一系列行動，要求支付工資，自2008年底以來，這些工資一直沒有支付，同時也要求他們的工作有保障以及挽救工廠免於破產。7月，鎮安全維護委員會成立，還有一個紮希塔工會成立。12月14日，工人前往基洛夫，他們在區政府行政當局辦公室前面舉行了集會，要求工廠保持開放，維護職工的集體權益，讓他們能夠在政府的援助下購買工廠，以便把它改造成為一個工人自治的工廠。

***伊萬諾沃地區：**一些工廠的工人動員起來，原因也是不支付工資。

▶ 3月5日，彼得羅夫斯基工廠的工人居住的住宅區居民，在一個行政大樓前組織了集會，要求支付工資，並要求該公司停止預謀的清盤。6月30日，工人策劃“朝莫斯科的工人遊行進軍”，但考慮到有關工資支付和搶救工廠的一些進展，最終決定推遲這一行動，代之以對地方當局施加壓力。在宣佈遊行進軍後，伊萬諾沃地區的州長邀請倡議委員會的領導人進行談判，許諾恢復生產和全額支付拖欠工資，以交換取消遊行進軍。

▶ 6月27日，門南哲沃集團的工人組織了在當地政府總部門前的遊行（未經許可）。

***烏拉爾：**烏拉爾地區的局勢非常緊張。

▶ 6月23日，波格丹羅維奇斯克（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地區）陶瓷工廠的工人試圖攔阻主要道路，以挽救他們的公司。150人參加了這次自發的行動，要求重新供應天然氣，因為該公司的債務，當天上午已停止了供氣。地區當局立即做出反應，經過他們的干預，天然氣供應得到恢復，否則，再過幾個幾個小時，熔爐將因為停爐而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害。

▶ 7月22日，列寧斯克庫茲涅茨克鎮的庫茲巴瑟勒門特公司（Kuzbasselement）職工組織了4個小時的罷工警戒，封鎖了市中心的列寧大街。大約300名工人（有些人帶著孩子），走投無路，要求支付他們的工資，10個月了，他們還沒有收到工錢。交通幾乎癱瘓了，這迫使市政府作出反應。副市長帶著承諾來會見示威者。但與會者拒絕撤走，除非他們獲得他們的工錢。只是在工錢（從地區預算中支出了3千萬盧布）進到工人的帳戶後，事情才平靜下來。

▶ 在鋁土礦的寡頭傑裏帕斯卡（Deripaska）裏面，新的爭端正在醞釀中[6]。9月份，在訪問塞威儒拉爾斯克（Severuralsk）後，集體行動學會（IKD）的會員變得相信這一點。從6月5日起，100名來自塞威儒拉爾斯克礦（屬於俄羅斯鋁業控股公司）的礦工在行

政辦公室前，組織了一個警戒罷工，在地上猛敲他們的頭盔一個小時：他們抗議取消食品配給，抗議工資問題和已造成數起事故的礦井安全問題。

9月，在各礦區，根據NPG[7]工會的倡議，籌畫開一個會議討論要求事項並確定一個行動計畫。但是，管理層的警衛和代理人阻止了會議，威脅要解雇所有參加會議的人。正如塞維儒拉斯克礦（Severuralsk）的NPG主席瓦列·佐洛塔廖夫指出的，“今天，回頭查看2008年3月發生罷工前夕發生的一切，你不得不說，他們什麼都不懂。”讓我們記住，當時123名克拉斯納伊阿-恰坡奇卡（Krasnaia Chapochka）礦山第三小隊的礦工，在轉移結束時自發地決定留在地下。

***在加里寧格勒，**是加里寧航空公司（KDAvia）的工人，以最堅決的方式動員起來，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資。7月，在司法檢察處開啓了幾個調查之後，各類人員展開了短期罷工。然後，有一些會議。在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和其他社會和政治組織的支援下，在市中心舉行了一個會議，該公司2000員工中有500人參加了會議。11月，經過幾個月的動員抗爭，員工們從地區的預算中獲得了拖欠工資的部分賠償和物質幫助。

***雅羅斯拉夫地區：**從1月到4月，電機廠工人和圖塔耶夫的居民舉行了一系列集會。隨後，圖塔耶夫市長辭職。在庫爾幹，在紮希塔工會的倡議下，幾家公司的工人，首先是來自阿弗托特蘭斯-寇幹（Avtotrans Kourgan）和普隆斯特羅伊（Promstroï）區的工人，在夏秋期間，爲了討回被拖欠的工資，開展了一系列的行動：糾察罷工，絕食罷工，在政府辦事處示威。

***符拉迪沃斯托克地區：**遠東地區未能免於糾紛，在所有部門都有糾紛發生。

▶ 5月13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軍艦修理船廠的工人舉行了一個次會議，以回應符拉迪沃斯托克地區工會聯合會的倡議。400人參加了會議：發言者譴責廣泛的不遵守勞動

法，不支付工資，以及不合理的增加行政人員的行為。

▶ 斯威特羅格爾利 (Svetlogorie) 的居民繼續鬥爭。4 月 4 日，他們中的大多數人 (約 1000 人) 參加了一個集會，地點在儒斯基-沃爾夫拉姆集團 (Russki Volfram combine)，要求還清工資 (有數月未支付)，並為兒童提供免費餐。當時，整個周遭地區都在挨餓。從 8 月開始，公司再次開工，年底，斯威特羅格爾利被納入政府單一工業城鎮的發展計畫。

▶ 符拉迪沃斯托克地區的採礦和礦石加工公司的工人也動員起來。3 月 11 日，他們中的一千多人，在達利涅戈爾斯克街頭遊行，要求降低社區服務的收費，並要求定期支付工資。發起這個行動的是博爾集團的工會，它得到該地區金屬和化學工業工會的支援。健康，教育和文化部門以及木材業的工會代表也出現在其中，展現出他們的團結。

***最北部 (北極圈以外) 亦是動員場地。**

▶ 5 月 24 日，超過 1000 人參加了在沃爾庫塔的一次集會，地點在市主要廣場。這個城市的礦工們和居民要求沃爾庫塔烏果爾 (Vorkutaugol) 的管理層放棄勞動力削減計畫，並且要求市政府阻止社區服務費的增加。示威者還要求，在礦區死亡的礦工的遺孀應搬遷到另一個地區 (有 100 家庭提出了請求)。

▶ 4 月 10 日，在摩爾曼斯克，根據北方艦隊工會的地區分部的倡議，舉行了一次集會，有數百名工人參加，他們來自為軍隊工作的八個公司。與會者要求國防部支付他們被拖欠的工資。這一行動有了效果，支付了部分工錢。

▶ 另一項行動的影響，可同皮卡利奧沃事件相比，不僅是因為其規模而且還由於這一事實，即讓它發生的動機來自於通常的被動者：醫生和醫院工作人員，他們在遊行示威，要捍衛衛生系統。5 月 19 日，在阿爾漢格爾斯克 (Arkhangelsk) 有 450 人參加了集會：有來自阿爾漢格爾斯克，北德文斯克，新德

文斯克的醫生，以及來自該地區的專家。他們要求醫院配置高品質的設備，因為那是優質醫療服務必不可少的，同時要求改善工作條件和增加工資，並採取措施，處理該地區的私營診所工作人員短缺的問題。6 月 29 日，在醫院場地舉辦了一個警戒罷工，支持那些受到紀律懲戒措施威脅的醫生。結果到了這個地步，醫生們威脅要罷工！

***陶裏亞蒂：**我們不能不提到陶裏亞蒂的伏爾加汽車公司 (AvtoVAZ) 的群眾集會。地方和聯邦行政當局並非沒有注意到，為拯救這個汽車業巨人和保護就業而採取的行動：結果是一大批的 (通常是空的) 承諾，威脅，“軟”性重組計畫和其他各種伎倆。儘管有強大的壓力，幸虧獨立團結工會堅忍不拔，8 月 6 日和 10 月 17 日在文化宮廣場和工廠的工程部，分別舉行了兩個比較大的集會 (2000 多人)。在陶裏亞蒂，現在的問題是工會運動的能力，更廣泛地說，是社會運動的能力，是建立一個廣泛陣線，影響政府的工廠型城市政策的能力。彼得·佐洛塔廖夫，團結工會的主席，清楚地總結說：“面臨在陶裏亞蒂嘗試工廠型城市的新計畫的意圖，我們不會無所作爲。我們要拯救我們的城市，我們的產業。我們正在尋找辦法，使我們能影響我們的未來，把工人和居民的利益考慮進去”。

總之，我們可以說，如果集體行動進行得堅決果斷，同時伴以道路阻塞的威脅，比如在圍繞單一工廠建造的城市中，那麼地區和聯邦一級的行政當局不得不進行干預並承擔責任，至少是部分地為破產公司業主的債務負責。

罷工行動潛力的維持

同 2008 年一樣，占主導地位的是“危機罷工”，停工的原因是不付工資 (勞動法設想的罕見罷工形式之一)。但也有一些進攻性的，在真正意義上的罷工：面對一個不想對話的雇主，集體停工以捍衛一系列的要求。在 2009 年，有 70 起罷工，其中三分之二是“危機罷工”。

1. 危機罷工。直到 2009 年 5 月，工人們根據他們工會的倡議，利用其個人權利拒絕工作，是一種合法形式的罷工。然後，面對不支付工資情形，採取的行動是集體有組織的個人拒絕形式（勞工法第 142 條款）。但是，當工人最害怕停產和失業時，這種形式的行動就失去成效。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形式的罷工會有結果，獲得至少一部分工資的支付。一些例子如下：

- ▶ 9 月，奧廖爾鎮地方政府服務第十部門的工人舉行罷工。衛生部門及水務部門的看門人和技工的靜坐罷工歷時一個星期。原因是自 7 月以來不支付工資。

- ▶ 在羅斯托夫地區的齊克（Chikh）礦區，礦工罷工了好幾次，包括呆在礦井下。10 月初，其中一些人繼續以這種方式罷工，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資。一百多名同事在礦井上支持他們。結果，經理被解職，礦主答應支付所欠的 8 月份工資。此前，6 月 24 日，34 名礦工已舉行了罷工，並拒絕從礦井上來。而這一事件之前，已經發生了其他“礦井底”的罷工，結果每次都相同，即使拖延支付工資的事總是很快又捲土重來。

- ▶ 9 月 14 日，在阿斯特拉罕的“第三國際”造船廠，工人停止工作，要求支付工資。經過國家杜馬成員奧列格幸在場的談判，這同一天管理層承諾支付拖欠的工資。

- ▶ 莫斯科的卡利布羅夫（Kalibrov）工廠。一天的罷工行動（6 月 22 日）就足以使管理層發放拖欠的工資。8 月 3 日還有另一個罷工，因為不支付工資的行為重又啟動了。

- ▶ 查基閔斯克（Chajminsk，符拉迪沃斯托克地區）海軍修理廠：從 7 月 20 日到 8 月 3 日，超過 50 名工人停止工作，因為拖欠工資 5 個月。截至 7 月 24 日，支付了部分欠款，8 月 3 日工人們恢復工作，6 月份的工資已經支付。只有 5 名工人決定繼續罷工，直至欠款全額支付為止。

- ▶ 葉尼瑟 i（Yenisseï）礦山：經過 24 小時的礦井地下罷工（5 月 27 日至 28 日）後，礦工得到滿意的答復。

- ▶ TagAZ 汽車公司 45 車間的焊工于 5 月 23 日停止了工作，但是面對管理的威脅，他們停止了行動。

類似的罷工也發生在克拉斯諾達爾建設集團（3 個月沒有付工資），在 Linetsk 建築集團（新西伯利亞地區，4 個月沒有付工資），在阿巴坎礦業公司（哈卡斯共和國，3 個月未付工資），在卡塔夫-伊萬諾沃工程公司（車裏雅賓斯克地區，拖欠 5 個月的工資），摩爾瑪琪（Murmachi）的北方艦隊第 96 汽車修理廠（摩爾曼斯克地區，拖欠 5 個月的工資），塔甘羅格汽車廠 26 車間（4 個月沒付工資），在尤拉勒斯普榮（Uralsprom）工廠（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地區，3 個月的工資未付）。這些罷工的發生往往還有工會的協助，有些是由一個專門的倡議委員會組織的。

進攻

儘管有危機和工會某種整體的退卻，在過去一年，我們仍看到有進攻性的罷工，那裏的工人不僅動員起來反對他們惡化的情況，而且還要求改善它。這些行動可能是自發的，或者由工會組織，在與工作爭端有關或涉及工作條件的框架內，採取集體停工的形式。也有這樣的情況，在工會的支援下，採取的鬥爭方式是怠工和嚴格遵守法規（“按規則工作”）。最常見的策略是，動員到一定程度，有可能罷工時，威脅要舉行罷工。

自發罷工的一些例子：

- ▶ 5 月 15 日，在李培茨孔普勒克斯（Lipetsk-kompleks）公司，香腸車間工人停止工作，因為工作條件惡劣，低工資和員警系統式的控制。在管理層威脅將罷工者告上法庭後，他們就回去工作。

- 7 月 21 日，在廓肯礦區（車裏雅賓斯克地區），礦工們不滿難以維生的工資，開始罷工。三班工人拒絕工作，並謀求與管理層開會，要求加薪（約 6000 盧布 - 167 歐元）。

在一般情況下，自發罷工很快結束，因為管理層很容易恐嚇工人，威脅要向法院控告他們的非法罷工。

依靠他們工會的幫助，立足于法律，工人已經找到了其他法律形式的鬥爭。例如，在卡盧加的大眾汽車廠，裝配線的工人引用勞動法 379 條，拒絕了幾天的工作（從 6 月 15 日起），因為車間炎熱難耐，構成了“對生命和健康的一個威脅”。

9 月 7 日，在聖彼德堡的通用汽車公司（GMAuto）工廠，焊接車間的裝配線停止了工作，因為靠近一組工人的冷卻管道破裂了三次，這違反職業安全。

“按規則工作”的惡果最大，從 11 月 11 日至 20 日，它絲毫不爽地發生在這個通用汽車公司工廠。11 月 11 日，根據 MPRA 工會的倡議，裝配車間的一小組工人，最大程度地放緩工作速度，為“按規則工作”發出信號。工會的要求是立即召開工廠集體的會議，取消年度獎金，保證工資增長百分之八，這不包括由於通貨膨脹而作的任何進一步調整，還有關於假期的嚴格規章制度，特別是取消工作時間的年度計算和回到每週 40 小時的工作制。應該強調的是，不僅工會成員，而且還有普通工作者參加了運動。油漆車間的生產線停止了幾個小時，但經過管理層的“令人信服的解釋”，它又開始正常工作了。然而，汽車生產沒有達到計畫的水準。管理層沒有正式地承認曾有過罷工，但在 11 月 20 日，MPRA 工會的主席 E.伊萬諾夫，以“無理的缺席”為藉口被解雇。

工會組織的行動更加有效，因為在有勞資糾紛時，他們會發出罷工的威脅。5 月 19 日發生的就是這樣的成功事例，隨著罷工行動的威脅，空中交通管制工作者從聯邦航空運輸管理局取得了現有集體合同的延長。誠然，工會為此成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其辦公室被取消了。

這也是事實，去年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進攻性罷工，沒有具有可信動員水準的罷工威脅，被積極的工會成功地使用在勞資糾紛過程中：

► 12 月 2 日在達能企業工廠（莫斯科地區），圍繞著工會委員會（屬於索特斯普羅夫工會）

的倡議，爆發了勞資糾紛。工廠的管理層收到通知，如果到 12 月 15 日，調解委員會沒有組成，屆時如果工會提出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將舉行罷工。到 12 月 11 日，管理層同意進行談判。工會所提出的要求，制訂得精確，並有牢固的法律依據。它們涉及到工作時間的調整，工作場所的定義，工作規範和指導，臨時工作和反對工會活動分子的歧視性措施。

► 在卡熱爾斯基歐卡提奇工廠的索特斯普羅夫工程工會使用了同樣的方法，但在這家公司工會活動分子遭到了管理層的激烈抵抗，它毫不猶豫地使用了安全部隊，阻止 10 月 20 日的工會集會。然而，工會活動及其所表現出的決心贏得了許多工人到工會一邊。

► 最後一個例子：反對臨時工作（由外包專門機構招聘）的運動。巴貝耶維斯基（Babayevski）糖果廠（莫斯科）工人採取了行動，隨著這個行動後，由皮特儒來恩（Petroline）機構招募但不付錢，一些工會，包括食品工人國際工會（IUF）11 月和 12 月在該國各城市組織了警戒罷工，提出同樣的要求：停止外包和其他非標準形式的雇工工作。在這種情況中，工會預防式地反對形式合法的就業，因為這種就業剝奪了工人當前仍然存在的保障。

絕食罷工

不幸的是，自 2009 年春季以來，絕食罷工的數量（至少有 20 起已記錄在案）在增加，這種方法對雇主的壓力並不十分有效，但對罷工是有害和不利健康的。一般來說，工人之所以訴諸絕食罷工，是因為只有小部分集體成員準備以積極的方式（即它們面臨團結缺乏的情況）動員起來，或者是公司破產。一般來說，經過一定的時間，在獲得支付拖欠工資的承諾後，他們會停止絕食，但如果絕食罷工未能繼以更積極的群眾行動，這些承諾就成為一紙空文。

我們可以舉出許多絕食罷工失敗並挫傷了工人的例子：

- ▶ 6月1日，克拉斯諾雅茨克航空公司（KraAir）的飛行機組人員，結束了19天的絕食罷工抗議，他們要求付清拖欠工資（拖欠數月的工資）。雖然他們未獲滿意答復，但他們停止了行動，因為他們的健康突然惡化。
- ▶ 6月29日，塞維若木易斯克（Severomuisk）的鐵路工人在絕食罷工七天后，停止了行動，因為有關減少勞動力和降低工資的問題，有了進展；
- ▶ 在阿赫圖賓斯克，公用市政工程（CentrJilKomKhoz）企業的市政員工進行了“輪流”絕食，年初以來這是第二次。按照紮希塔工會的倡議，工人採取這一行動，反對“有組織的”的破產，因為破產的只有城市服務業。但這一行動並沒有導致地方當局名義下的任何反應；
- ▶ 2009年1月，因未支付工資，在布良斯克的第111號軍工廠的工人，進行了絕食罷工。10天后，參加這次行動的人必須住院。絕食罷工停止了，但工資卻沒有支付。該工廠的421個工人7個月沒有收到工錢。
- ▶ 2月份，在3月份再一次，茲拉圖斯托沃（Zlatustovo）鐵鑄造廠（車裏雅賓斯克地區）的工人組織了一次抗議行動，反對削減工資。第一次絕食罷工（2月16日）迫使該公司的管理層做出反應，至少口頭上做了讓步。由於問題仍然存在，3月10日重新開始行動。這一次，公司的管理層指責絕食罷工者為“政治極端主義”。

在某些罕見的情況下，這種形式的行動，使人們有可能獲得工資的支付。尤其是當工人把絕食罷工同其他形式的行動相結合，或者當絕食罷工在輿論和媒體有重要的反響時。齊克礦區（羅斯托夫地區）的情形就是這樣的，6月23日，30名礦工在礦井下進行了絕食罷工抗議；6月25日罷工者回到地面，因為他們的行動已引起該地區官僚的真正恐慌。副省長和能源部部長親自來到礦區。這讓人想起以前，在3月份，礦工留在井下罷工。

在貝加爾纖維素廠，在大規模的絕食罷工抗議（有60人參加，在規定的巴依卡爾斯克的行政大樓前設立了一個帳篷村），以及反復地警戒罷工和集會後，於6月8日開始支付工資。

在亞瑪拉，8月10日，經過兩個星期的絕食罷工後，塞文麥阿-額克斯佩蒂斯佳（Severnaia Ekspedicija）地質勘探公司的工人得到拖欠的工資付款。此前，6月25日至7月31第一次絕食罷工已經發生過，但管理層停止遵守承諾。

一些教訓

工人和工會運動經歷過的動力已經放緩。上述事實揭示了地區層面上的大量自發行動，如威脅封鎖道路的街頭行動，首先出現在單一工業的城市。多虧“皮卡利奧沃”效應，這些行動已成為最有效的手段，促使當局尋求解決辦法。當這些行為發生時，提出的問題就不限於工資拖欠：幾乎在所有情況下，都涉及到挽救企業。基於這個原因，越來越多的工人自己常常要求政府把公司國有化，或在任何情況下，要求它“整頓”形勢，並追究“不足”的雇主。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說是社會衝突的某種政治化，但有限制：這個“國有化”一詞通常表示某種形式的國家援助，而不是經濟政策的真正變化。

整體而言，2009年是防禦性的，我們在2007-2008年看到的那類工人進攻行動，是罕見的，儘管這種潛力總是存在，因為工會的倡議與罷工行動的威脅會引起集體糾紛。

在目前危機的條件下，糾紛並不局限工作場所。一些行動自發地開展在街上，數量大幅增長，表明在工作場所內不能找到糾紛的解決方案，考慮到現行的勞動法，尤其如此。此外，工人擴大了備選的行動方式，任何形式的嘗試可能有一定的成效。大多數這些行動採取的形式，不在關於勞資糾紛的立法所設想的範圍中。這並不是因為人們試圖不尊重法律 --- 恰恰相反，工人和工會的法律技能不斷增加，他們利用法律的能力也在加強

--- 而是因為現行立法無法有效地解決勞資糾紛。

最後，我們要強調當前抗議浪潮的另一個重要特徵：自發爆發的爭端，方式混亂，不是一個持續的群眾運動的一部分，僅僅靠它，無法影響擺脫危機的道路：犧牲工人還是犧牲雇主的利益？從目前看，政府和大資本家尋找擺脫危機的方法，其舉措方向是犧牲工人利益（降低勞動力，減少勞工，不支付工資）而且決不減少利潤，股息，以及過去期間的累計獎金。更糟的是：政府為雇主的債務負責，而雇主拒絕在工人面前為他們自己負責：是納稅人，因而再次是工人，為俄羅斯鋁業（Deripaska）和其他寡頭的債務買單。

一個總體運動的缺乏是由於這個事實，即爭議的空間是非常有限的，加上缺乏能協調它們的結構，缺乏參與鬥爭的集體之間的橫向聯繫。唯一存在的東西是一個公共媒體空間，說的是“二個，三個，許多皮卡利奧沃”。

對於一個龐大的群眾運動，其發展所需要的是是一個組織性結構，能夠組織工會和一些工會成員之間的團結和協調，這些會員極力反對政府和雇主，因為他們的政策是鎮壓和分裂工會運動。

最後，爭端的分散性也說明了一個事實，即最尖銳糾紛的發生是遠離替代性工會及其網路的。這些工會在工作場所所有嚴重的問題：他們遭受危機的後果（特別是在汽車業），並受到當局和雇主的強大壓力。這使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們真正紮根其中的鬥爭的組織上，並且加強其組織結構。至於俄羅斯獨立工會聯合會（FNPR），其領導人並非毫無興趣參加一個協調機構，整合一個捍衛工人權益的總體運動。

所有這一切說明了，因為危機和在面對這場危機的各種行為者的反應，工會和工人運動的團結過程經歷了確定的放緩。

然而，在自發行動浪潮中新領導人的出現，以及某些地方 FNPR 組織的啟動，構成

了一個積極的趨勢。即使這樣，在大多數情況下，該運動的領導人抱怨，在聯邦一級，而且在各個工業部門，他們從 FNPR 領導層獲得的支援非常薄弱。積極的對應情況是，某些隸屬於 FNPR 的工會，開始在其工業聯合會內進行鬥爭，並維護其獨立性。

再次，我們要強調當前動態的矛盾性質：一方面是爭端的分散性質，另一方面是整合。

展望：超越分散的地方行動

由於危機，也由於施加在工人運動有組織派別上的壓力，儘管有這一切的困難，團結的趨勢還是在繼續，雖然有些放慢。戰鬥的工會正日益相互合作，而且還結合其他社會運動和政治激進分子。

很明顯，在此危機期間，為了改善工人的權利狀況，有必要建立一個所有社會運動成員參與的群眾運動：只有這樣的運動，可以迫使政府放棄其尋求危機出路的現行政策，因為這些政策等於惡化工人的現況，侵犯他們的權利。

在這個方向，我們看到了一些仍然有限的措施。區域間汽車工人工會（MPRA）圍繞口號“工人不應為危機買單”，接納了群眾運動的倡議。2009年2月14日，依據這一主題發起了第一個區域間行動。

4月19日，在烏拉爾社會論壇，骨幹分子 --- 主要來於協調委員會聯盟 [8]和其他一些替代性工會 --- 同意共同進行一場運動，捍衛工人權利，共同確定一份建議單，以便不是“踩著人民的背”走出危機。其中首先的要求是：向工會提供公司的真正經濟和財政狀況的資料，並保證他們有採取措施走出危機的控制權。但是運動的發展並不十分有效，至少在一段日子裏（10月10日至17日）如此：並不是所有的地區都動員起來了，而且沒有任何地方有工會的參與。

社會運動的積極分子都願意與工會一起行動，首先是在協調委員會聯盟（SKS）內部：在許多城市，他們已經在職工集體的內

部進行工作，特別通過住在宿舍的工人做工作。11月18至19日，奧托瓦茲的耶丁斯特沃工會在陶裏亞蒂舉辦研討會，與會者得出了這個結論，這個研討會還得到了全俄勞工聯合會（VKT），和全球化及社會運動研究所（IGSO）的支持。這次研討會的主題是：“什麼是危機條件下的工會戰略？”。

顯然，如果建立在城市水準上，所圍繞的問題被所有人認為是社會上最尖銳和重要的，那麼，對所有的參與者，這種合作將是有效的和有利的。如果第一個經驗是成功的，那麼完全可能的是，將會設立一種協調方式，這是該國缺乏得如此厲害，又是至關重要的東西，因為它能克服運動的分散性與地方主義，保護工人的權利。在目前這些協調機構充其量只在萌芽狀態。

自發的抗議行動是否可以被納入一個有組織的運動，以便能夠獲得政府的保護工人權利的具體措施，對於這個問題，工會和社會運動有決定性的作用，它能帶來積極的回應。

政府本身應該對加強工會運動感興趣，否則面對一個可能給整個國家帶來痛悔後果的不受控制的狂潮，它會孤獨無助。但我們看到的剛好相反，對工會的壓力在加強。雇主通過解雇，毆打或捏造各種罪行的監禁，剔除最積極的工會骨幹。同時，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在各個層面上，“國家的主人”都幫助他們：無論是統一俄羅斯黨（拒絕修改勞動法，在一定意義上，那會讓替代性工會的活動較少麻煩）還是一部分的總統和政府機構，其挑釁和鎮壓措施除了強化該國的緊張局勢，沒有其他作用。

今天的工人同20世紀90年代的工人不同。他們不會容忍無限期地被愚弄。他們展示自我組織和自我防禦的能力在增加。俄羅斯存在新一代的工人，他們是非常自尊的，有不同的要求。他們不再願意毫無意義地勒緊褲帶，他們的理想是不要加入那些只是相信汽車房子者的行列。

再次，選擇很簡單：要麼是發展一個有組織的工人的運動，要麼是“無止境的痛苦絕望”。

莫斯科，12月30日。這篇文章最初發表在法語的網路政治評論‘中流砥柱’俄文原文發表在網站IKD:

►卡林那·克萊門特是一個社會學家，管理莫斯科集體行動學院。

注釋

[1]在俄羅斯（主要是由於蘇聯時期的遺產）許多城市或城市群是圍繞一個企業而建立的。最有名的例子是陶裏亞蒂鎮，該鎮伴隨著巨大的奧托瓦茲汽車廠。

[2]俄羅斯獨立工會聯合會，事實上是蘇聯時代官方工會的繼承者

[3]區域間汽車業的工會：福特汽車廠（列寧格勒地區）的極具戰鬥性的工會領導組織的工會網路。

[4]論皮卡廖沃事件，見下文，以及克萊門特報告。“感謝你，城市的寡頭們” A l'encontre 網站，2010年1月5日。

[5]俄羅斯工人共產黨。一個來自前蘇聯共產黨的組織，它以史達林為參考。不同與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俄羅斯工人共產黨（RKRP）的成員活躍在各個地區，並參與社會運動。

[6]更多詳情，請參閱上述克萊門特文章，“感謝你，城市的寡頭們”。

[7]獨立礦工工會。這個工會後成立於1989年夏天的礦工大罷工。

[8]SKS是2005年冬天的動員後成立的，當時的動員旨在反對福利的貨幣化。通過重組區域或城市現有的各種協會和運動，今天SKS出現30多個地區，組織對各種問題的討論活動，例如住房權。

蘇聯左翼地下活動小史（1940--1990）

阿·金澤爾瓦·拉古金科
赤軍譯



一般說來，歷史學從來都比其他社會學科更露骨地服務於同時代的政治制度。但20世紀的偽造歷史現象，卻是史無前例的，偽造歷史從手工作坊變成了流水線作業，也算工業世紀的一個「成就」。蘇俄的政治歷史，尤其是共產主義反對運動的歷史，充滿了類似的偽造現象，被重重神話包圍著。從30年代到80年代，蘇聯官方歷史學界對此的態度是極其空洞片面的。在官派史學家的筆下，十月革命後的歷史是一部「黨中央」領導下的「浩浩蕩蕩的社會主義建設史」；而任何共產主義反對派都等於「奸細」或乾脆是些小丑。在所謂改革開放時期，那些習慣於跟著中央號令走的主流蘇聯史學家（比如尤·葉米利揚諾夫）所能做到的，也只是小心地為部分蘇俄早期領袖（比如黨內右翼領袖布哈林）恢復名譽。

至今為止，對蘇聯時代左翼地下運動史的發掘整理仍極不完備；在這方面做出最大貢獻的，當屬已故歷史學家瓦·拉戈文同志的七卷著作《另一條道路是否可能？》。不過，和許多海外左翼學者一樣，拉戈文同志堅信大清洗徹

底砍斷了蘇聯的布林什維主義之根，而我們並不這樣認為；我們認為儘管外在環境極其嚴酷，共產主義政治文化某種程度上還是保留下來了，80年代末蘇聯社會浮出水面的左翼運動不是某種外在催化的結果，而來自地層深處。

左翼青年組織的出現

30年代末，托洛茨基就察覺到新一代左翼反對派的組織構成已發生變化；他們主要由青年工人和學生組成，並不瞭解第四國際的觀點，而是憑藉自己的思考走到了史達林修正主義的對立面。當然，這些人完全成長為共產主義戰士，還要依靠集中營內與老托派的接觸和學習。許多西方左翼史學家指出，自40年代初以後蘇聯就不再報導關於新托派分子的審判消息了，什麼原因呢？鬥爭真的停止了嗎？蘇聯真的變成了共產主義運動的沙漠了麼？現在我們知道真相完全相反，40年代後的蘇聯並非一片死寂，一個個共產主義小組不斷產生和活動，只是他們的身影和呼喊完全被當局厚重的鐵手壓制和窒息了。

1930-1932年間，當老一代左翼反對派領袖向當局屈服以後，新戰士群體很快出現；當時他們還有機會與外界保持聯絡，國外出版的《反對派日誌》對此有較多報導。儘管1935年以後托洛茨基（和其他左翼反對派領袖）的所有著作從圖書館中被清除掉了，但30年代的蘇聯現實——刺眼的貧困、特權、飛揚跋扈的新官僚階層，所有這一切都迫使許多青年從政治上尋求答案。馬恩列著作的廣泛傳播更加刺激了青年的覺醒：為什麼書上寫的和現實如此不同？！開始出現一個個學習和宣傳馬列小組，隨後是照例的逮捕、審判、流放，但隨後又出現了新的地下小組。

在三、四十年代，官僚集團的“社會主義建設”一面無情壓榨工人和農民，一面慷慨厚待職業官員群體和知識界精英，工人的反應可

想而知。整個三十年代，罷工運動一直沒有停止。1933年8月，政治保衛局（格柏烏）向政治局報告上半年僅在烏克蘭就破獲了7個地下工人小組，這些小組「指揮和策劃了系列罷工」，參加罷工的人數至少有1028人；爲了平息這些工人騷亂，格柏烏的內衛部隊（類似中國的武裝員警部隊--譯者注）共出動了13次之多。

1937年的大清洗吞噬了許多獨立思考的優秀青年，而階級敵人則對蘇聯和蘇共的「去布林什維主義化」歡欣鼓舞。1940年8月16日，戈培爾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布林什維主義正在拋棄一切還稱得上布林什維主義的東西」。但鬥爭沒有停止。1941年6月，在西伯利亞西部個別倖存的托派領導了步兵營暴動（他們的命運至今成謎），同年秋伊萬諾夫茨克發生工人罷工，1943年薩拉托夫市出現「青年革命組織」，無政府主義者奧·采伯利組織和領導了一支反法西斯遊擊隊，以上是我們已知的二戰期間蘇聯政治生活左翼運動的一部分。

戰後初期的活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把蘇聯官僚最腐惡無能的一面暴露出來--在列寧格勒保衛戰中，成千上萬的戰士前仆後繼地犧牲，而他們的「最高防務領導」日丹諾夫興致勃勃地躲在地下指揮所打網球；千百萬人在半饑半飽中做工，而政治局委員們卻爲水果的新鮮程度大發雷霆。戰爭的結束沒有給蘇聯人民帶來他們渴望的美好生活，而許多人已忍耐和犧牲了太多和太久。40年代後期，蘇聯全境的地下馬列小組如野火般蔓延開來，較爲出名的有南方城市瓦洛尼什的「共產主義青年黨」，這主要因爲它的成員中包括後來的著名詩人阿·瑞古林（回憶錄《黑石》的作者）¹。其他的小組就沒那麼走運了，從蘇聯官方材料中的隻言片語裏，我們知道當時還存在過「列寧綱領派」、「列寧反對派」和「工人反對派」等「窮兇極惡的反蘇地下團夥」，但詳細情況至今被鎖在檔案庫中（與中國大陸自由派的宣傳相反，蘇聯解體後，多數國家檔案並未對公眾開放，有權借閱的僅限於少數學者，公佈材料則需要政府的許可--譯者注）。40年代末「列寧的事業」小組曾活躍一時，它的主要成員後來在集中營參加過1953--1954年的犯人大起義。

50年代初，蘇聯和蘇共被一片愛國主義和反猶太主義歇斯底里籠罩著，但新的共產主義小組沒有停止活動。1950年9月至1951年1月，在莫斯科成立了「爲革命事業鬥爭同盟」。同盟核心人物是18歲莫斯科大學生巴·斯盧茨基。從1950年夏天開始，他和梁贊老家的中學同學以文學興趣小組爲掩護，從事政治學習和宣傳。同盟成員蘇珊娜·皮丘洛回憶說，斯盧茨基認爲必須與「這個制度進行鬥爭，它不是什麼無產階級專政，而是新的貴族統治，波拿巴獨裁的變種。黨和國家被那些領袖篡奪了，而理解這一切卻不起來鬥爭，等於是篡權分子的同謀」。同年秋天，四名骨幹正式建立同盟籌委會，斯盧茨基還草擬了組織綱領，在綱領中他認爲蘇聯的經濟體制是「國家資本主義」，對外政策是「帝國主義」，政治統治模式是「熱月政變分子對人民的波拿巴主義獨裁」。他的同志瑪·紮列夫回憶說「現在想來，對他（指斯盧茨基--赤軍注）的理論立場影響最大的是托洛茨基，所有這些名詞，比如波拿巴主義啦，官僚層熱月政變啦，都是從那來的」「他的崇拜物件是列寧和托洛茨基」²。

同盟的確切人數不詳，在秘密庭審的起訴書中提到了十六個人；他們設法弄到一部老式油印機，印刷和散發了約三百份傳單。有趣的是，在短暫的活動階段小組還發生了一次分裂，起因卻很嚴肅：對個人恐怖的態度之爭；部分成員認爲必須剷除史達林，斯盧茨基表示反對。

1951年初，同盟的全部成員被捕，原來國安機關一直在監視小組的活動，他們聚會的房間被竊聽，而在被捕前夕，每個主要骨幹都被數名特工不停跟蹤。1953年2月14日，斯盧茨基、福爾曼、古列維奇三人被判死刑。蘇珊娜·皮丘洛和另外九個人被判二十五年徒刑，另三人被判十年徒刑。1956年，隨著新任蘇共領導層「寬鬆」政策的出臺，同盟的倖存者從監獄和流放地被釋放。

史達林死後，蘇聯白色恐怖有所放鬆，這既給左翼地下活動提供了新的機會，也爲不少左派動搖分子向西方資產階級靠攏創造了條件。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盧基揚年科（1961年「工農黨」的創建者）和格裏戈連科（1963年「列寧主義復興同盟」的領袖）都曾是左翼地

下運動的活躍人物；當他們面對西方「自由世界」表示懺悔後，逃兵們得到了榮譽、地位和物質獎賞。而那些沒有懺悔、也沒有得到榮譽和獎賞的人，默默繼續著自己在黑暗中的鬥爭。

1956--1957年間，是新一輪地下共產主義運動的活躍高峰期。湧現了一大批小組，但他們同樣很快被粉碎了。由於和國際共運的長期隔膜，這些小組都帶有一定的理論搖擺和退化，主要表現為他們對「南斯拉夫模式」的片面欣賞。除了組織以外，還存在不少創作和傳播傳單和小冊子的單幹戶。

1962年新切爾卡茨克工人罷工和起義

值得注意的是，在戰後蘇聯工人鬥爭中，領導者往往是那些與老一代托派有聯繫的新生代馬列主義者。這些人中最著名的活動家，當屬1962年6月1-3日新切爾卡茨克工人罷工和起義的積極分子帕·西烏達。他是著名工人布爾什維克帕·西烏達的兒子，30年代中期，老西烏達被槍決，兒子和妻子在勞動營度過多年時光，與營內的托派朝夕相處。戰後小西烏達當了工人，並成為一場工人罷工和起義的參加者。在自己的回憶文章中，西烏達詳細描述了事件的起因和經過。

1962年蘇聯普通人的工資水平出現全國性的滑坡，這與赫魯雪夫當局的系列經濟錯誤有直接關係。5月末，1萬4千人的新切爾卡茨克電力機車製造廠鑄造車間貼出告示，宣佈今後車間工人的工資將「有所調整」。工人們並未表現得很激動，從20年代中期開始，他們已承受了許多壓迫、恐嚇與欺騙，再多一次又怎樣？習慣啦！中央的官員們顯然也是這樣考慮的。

但第二天（6月1日）全城市民都發現牛奶、肉和雞蛋的價格上漲了25%，再加上多少年無法改善的食品短缺現象，再加上史達林時代就出現和存在至今的工人住宅極度緊張問題，看著這一切，許多職工腦袋裏的某根神經明顯發生了「過熱」。不過，形勢徹底爆炸還要「歸功」于廠長（蘇共州委成員）：當他在車間裏聽到大夥的怨言時，便輕鬆地回答說「沒有香腸吃可以吃乳酪餡餅嘛」（堪稱「何不食肉糜」的蘇聯幹部版）³。在場的金屬工人再也忍耐不住，立即拋下手中工作，並拉響工廠汽笛；全廠工人們沖出廠門，罷工和集會開始了。在集

會上，有人提出堵鐵路，以便把罷工消息帶到北高加索鐵路的沿線各地（新市是北高加索鐵路樞紐站），群眾表示贊成；在被堵的鐵路線路上，掛出了帶有經濟要求的口號--「我們要牛奶！我們要香腸！」「我們要房子！」，在被堵住的火車上，有人寫下標語「拿赫魯雪夫做香腸！」⁴。

一群廠領導急忙出現，試圖向群眾「發表講話」，但立即被痛打，不得不逃跑；稍後，州委第一書記巴索夫再次試圖于廠行政樓陽臺上向群眾發表講話，但也被雨點般石塊打沒了影；市公安局迅速派人趕到現場，但當人群向員警走去時，公安幹警閃電般跳上車「轉移陣地」去了。當晚，出現了第一批徒手進城的部隊。

在當晚舉行的群眾集會上，「有人提出派代表去鄰近城市發動工人，有人提出佔領電報局，把罷工消息發送到全國各地」⁵；帕·西烏達在集會上發言指出奪取政權可能會立即導致對波茲南事件（波蘭）和匈牙利起義的血腥鎮壓在國內重演，所以「最好堅持罷工，加強組織性、堅定性和忍耐力」⁶；作為下一步的具體行動，他號召「全體工人制定出具體要求的清單，並于明天進行全城大遊行，把要求向市當局提出」。

當天夜裏，工廠宿舍區一片騷動，根本沒人睡覺；街上是通宵集會，家家都在討論，有些工人把赫魯雪夫標準像一卷卷燒掉。政府有關部門也沒閑著：當時天氣極熱，有人把幾輛滿載瓶裝橘汁的卡車停在集會現場附近，然後「司機不見了」；有關部門在暗處擺好攝像器材，等著看工人打砸搶。讓特工們困惑的是，整整一夜，工人們連一瓶汽水也沒拿⁷。

6月2日清晨，工廠已被全副武裝的內衛（即武警）部隊佔領，但工人們還是按期舉行了集會。集會群眾通過了「發動市內其他企業、舉行遊行」的決議。「數千人的遊行隊伍從廠區走向市中心，道路很長。一些工人和家屬前去其他工廠，號召他們支持罷工。很快，建築工人、石油機械製造廠工人和其他較小企業的職工都跑來參加遊行。隊伍中出現了紅旗、列寧像，群眾唱著十月革命前的戰鬥歌曲。大家都非常激動，被一種信念和力量衝擊著。……當我們走到鐵路橋頭時，大家看到橋樑已被坦克

和武裝士兵封鎖了。隊伍停下了，沈默了。然後，我們一步步地走向橋頭，反復高喊著‘給工人階級讓路！’、‘給工人階級讓路！’、‘給工人階級讓路！’，坦克和士兵沒有開火，巨大的人流飛快地穿過警戒線，走向橋中心，我們更加激動了。更加雄壯的革命歌曲回蕩在我們和城市的上空」8。

遊行隊伍到達市委大樓以後，也碰到了成群武裝士兵。當人們得知公安已秘密逮捕了一批「鬧事分子」後，就立即跑到市公安局試圖解救被抓工人；群眾情緒已白熱化，開始衝擊公安局大門，當人們逐漸湧入大樓內部的時候，槍終於響了。先是短促的一梭子，然後便響成一片；「人群向後急步退去，只看見一個小夥子被人們高舉著快跑，那人的白襯衫上大塊的血水不斷滲出」9。與此同時市委大樓附近也開了槍。被害人遺體始終沒有交還家屬，死傷數字也被列為機密，當時蘇共內部傳達檔公佈的數字是22人死亡，39人受傷。大逮捕開始了。一共7人被槍斃，包括西烏達在內至少105人被判刑。6月5日，《真理報》戲劇性地刊登了「新切爾卡茨克電力機車製造廠工人來信」，「信」中以「我們工人集體」名義表示「完全擁護黨中央加強農業建設的政策」（即食品全面漲價政策--譯者注），並發誓「以飽滿的鬥志為農業機械領域生產更多更好的配件」。這封所謂的工人來信，為鎮壓寫下了最後一筆。

新切爾卡茨克起義，是工人階級對蘇聯官僚多年高壓政策進行的本能反擊；這之前和之後都發生過不少小規模的工人騷亂，但新切爾卡茨克事件的影響最大。監獄和勞改營的經歷沒有讓西烏達改變信仰，1990年被暗殺前夕，他曾作過一次總結性發言，他指出「……在20年代初，革命的方向逆轉了，沒有繼續前進。我們今天的努力目標不應該是什麼‘新經濟政策時期’，更斷斷不能回到沙俄時代，而是要爭取社會對國家的全面控制，就像十月革命初期那樣。人民群眾要爭取把對國家的控制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並設法讓國家機關逐步消亡……」10

六、七十年代的左翼地下運動

在60年代的列寧格勒產生了「公社人同盟」，它的非法出版活動持續了很長時期，出十月評論 2010年第2/3期

刊物包括「警鐘」雜誌和名為「從官僚專政到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書籍。1968年5月風暴給蘇聯青年知識份子以相當衝擊，僅在列寧格勒就出現了多個組織；70年代初，梁贊、薩拉托夫和斯維爾德洛夫茨克也有地下組織出現。明斯克小組的發起人克立維茨基曾回憶道：「對當時許多蘇聯青年來說，1968年5月的巴黎事件意味著西方資本主義不可能是我們的理想目標；布拉格之春和蘇聯鎮壓也讓我們對所謂的‘現實社會主義’感到幻滅。我和我的朋友們開始探討第三條道路」11。在這種探討中，克立維茨基提出了「國家社會主義」和「人民社會主義」的概念。他認為十月革命的性質是社會主義革命，而革命後建立起的國家帶有「非資本主義」特點，但隨後出現的官僚篡權導致「國家社會主義」的出現和鞏固，這個模式沒有長久生命力，未來屬於「人民社會主義」。

七十年代末，列寧格勒還出現過「革命共產黨」等小組，他們的一些骨幹至今仍是俄國左翼運動的積極分子；在莫斯科大學學生中出現了「左轉彎」小組。

「防衛」號軍艦的起義

七十年代以及整個戰後蘇聯社會主義地下運動最激動人心的一頁，莫過於「防衛」號軍艦的起義。整個事件被蘇聯最高當局嚴格封鎖，以至連西方的蘇聯問題專家也長期以為水兵們想逃往西方。實際情況完全相反。起義的靈魂人物--軍艦政委瓦·薩柏林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他的計畫是以起義的方式在蘇聯引發一場政治革命，推翻史達林修正主義特權階層。在秘密軍事法庭的供詞中，薩柏林說他希望以此「點燃光榮的列寧格勒，因為這座城市具有長久的革命傳統。」波將姆金，號軍艦起義是1905年革命的頂點，阿芙樂爾，號軍艦打響了十月革命的第一聲炮響」。薩柏林以為他的行動可能掀起新的起義，並「最終解決俄國革命沒有完成的那些任務」。他的準備工作是從水兵政治課開始的，在課堂上薩柏林有計劃地向水兵們講述了工人、士兵和農民如何組織起來與官僚、資本家和地主鬥爭並最終進行十月革命的歷史進程；他著重闡述了列寧主義關於工兵農蘇維埃民主的思想。結果立竿見影：往常在類似課堂上發薦打瞌睡的水兵對新內容表

現了極大的興趣。「大家對他的評價都很高，我們始終非常信任他」，「防衛」號水兵維巴拉代依回憶說。薩柏林與下屬的關係非常親密，他的政治課內容則引起了上級的不滿和警覺。

1976年10月8日，「防衛」號艦長普托甯被薩柏林的同志們關進底艙，薩柏林召集了水兵和軍官，給大家放映了著名的蘇聯電影「波將姆金號起義」，並解釋了自己的起義計畫：開向列寧格勒，向全市人民和全國播發無線電聲明，號召人民起來推翻蘇共政治局的特權統治。軍官們有一半（八人）表示反對，另一半表示贊成；水兵們則完全支持起義。許多年後，我們可能會覺得這場「起義」簡直是發瘋，但薩柏林絕非瘋子；他的計畫建築在對現實的清醒估計上：對統治階層的集體性不滿隨處可見，水兵乃至部分軍官的反應並非偶然，而是當時蘇聯人民政治心理的縮影。薩柏林是行動的人而非空談家，他看到了群眾的政治要求並試圖以起義為契機、發動列寧格勒的工人階級進一步擴大革命行動的範圍。

起義最後被鎮壓了，薩柏林被槍決，水兵和軍官們被處以刑期不等的徒刑。但左派的直接行動沒有因此中止，幾年後，亞姆什科夫小組甚至曾計畫佔領蘇聯中央電視臺。

七、八十年代的蘇聯工人罷工運動

晚期蘇聯是個表面富足祥和、內裏焦慮不安的社會。由於缺少起碼的政治自由，工人運動主要以罷工和地下小組的形式存在。因為食品短缺問題的惡化，1980年5月9日高爾基汽車製造廠工人舉行罷工，四名為首者被捕。1980年初明斯克無線電廠工人罷工以抗議工資下降，三人因此被捕。1980年3月，因為工資拖欠，明斯克拖拉機廠的兩個車間罷工，為首工人全部被捕。

1980年10月，在一份名為《職工工資與勞動環境領域的不規範所引起的個別消極現象》的絕密檔中，蘇共中央書記處承認存在著「廠領導與職工之間的誤會和衝突，以及因此產生的停工和其他不健康行為」，「絕大多數（罷工）的起因是（管理幹部）破壞有關規定，變更工資水平和不定時發放工資和獎金，惡劣的勞動環境，以及（幹部）對人民群眾的申訴抱

十月評論 2010年第2/3期

有輕率態度」¹²。據檔透露，在1980年，烏拉爾地區下伊塞特冶金廠57個工人因為獎金問題罷工（8月）；立陶宛的阿立圖斯棉紡廠116個工人兩次罷工，反對工資下降（9月）；發生罷工的還有奧爾忠尼啓則聯合制造企業、南烏拉爾機車製造托拉斯下屬企業156號建築修理隊等等。罷工區域包括烏克蘭、南方省份、高加索、中亞（阿什哈巴德）、愛沙尼亞；發生罷工的企業既有重工業，也有輕工業；儘管罷工的絕對人數並不很多，「1979年統計的拒絕工作事件約三百起，參加者共九千人」，但讓官僚們恐慌的是，罷工規模有上升趨勢：「有時罷工不限於一班工人，而是蔓延到下一組上班工人，1980年10月15日北方制鍊廠就出現了類似現象，在三天內120個工人連續罷工」¹³。官員們除了照例打打「提高警惕、增強教育、嚴格生產紀律」的官腔，也被迫再三申明「需要特別注意避免工業領域內延長工時和周日加班的決定」¹⁴。

「馬克思主義工人組」

七十年代末，工業中心古比雪夫市出現了名為「馬克思主義工人組」的組織，它的核心是石油工程師阿·拉茲拉茨基。拉茲拉茨基秘密撰寫和出版了一系列小冊子，他認為蘇聯社會是「封建農奴制社會」，提出「打倒農奴專制！要無產階級專政！」¹⁵的口號。他的親密戰友是金屬工人伊薩也夫，後者於所在的鑄造車間領導了數次成功的經濟罷工，罷工時間從兩三個小時到最長的48小時不等，主要要求是向工人定期提供特製工作服、充足的清涼飲料等等¹⁶。小組堅持了5年的地下活動；1981年12月13日波蘭當局宣佈軍管，開始鎮壓團結工會，12月15號啟動全蘇大搜捕，一切工人地下活動被徹底掃蕩。共有15個人因「馬克思主義工人組」一案被抓。伊薩也夫被特種精神病專家們「觀察」了一個月，拉茲拉茨基被「觀察」了兩個月；他們還算幸運，由於認識的人太多，由於拉茲拉茨基作為石油專家的名氣極大，國安部門沒有（像對付單個異端分子那樣）讓他們變成半瘋。

很快，伊薩也夫被秘密判處10年勞改和流放，拉茲拉茨基被判12年勞改和流放；坐了六年牢之後，他們於80年代後期提前出獄。1989

年拉茲拉茨基去世；直到今天，伊薩也夫仍以「無產階級專政黨」的名義在古比雪夫（今名薩馬拉）堅持活動。

在長久的官僚專斷時代，成百上千的地下左翼活動家們來了又去了，一個個組織產生和消亡了，多數人的最終命運至今不為世人所知；但有一點可以確定：他們都是勇敢和忠於信念的人，在與那個似乎是千年王朝的蘇聯官僚專制機器的搏鬥中，他們確乎履行了馬克思的口號：「就算生命因此死去，也決不讓死亡繼續活著！」

下篇

1992年資本主義復辟後，許多蘇聯時代的自由派和民族主義不同政見者掌握了主流政治資源，他們堅決否認或極力貶低蘇聯左翼地下運動的歷史事實。2004年，原秘密小組「革命共產黨」（70年代末列寧格勒大學生組成）骨幹阿達拉索夫寫道：「今天，60年代的老民運非常希望人們以為除了民運，不存在其他的地下運動，但我們蘇聯地下左派的存在是客觀事實」；達拉索夫回憶說「左右派地下運動的分歧當時就是不可彌合的，我們當時就勢不兩立」「我們很清楚民運的頭頭們做了些什麼，並蔑視他們」「我們沒什麼可誇耀的，沒能推翻蘇共的統治，沒能完成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但我們也沒像民運那樣，打著‘著名持不同政見者’的旗號，與黨官僚調情，按照國外資產階級的規則跳舞……我們認為與這些比起來，監獄和流放遠非最糟糕的」¹⁷。

「革命共產黨」的遭遇相當典型，它的骨幹杜漢諾夫在「特種精神病院」得了精神分裂症，再也沒能恢復正常；成員娜塔莎瑪格娜特在監獄裏得了腸癌，英年早逝。萬幸的是，一名同志和蘇共政治局某成員之間有親屬關係，才救了部分人的命，沒有全部瘋掉。達拉索夫的記述，給我們提供了後蘇左翼政治生活精神底蘊的某些脈絡，因為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民主化極大地沖淡了地下運動的政治影響，使得它的精神遺產僅在某些邊緣化的左翼圈子裏還隱約可見。但正因如此，不瞭解地下左派，就難以完全理解改革後左翼陣營的發展史。

1987年，蘇聯當局停止對政治異己的刑事迫害，並釋放大部分思想犯；左翼運動走向地上，首先領一時之風騷的，是社會民主主義。

社會民主主義的興亡

八十年代後期，蘇聯知識青年的政治圈中一度沒有什麼比「瑞典模式」和「市場社會主義」更時髦的名詞。自認左翼的青年們成立了「社會主義俱樂部聯合會」（1987年8月）；1988年1月莫斯科大會召開，同時各地舉行了積極分子碰頭會；1988年5月聯合會事實上組黨，舒賓等人撰寫了黨綱。1988年5月28日，聯合會與自由派共同舉行了千人集會；6月18日的新集會被員警驅散。伴隨這一切，內部分裂也飛快進行著。6月底它分裂為多數派和少數派，多數派包括「格瓦拉小組」「社會主義創意」「抉擇」「少年公社人」等十多個組織，他們認同革命馬克思主義道統；少數派則明確了自己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¹⁸。

社民派青年當時的典型代表，是風雲一時的魯緬尼采夫。聯合會分裂後，小魯立即與部分志同道合者開展了競選人大代表活動；但1989年秋天他已和自由派走近，積極幫助後者建立選舉聯盟「選舉-90」；1990年初，他進入自由派大黨「民主俄羅斯」侯選名單，並於同年3月當選俄羅斯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人大代表，任人大「大眾傳媒委員會」副主席，初嘗權力滋味。1991年，他被任命為新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成為全俄最高蘇維埃（即國會--譯者注）內部實權人物；後來，在1993年國會與政府的對立危機期間，他也發揮了相當作用。魯先生的宦海奇航，是九十年代初蘇聯社民派運動的一個縮影和象徵；它從主張市場社會主義開始，以全面公開地擁護資本主義告終，從要求「社會民主」、「經濟民主」到簡單地要求「民主」（「民主只有一種！」），社民派受到上層精英小圈子的閃電式招安，並以此自豪和自得。甚至在1991年八一九事件以前，社民派的動員能量就已衰竭，喪失了一度擁有的群眾性。這以後，曾有過多次復興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嘗試，但都失敗了。

無政府主義

1961年，奧西泊夫為首的無政府工團小組被國安部門破獲，該組織企圖暗殺赫魯雪夫和其他政治局成員。70年代的斯科波夫小組自稱站在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立場上，也被很快破獲¹⁹。改革開放以後，無政府主義走上前臺。1990年，蘇聯天王級搖滾歌手維克多·崔（蘇聯朝鮮族）發起成立全蘇無政府工團聯合會（崔很快意外去世）；部分無政府主義者進入蘇聯全國總工會，成為工會官員；部分無政府主義者與西方環保運動取得聯繫，從事綠色運動。總的來說，俄國無政府主義者較為溫和，也沒有在工運和其他激進社會抗議中有任何突出表現。

著名無政府主義作者阿·茨維特科夫的演變歷程很有代表性，他先是積極參與街頭政治，但幾年後最終落戶主流時尚雜誌「ОМ」編輯部，以所謂「無法革命，還可以顛覆」的詭辯來自欺自慰。那些不肯折腰的無政府主義者多半都與托派或激進斯大林分子合作，已相當偏離自己的理論立場。

毛澤東主義

毛主義是隨著文革進入蘇聯的。70年代，在烏克蘭存在過毛派地下小組；80年代，下新城的學生中存在過毛派小組，他們幾乎都是被「造反有理」等口號所吸引的；就自己的組織構成來說，他們是些對晚期蘇聯令人窒息的社會環境極度不滿的憤怒青年。不過，80年代後期的改革開放沒有給毛主義帶來什麼動力，它的影響只是在90年代後期才略有擴展。

一個幽靈在蘇聯徘徊，托洛茨基的幽靈

改革前夕來到地下左派的工運人士伊赫洛夫回憶說，「80年代初出現的地下工人組織有個特點，要麼以『正統斯大林主義』自居，要麼帶有強烈反斯大林主義同時強烈反資產階級的性格，這與親西方持不同政見運動有很大差別」²⁰。所謂的斯大林正統派，以阿·考瑪科夫的《鬥爭》報為代表。考瑪科夫是1962年莫斯科「無產階級共產黨」成員，長期堅持活動，該組織譴責蘇聯是「國家資本主義」，而斯大林是剝削階級的總代表，但同時又對斯大林表示某種「尊敬」；另一方面它提出「工人主義」

的口號，反對「知識份子霸權」。而所謂反斯大林主義的一個重要理論代表，是蘇共古比雪夫州委幹部尼基申娜；她在80年代初就形成了完整的「國家資本主義」理論，認為斯大林及整個蘇共上層實施的是大資產階級法西斯獨裁統治。

1983年，在烏拉爾地區成立了跨州地下組織「工人」（不同地區有過不同稱呼），它的人員結構因地而異，有的地方以大企業工人為主，有的地方以工廠裏的年輕工程師為主。說起工程師，需要提醒讀者的是，蘇聯左翼中的知識份子以理工科為主（「與馬列主義基本原則產生絕對矛盾的社會政治（軍隊和企業）現實，引發了部分普通理工知識份子的政治興趣」）²¹。文史類知識界對托派觀點如果也產生過一點興趣，也很快就拋棄了這種「無法形容的馬列教條」。60年代的索爾仁尼琴曾與兩個托派地下分子接觸過，但坦率地告訴後者自己已放棄社會主義立場，並建議他們去找羅·麥德維傑夫，據他所知麥氏正在「埋頭精讀當年的反對派日誌」。但麥德維傑夫最終發現自己更喜歡布哈林等右翼領袖的立場，其實這也是蘇聯上層左翼文化人的共同特點。

回到「工人」上來，它的政治立場相當鮮明：「蘇維埃政權早就不存在了，因為既不存在底層監督的可能性，工人也沒有隨時召回蘇維埃代表的權力，更不存在在工資上幹部與工人的平等」「列寧指出社會主義的特徵是生產資料國有化加上工人政權，但現實生活中是黨和國家幹部在對工人行使絕對權力，而非相反」²²；「工人」提出它的「任務是推翻蘇共集權政府，重新建立蘇維埃政權」²³。事隔二十年，當時的一些參加者認為「應該承認這是個托派組織，並且我們是自發地提出上述托派主張的，沒有接觸到任何（托洛茨基的）著作」²⁴，而它的少數工人成員至今仍是俄國托派運動的積極分子。

俄國當代左翼工運活動者瓦·拉古金科認為，「天生天養」是蘇聯戰後地下托派分子的一般規律，但也有例外；烏克蘭當代工運活動家阿·杜勃洛夫茨基在年輕時偶然接觸過「漏網老托派」，從此深受影響；烏拉爾地區的某工人小組領導人切雷碩夫則受父親（內戰時期紅軍下級指揮員、20年代左翼反對派成員，被終

身流放)的影響,而成為托派。七十年代初,老切雷碩夫曾拜訪貴為蘇共高幹的親哥哥,在私下交談中「父親痛斥自己的哥哥出賣了工人階級,早就把十月(革命)扔到下水道裏去了」,而後者「痛哭流涕,只重複著『我有啥辦法』」列寧主義者都給上頭殺光了,可我也沒轍呀」我們對不起列寧同志,我們該死」,小切雷碩夫回憶道²⁵。

整個七十年代切雷碩夫父子曾「拼命尋找關於托洛茨基著作的任何蛛絲馬跡」²⁶,但毫無結果。在反托防托這一點上,蘇聯政治文化出版界被封鎖得像罐頭一樣嚴密;1985年前的蘇聯人可以買到自由主義或古典社會主義著作,可以買到外文版的當代資產階級政治家作品,在半開放的內部圖書館可借到持不同政見作家的部分作品(比如「古拉格群島」或「無用系」)甚至法西斯著作(比如「我的奮鬥」),但托洛茨基是例外。甚至蘇共中央黨校裏專門吃批托飯的教授們也無權(!)閱讀他的作品,職業寫手們只能參考舊的批托書刊,然後定期撰寫新著。



合法化以後

1989-1990年間,「工人鬥爭」(列寧格勒),「工人民主」「社會主義工人同盟」(莫斯科)等托派小組開始合法活動;「工人民主」的前身,是「共產主義幽靈」小組;在同名報紙(「共產主義幽靈」)第6期,「老地下黨」勒·木赫梅傑亞洛夫對「至今沒有成立第四國際的蘇聯分支」表示焦急,他覺得成立支部「一方面可以把1927年左翼反對派的精神遺產正式發揚起來,同時可以得到第四國際的幫助」²⁷。當時,俄國托派和其他地下左翼(無政府主義、毛澤

東主義、工團主義)一樣,對國際共運的內部具體形勢幾乎一無所知。在短暫接觸後,「共產主義幽靈」參加了以倫敦為總部的國際性托派組織「Militant」,接受後者的領導。

1990年出版的第一期「工人民主」刊登了「我們的基本原則」一文,幾經修改後成為它的通俗性綱領宣言。宣言提出了一系列泛民主要求,其中包括「言論、出版、結社、罷工自由,自由遷徙權、所有政治組織參加選舉的權利(法西斯政黨除外)」「軍人和員警有參加政黨和工會的權利」「士兵軍餉不應低於工人平均工資」「任何民族有自決權和分離權」;宣言也提出了一系列社會-經濟要求:「工資與價格掛鉤,最低工資、退休金和助學金不低於平均工資的75%,立即實行35小時工作周」「工會脫離國家控制,建立免費的大眾性醫療和教育服務」「反對私有化和任何形式的非國有化,擁護生產資料公有制」,「建立廣泛的社區管理委員會和消費者委員會,監督食品和社會服務質量」「推行大規模非商業性質的國家建房計畫」²⁸。

在政權問題上,宣言提出「人民不僅有權選舉所有官員,而且有權在任何時間召回和罷免他們;負責官員的工資不應高於工人平均工資」;「在企業基礎上自下而上地建立工人委員會,委員會成員可以被隨時召回和改選,各企業工委會選舉組成地區工委會,後者組成全國工委會,即工人階級的中央政權」;「企業工委會有權監督生產,服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指導」「在工人委員會的管理和監督下建立廣泛工人武裝,保衛工人階級的利益;取消軍銜制及相關物質和政治特權」「反對秘密外交,蘇聯政府必須公佈所有秘密條約」²⁹。這份當時的宣言還不很成熟,但它畢竟是一份站在階級立場上思考和回答問題的政治文件。

1991年5月1日,托派和無政府主義者召集了5千人的集會;托派積極參加了白俄羅斯的總罷工和明斯克拖拉機製造廠罷委會的成立;在莫斯科,托派在超大型軍工廠「禮花」火箭生產聯合企業建立了支部;在烏拉爾,「工人」與出獄的伊薩也夫合作,兩年多時間裏發起和領導了兩百多次大小罷工。但政治大氣候已逆轉,自由派穩穩地佔領了包括電視臺在內的主要輿論陣地,每天深揭狠批「共產邪惡」,影

響了整整一代青年；大批西方「勞工問題專家」滲透到工運中去，思想輔導加物質誘惑多管齊上，不合手的工人領袖漸漸被邊緣化，工人運動（特別是礦工運動）日益落入自由派和美國勞聯-產大的影響之下。自那以後，繼承馬列道統的當代左翼註定要走過十數年的漫長道路，經歷許多戰鬥、磨難、叛賣、損失、疑問、恐懼和忍耐的時刻，這條路至今也還未走完30。

自由不是沒有代價的！

電影「斯巴達克斯」（柯克·道格拉斯主演）裏面有一組鏡頭；某人問他「如果你能預見未來，發現你的隊伍最後垮了，你也死了，你還會戰鬥下去麼？」，斯巴達克斯告訴他「奴隸和自由人是有區別的，自由人死去就喪失了生活的樂趣，而奴隸只有死才能擺脫苦難」。和斯巴達克斯一樣，蘇聯地下左翼雖沒取勝，但畢竟抗爭過；他們留下了「不怕鬼、不信邪」的戰鬥精神，與周圍苟安迷醉環境決裂的不妥協精神，拋棄早成廢品的《真理報》卻不盲信美國真理部的獨立思考精神，與蘇共官僚精細煽情的民族主義宣傳相對抗的國際主義精神。無論他們的理論探索有多少失誤，無論他們之間有多少爭執，他們已化為鋪墊自由之路的磚石。在資本暴政橫行天下的21世紀，在無數奴才夢想著成為小小奴隸總管的時代，我們傳遞著奴隸反抗主人的歷史，這歷史需要我們用生命、而且只能用生命繼續書寫。（完）

注釋：

1. Жигулин А. 《Черные камни》 М., 1988 г
2. Волков В. 《Троцкизм в полевом военном СССР - Об одной антисталинской группе молодежи начала 1950-х》
www.wsws.com/ru
3. 《Новочеркасск 1-3 июля 1962 г. Забастовка и расстрел》 М., 1992
4. 同上
5. 同上
6. 同上
7. 用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 Правдин Л.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нород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Минск, 1989 г.
12. Приложение к протоколу №233 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ЦК КПСС от 24.10.1980 г. из архива диссидента Буковского.
13. 同上
14. 同上
15. «Он смотрел в жизнь глазами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16. 《ВК сегодня》 ? 21 (13745), 25 мая 1996 г. «Самый пролетарский из диктаторов»
17.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4, 2000 г.
18. Шубин А. «Течение 'общинн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в неформа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 1986-1988 гг.»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1, 2004 г.
19. П. Рауш ? Анарх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Питера ?, <http://novsvet.narod.ru/p.html>
20. «От троцкизма к рабочему движению»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1, 2004 г.
21. 同上
22. 同上
23. 同上
24. 同上
25. «Рабоч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7(53) Июль 1999
26. 同上
27. цит. по В. Лагутенко ? Краткий курс истории КРДМС ?, самиздат, 1995
28. «Рабоч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1, 1990.
29. 至於蘇共黨內的「老左」，他們直到蘇聯正式解體前夕，才停止向黨中央呼籲「反擊資本主義力量、回到正確路線上來」的可憐努力；對1987-1991年的民間青年運動和罷工運動，「老左」一向態度冷淡。1991年底，「老左」們匆匆成立了幾個共產黨，幾經分裂後，他們要麼完全成為資產階級的代理，要麼蛻變成老年休閒俱樂部。

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與共產主義運動

李星

美軍佔領伊拉克以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關係，反帝統一戰線和工人階級政治獨立性的關係、宗教勢力與資產階級的關係等等，再次成為許多先進工人和左翼青年關注的話題。本文著重介紹中亞國家烏茲別克斯坦的一些相關情況，以期取得舉一反三的作用。

「卡裏莫夫王國」：中國和俄國資本主義的混合體

烏茲別克斯坦人口兩千二百萬，是世界產棉大國（產量占世界第四位），也有很豐富的石油、天然氣和黃金資源，製造業相對發達。烏國資本主義復辟道路可說是俄式和中式道路的混合體：蘇聯解體後，當地共產黨改組為人民民主黨，繼續執政至今；原共產黨第一書記卡裏莫夫則成了烏國的萬年總統。當局的主要幹部和統治工具承自老蘇共，甚至宣傳機器也未大變：《東方真理報》原是烏共中央機關報，現在是中央政府機關報；《塔什干真理報》過去是省委機關報，現在代表首都政府。當局一方面宣佈實行多黨制、「自由民主」，在經濟上與國際金融機構合作，逐步推進經濟自由化；另一方面事實上剝奪了任何政治反對派（自由派、左派、伊斯蘭）合法存在的可能，出現了一個具有所有西方民主符號的亞洲獨裁資本主義國家。

烏政府內部分成許多地區集團，「古惑仔」般不停爭鬥和「砍人」。主要幫派包括撒瑪爾罕幫（政府內代表--議長哈利洛夫）、亞美尼亞幫（政府內代表--原總理蘇爾丹諾夫）、塔什干幫（政府內代表--總統卡裏莫夫）、西方派（政府內代表--宏觀調控部長兼歐洲改革與發展銀行副總裁阿吉默夫）、大進口商集團（政府內代表--國家副總理烏斯曼諾夫）。最高當局通過內務部（即公安部）第七處搜集各級官員的黑材料，以防後者背叛；國家出版總署和總統新聞秘書負責全國的新聞檢查；卡裏莫夫總統與阿富汗大軍閥杜斯土姆的鴉片走私生意也早是公開的秘密。至2003年底，烏國在押政治犯約七千人（以伊斯蘭分子為主），政治告密相當流行，反對派人士失

十月評論 2010年第2/3期

蹤時有發生（較著名的包括伊斯蘭復興黨主席「伊瑪姆」阿不杜·烏泰、安吉讓市中央清真寺「伊瑪姆」阿·米爾紮也夫）。

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在中亞的政治、軍事影響急劇上升，並以此推動中亞各國加快經濟自由化變革。2002年初，烏國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訂備忘錄，承諾將對金融、外匯、外貿、農業等領域實行重大改革；同年烏國的電信、石油等關鍵部門的私有化也進入快車道。與此同時，社會領域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也日益佔據主導地位，2002年烏住房改革結束，居民住房補貼全部取消；除少數中心城市的高級住宅區外，多數居民區的基本設施損毀嚴重，貧民窟生活方式逐漸成為現實；2003年初，最貧困階層的所有社會補貼（類似中國的低保）被取消。儘管擁有大量資源和蘇聯時代的完備基礎設施，烏人均月工資不足50美元，目前實際失業率在20%以上（官方數字為0.5%），數百萬勞動力在國外（主要是俄國）打黑工糊口¹。在農村，儘管中央政府花了不少力氣進行農業投資和建設，但各級官吏驚人的貪污吃掉了大部分資金，結果是農業機械和基礎設施損害嚴重，水利設施荒廢程度日增。用當地一位共產主義者的話說「卡裏莫夫制度已經徹底腐朽，我們甚至能聞到黴爛的氣息，問題是誰來接管這個爛攤子？」。

反對派一覽表：自由派

與專制制度抗衡的幾股勢力當中，伊斯蘭運動最強，左派最弱。不過我們先來看看居中的自由派。烏國有兩個親西方自由派政黨，主要骨幹由烏茲別克民族主義知識界構成；它們一度在城市居民中極受歡迎，並囊括了1991年烏國議會的多數席位。當共產黨官僚搖身變為「民主派」並繼續把持政權後，自由派立即與當局積極對抗起來（集會遊行、議會彈劾）。1992年夏，主要自由派政黨被終止登記，它們的領導人則在半年後被正式逮捕；進入1994年，地下報紙「自由」的發行再度引發對自由派的大搜捕，自那以後它的多數領袖流亡國外。目前自由派在知識界仍有很

大影響，還積極從事人權工作，始終受到西方政府和私人組織關注和支援。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

早在八十年代末的改革時期，蘇聯穆斯林的宗教政治化就開始了。在中亞，許多清真寺積極培訓軍事人才，在宗教學校秘密開辦軍事課。1990年烏舉行總統選舉，卡裏莫夫爲了當選總統，一度與穆斯林上層打得火熱，誘使後者爲他助選。1991年八一九政變垮臺後，中亞立即大亂，烏茲別克斯坦成立了「伊斯蘭復興黨」，它的青年積極分子在一萬以上，並很快武裝起來。

1993年，「伊斯蘭復興黨」被卡氏嚴酷鎮壓，烏境內各清真寺的活動受到國安部門嚴密監視，外國傳教者則被統統驅逐出境。許多伊斯蘭運動骨幹逃亡國外，先後參加了塔吉克、阿富汗和車臣戰爭。1998年，流亡分子組建了「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烏伊運），在國內從事爆炸和武裝突襲，參與著名的吉爾吉斯斯坦日本人質事件。2002年，它與塔、吉兩國和中國新疆的部分伊斯蘭力量成立了「中亞伊斯蘭運動」。烏伊運的資金基本來自中東產油國的某些大資產階級圈子，九一一前的資金發放通過塔立班，現在則主要通過所謂的「基地」組織和「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陣線」；作爲交換條件，烏伊運在技術和人力上幫助後者與中國進行軍事鬥爭²。

左派：大石下的嫩草

1991年以後，一批原蘇共的烏茲別克黨員（主要是幹部）試圖在當地重建共產黨。他們立即受到卡裏莫夫特務部門的「關照」，有的被打有的受恐嚇；坐慣辦公室的「老左」們哪兒見過這陣仗？隨著烏共重建籌委會主席（原烏文化部高幹，多次被國安談話）的暴死，「馬列主義者」們相顧無言，扶著眼鏡拄著拐杖踉踉蹌蹌躲進小樓成一統去了。

儘管「老左」們後來成立了「勞動人民共產黨」，但它基本是個空架子。新的無產階級革命終究要依靠新鮮血液，1996-1997年間，烏首都塔什干出現「公社人運動」，它的參加者是一小批知識青年，主要從事了搜集、挽救被各大圖書館下架銷毀的馬列經典著作，並與俄國左派取得了聯繫。在此基礎上，2001年成立了「塔什干共產主義同盟」（塔共盟）。這個組織很小，在幾所

學校、機關和位於首都的契卡洛夫飛機製造廠（主廠職工約二十萬人）裏有支部，包括四名骨幹和約三十個積極分子；同盟每週出版非法傳播的「工人日誌」（其實是小報），進行組織工人和學生的工作，在互聯網上進行工運新聞報導。此外，還有幾個很小的左翼和平主義團體，這就是我們已知的烏茲別克斯坦全部左翼運動。

卡裏莫夫之後：誰是強者？

儘管每次卡裏莫夫露面，烏國新聞都少不了強調大總統如何「神采奕奕走向主席臺」，大家長的健康是一日壞似一日了。社會-政治生活表面的沉悶隨時可能被打破。誰會進入政治舞臺的中央呢？2002年夏天，在一次採訪中塔共盟代表德列維（化名）詳細談了這個問題。他首先否定了自由派獨立掀起大風浪的能力和決心（有美軍刺刀助陣另當別論）。列維表示烏多數知識界和中小資產階級確實傾向於自由主義，對美國和西方抱有很多期望，但自由派資產階級極其軟弱，基本沒有發動工農進行群眾性反專制鬥爭的願望。列維指出自由派「主要要求經濟自由化，呼籲給中小資本家更多商機和援助，抨擊大官僚及其商界朋黨壟斷了幾乎全部資源，但它絕少提及言論、結社（特別是工會）、出版等政治自由」³。爲什麼呢？首先是自由派本身雖受打壓，但程度較輕，它在言論自由方面的處境更比工農要好得多（擁有一系列大型合法雜誌），由於極端害怕伊斯蘭運動和工農會借著政權鬆動之機起來造反，所以自由派總的來說「對當局極其恭順」。

列維的論斷從自由派本身得到了驗證。當九一一之後美軍進駐中亞（包括烏國）後，一位元當地自由派著名記者抱怨說「西方的軍事進駐來得太遲了，晚了五到七年，（這裏）已建成了典型的封建國家」⁴。

那麼伊斯蘭運動呢？在上述採訪中，列維承認「（目前）唯一可能奪權的反對派是伊斯蘭運動」並分析了伊斯蘭運動崛起的社會-階級內涵。列維說「（原教旨主義的）社會基礎是農民和進城打工的農民工。他們通常文化水準不高，在城裏受盡雇主欺壓，常爲了幾張大餅被迫幹上一整天，就這樣日復一日。在農村雖然生活也很艱難，但還能感到村裏和大家庭內部的互助，在城裏什麼也指望不上。此外他的傳統教育也與耳聞

目睹的資產階級社會現實激烈衝突。這類年輕原教旨主義者的內心往往非常憤怒，什麼都聽不進去，一心想用自己心目中的傳統伊斯蘭道德來改造世界，而人類分成兩類：真主的戰士和異教徒。他們回到家裏，就是當地的伊斯蘭運動積極分子」5。布哈拉等三個最窮的州是伊斯蘭運動的中心，那裏的農民和農業工人存在明顯的親伊朗傾向。

原教旨主義等於法西斯主義嗎？

那麼到底如何為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進行階級定性呢？列維認為，雖然對伊斯蘭群眾運動不能片面的一概而論，但目前這種受到中東石油壟斷資本支持的運動「（它的）主流明顯帶有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法西斯群眾運動的影子」，即以小資產階級和落後的無產階級一部為社會基礎，以大規模極右運動為手段，替大資本火中取栗。

列維援引烏伊運1999--2000年間編輯的內部標準教材「聖戰者教程」，指出原教旨主義與法西斯運動一樣，在運動目標上常常以抽象和模稜兩可的詞句代替明確的社會要求；比如烏伊運在教材中聲稱「穆斯林的唯一目標是讓真主滿意，即完成所有真主的命令，為使對真主的信仰取得至高無上的地位而鬥爭，需要建立永不變更的政治和軍事體系，永遠不與異教徒合作，把他們從所有的職位趕走，並建立伊斯蘭秩序」6，這些話給具體解釋留下了巨大空間。與當年的德國納粹黨一樣，烏伊運很懂得如何尋找自己的社會基礎，它也善於用鐵血形象和借助煽動一群人奴役另一群人來加強內部的凝聚力與吸引力。「聖戰者教程」強調原教旨主義運動應把宣傳放在首位，著重點放在農村；宣傳主要通過流動電臺、報紙和傳單，並和武裝鬥爭相結合；要以「純淨的伊斯蘭」教化普通穆斯林（所謂「聖戰的原材料」），對不服從者必須消滅；「對猶太教徒、基督徒和多神教徒要號召他們改信伊斯蘭，否則就消滅或把他們變成牲口一樣的奴隸，變成物品」「要在信徒中間分發這些物品（指奴隸）」；「說『異教徒也是人』是不對的，因為他們背叛了真主」7。

同20年代那些自命「戰壕貴族」的義大利法西斯一樣，原教旨主義運動對工農大眾從骨子裏是蔑視的：「人民是一群羊，只知道吃，他們甚

至不會問『你要把我們帶到哪里去呀？』」；儘管如此，「必須要與人民在一起，因為後者可以提供掩護、食物和住所」8。毫無疑問，單一的宗教狂熱和嗜血煽動遠不足以讓千百萬普通人跟著伊斯蘭「戰壕貴族」們走，所以少不了對富人長篇大論地抨擊和渲染「自然的穆斯林平等精神」。可惜，「聖戰」的鼓吹者到底無法回避一個基本問題：伊斯蘭革命後資產階級還有沒有存在的權利？「是否允許銀行（資本）存在？允許，但它們要服從伊斯蘭秩序」9。從雅利安秩序到伊斯蘭秩序，20世紀小資產階級的詭辯和想像力看來並未有太大進步。值得注意的是，烏伊運的理論家們從一開始就為自己留下了退路，以便運動不至於被支持者牽著鼻子走，真的去落實什麼伊斯蘭傳統美德：「完全照搬哈裏發時代的習俗律法是不明智的，要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改變」「祈禱的程式、留須等等，是不可改變的，但不能在軍事、運輸和其他類似領域落後」10，總之，要「伊斯蘭秩序」，也要現代資本主義工業文明，而普通「聖戰者」的命運在如此新秩序下會否改善，則是禁止思考和討論的，因為「對不服從者必須消滅！」

在烏伊運「聖戰者」看來，工農大眾必須「被安排到一個特別的組織中去，接受純淨的伊斯蘭教育」。不過沒有這種教育，烏茲別克斯坦的工農也已相當接近於馴服奴隸的精神狀態了。

工農鬥爭：你別無選擇

自資本主義以來，烏國工農的反抗一直很低落，只有些零散和自發的工人罷工和農村騷亂。2002年6月，因為拿不到拖欠的工資（女兒住院急需手術費），一名契卡洛夫飛機製造廠工人上吊身亡。工廠有錢給廠長建第二個私人專用加油站（第一個被廠長當作禮物送給兒子）、舉辦各種宴會，就硬是「沒錢」給工人開支。第二天，自殺工人工作過的組裝車間舉行罷工，要求廠方立即支付（車間）所有工人的欠款。管理層很快發放了一小部分欠款，結果其他車間立即跟著罷工；管理層採取了各個擊破的戰術，對主要車間的要求予以一定滿足（其實就是發工資！），對次要車間則完全不予理睬。工人們自始至終沒有聯合起來組織一場大罷工。

在這次罷工之前的四月份也有一個工人上吊死去（原因類似），另一個工人試圖在工廠跳

樓，被制止了。每次出事，工人所在車間都會罷工，都得到了一點工資，但也僅此而已。企業管理層像個在小朝廷裏橫行霸道慣了的王爺，無恥到極點，但也顧顏到極點。六月罷工中，原來廠方計劃撥給97號車間的錢給了罷工的89號車間（「錢就這麼多了」），當97號車間也鬧罷工後，更多的錢突然「也找到了」。

如果說烏國的龍頭企業「契飛」都無法保證工資的正常發放，其他「小二黑廠子」就更提不起來了。瑞紮克州的農業工人（種棉）和建築工人超過半年領不到工資；首都許多企業工人的工資拖欠週期超過八個月；紡織工人則面臨減員增效的「結構調整」。與此同時，政府還在想方設法從群眾身上多榨點油出來：2003年國家獨立日的首都慶典活動開支（約五十萬美元）是向各企業攤派的，以支付明星的出場費。烏茲別克當代工人的馴順程度如此驚人，塔共盟代表德·列維曾苦笑著講述了「契飛」的工人是如何單個「爭取」拿到拖欠工資的：先到廠長那裏去哭訴，廠長「表示同情」，簽字讓工人去會計處領錢；會計告訴工人「沒錢」；工人答應會計三分之一（！）工資的回扣；於是錢「湊出來了」，於是「皆大歡喜」。顯然廠長在愚弄工人（會計沒上頭命令絕不敢回絕廠長親筆批條），而工人把這一切當成「秘訣」來炫耀。可悲嗎？當然。但我們沒有另一個工人階級，我們自己也是不斷被愚弄和傷害的億萬勞苦大眾的普通成員，我們沒有其他選擇，只有和父老兄弟姐妹一道，只有鼓勵和幫助他們起來鬥爭，列維總結道。

保持工人階級先鋒隊的獨立政治立場

在中亞和俄國左翼中間，都存在著對伊斯蘭運動的爭執和分歧。有的左派認為應該與世俗國家政權結成反原教旨主義統一戰線，有的相反，認為應該和伊斯蘭運動結盟，以反擊「美帝國主義」。塔共盟代表德·列維認為這兩種看法都是錯誤的，因為它們沒有看清政治標籤後面的階級實質。以烏茲別克斯坦來說，卡氏政權確實算個世俗政權，抑制了宗教極端勢力的膨脹；但也是這個政權的資產階級統治，使得勞苦大眾苦不堪言，而被迫在原教旨主義那裏尋求安慰（主要是傳統意識濃厚的農民）。

而且，原教旨主義運動絕不從根本上反對資本主義，而資產階級國家也並不把原教旨主義看成死敵。在烏茲別克斯坦，當局與伊斯蘭上層的調情日益明顯，2001年首都中小學校開設了「伊斯蘭神學課」，國家教育部門更越來越重視所謂的傳統教學法。原教旨主義運動不僅反對西方資本主義，更反對共產主義；如果說它與美國「魔鬼」的鬥爭主要是零星而不關痛癢的個人恐怖（只有深受美式宣傳影響的人，才會幻想九一一事件給美國統治階級造成了多大的損害），它與工人運動的鬥爭卻是實在的。無論伊朗還是阿富汗，車臣還是中亞，原教旨主義運動都把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當成死敵，血的教訓告訴我們，沒有一個以爭取政權為目標的革命綱領，沒有對自身利益的清醒認識，沒有對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的高度警覺，沒有自己的獨立政治組織，工人階級從那些半真半假的盟友那裏得到的絕不會是「眾人拾柴火焰高」，而只能引火焚身，讓老閹們享受又一席美味燒烤大餐。

21/05/04

注釋

- 1 在俄烏籍打工者超過三百二十萬人（三分之一在莫斯科）。多數打短工和零工，其他是小生意人。打工者只有12%有合法身份，80%來自烏農村。他們的平均收入在200到500美元/月。以上資料見Ш. Ганиева “Свой путь развития Узбекистана” - его сторонники и противники (<http://mazlum.ferghana.ru/svoj.html>)
2. Бабаджанов Бахтияр 《Теологическое обоснование и этапы джихад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слам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КИСИ от 18 ноября 2002 г.
3. 見2002www.1917.com的相關採訪。
4. Сергей Ежков 29 сентября 2002 г 《РАЗВИТИЕ СМИ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В СВЕТЕ ПОСЛЕДНИХ СОБЫТИЙ》<http://mazlum.ferghana.ru/ejkov.html>
5. 同注釋3
6. 《Ислам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заявило о себе》/ Время МН от 9 октября 2002 г.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中亞左翼報告——哈薩克共產黨內的亂象

李星

2004年3月1日，一批原哈薩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宣佈成立新哈共。「第二黨」籌委會的牽頭人物是原哈共第二書記弗·科薩廖夫。科某聲稱共有七個州委書記參加了籌委會的工作，新黨黨員總數預計在2萬5千人左右。籌委會散發的宣言指責現任總書記謝·阿布季利金「把黨帶上了小資產階級道路」，使黨「喪失了自己的階級屬性，嚴重偏離了馬列主義理論和組織原則，耽於內鬥和內耗」；阿總書記的罪行還包括「妄自尊大」、與統治階級合作、從「非共產主義力量」手中獲取活動經費，等等。

哈共的分裂趨勢由來已久。2001年1月，較為激進的原蘇共「老左」和工人青年在黨內成立了「馬列主義綱領派」，與公開奉行親資產階級路線的中央多數進行抗衡。當時哈共中央多數派對這批人百般打壓：從開除出黨到串通員警恐嚇當事人，從指責綱領派分子是當局派遣的奸細到宣佈他們是國際間諜，種種手法不一而足。然而近兩三年來，哈國資產階級和國際資本的介入使哈共黨內形勢更加複雜了，原來的中央多數派變成了水火不容的敵人。三年前，部分黨內著名工運活動家堅決進行階級鬥爭，引發黨中央的不滿；後者對這批幹部實行清洗，負責這一「光榮使命」的人是政治局委員、國會議員索羅金。不料，兩年後在「抱誰的大腿最好」這一原則問題上，索同志與阿總書記發生分歧；索同志主張依附俄國資本，而阿總書記堅決要求走西方路線。雙方談判不成便大打出手，索某及其親信被開除出黨。今年三月出現的新哈共，是這一窩裏反的最新發展。

現任共產黨總書記阿布季利金來頭很大，他在蘇聯時代就是黨政要員，1991年後出任哈國國會議長。90年代初期，他與現任總統納紮爾巴耶夫親密合作，共同制定了哈薩克第一部資產階級憲法，積極推進私有化，功勞不少。阿先生本是社會黨領袖，但他很快發現「社會黨」的品牌遠不如「共產黨」值錢，便在多數哈共高級幹部的配合下，當起了共產黨第一把手。阿布季利金在哈共的主要活動包括支援土地私有化、支援對資產階級實行所謂的「經濟特赦」、成批開除黨內較左的工人和學生，等等。上次哈國總統大選時，阿總書記未能搜集到足夠的簽名以參加競選，還是老哥們納紮爾巴耶夫發佈總統令救了他的急，特批阿總書記在大型企業和機關內部搜集簽名^[1]。近一年來，阿總書記與國內自由主義政黨建立了聯盟關係；2003年12月底，親西方的自由主義右派活動家托·托赫達森諾夫「火箭式」進入哈共中央和政治局，並成為中央

書記處書記，此舉也成了黨內親俄派徹底鬧分裂的導火線。

市議會選舉，哈共大敗

黨內危機的影響最直接的後果，是哈共在去年11月的全國市議會選舉中全軍覆沒。2679個市議會席位，「祖國」（代表政府）得52%或1477席，「農業」黨（代表農業資產階級）109席，公民黨（代表冶金資本）89席，哈共無任何席位。東哈州有「紅色東部」選盟參選，有些工會領導人也參加了競選。「馬列綱領」派在阿拉木圖的左翼選盟提出「工人參加對政權的監督、各民族平等、選民有權召回議員、維護結社、言論、會議和集會自由、反對雇主的欺壓」的競選綱領，得到了約七千張選票，但沒有得到席位。與許多「新民主國家」一樣，哈薩克的議會選舉充斥著買票、驅趕獨立監票員和做票現象，民衆則日趨冷漠和厭倦，阿拉木圖本次選舉的投票率僅為12%。全國平均投票率為25%。

在哈國際資本勢力重組與哈共

1998年以前，哈國的外資以西方、特別是美資為主。經濟支柱的石油業被包括中國資本在內的國際資本全面滲透；自1995年來美國能源公司 AES 在哈收購了一批大型水電廠、小型能源服務企業和輸電線路網，對哈內部事物也有相當影響。如今行情變了。莫斯科的老大們帶著資本和刺刀重返中亞，俄資的「盧克」石油公司和「統一能源公司」接管了不少原來美國人的地盤，同時注意扶植當地政治代理。聽話聽音兒，哈共黨內久已存在的親俄派遂蠢動起來；東哈州委書記維·吉霍夫指責阿總書記的一條主要罪狀，就是後者反對哈國與俄羅斯組成邦聯關係^[2]。

「老左」的絕望掙紮

除了公開的親俄派和西方派，哈共黨內還有一批死硬「老左」，即開頭說的「馬列綱領派」。同那些完全沈醉於議會和機關陰謀的官僚相比，他們較為接近工人，試圖掌握工運主導權，在不同時期也取得過一些成績。但是「老左」們與史達林修正主義斬不斷的思想和理論聯繫，他們根深蒂固的老蘇共做派和思維模式都決定了自身不可避免的衰亡命運。2003年2月，原阿拉木圖市委書記阿·阿珀利莫夫（被開除出黨）當選馬列綱領派領袖。2003年7月15日，在綱領派全體會議的報告中，阿同志一腔怒火首先撒向了（他認為是

萬惡之源的)猶太人,並號召與後者進行「嚴肅的馬列主義理論鬥爭」。阿同志批判「政府毫無反抗地鑽進了全球化主義的血盆大口」,是在「以人民為炮灰,追隨北約替猶太復國主義服務」;甚至萬惡的阿布季利金背後也晃動著猶太人的血手:「(阿布季利金)與猶太復國主義的工具——「右翼同盟」(俄國主流自由派政黨——李星注)進行談判」「完全出賣了列寧主義!」,阿同志咆哮道。

2004年3月1日:馬列綱領派再次舉行代表會議。在報告中,阿珀利莫夫認為阿布季利金的社會和黨內基礎是「小資產階級知識界、基層公務員、喪失蘇共鬥爭傳統的退休人員,商人和工業家,包括某些最無恥的私有化作俑者」;他指出黨內西方派和親俄派都「與資產階級政黨訂立各種出賣原則的交易,充當後者爭奪權力和產業的政治後備軍」,都在忙於「保證共產黨上臺後不追究私有化的責任,不重新分配產業、支援企業界,支援經濟大放資本的主張」;最後,他承認「哈共內部成了不同資本集團混戰的戰場」。

應該說,阿同志上述觀察大體正確。那麼,政治結論應該是怎樣的呢?在思想和組織上與修正主義分子拉開距離?在工人階級面前公開、堅決地揭露現今所謂的「共產黨」其實只是資本家爭權奪利的工具?阿同志認為這些做法太過冒進,萬萬使不得。他以一種令人吃驚的坦率態度表示:目前有兩條鬥爭道路,要麼爭取「統一分散的馬列小組,建立合法的(指登記)全國性組織,但這極其困難」,因為「新的政黨法使新共產黨基本不可能被登記」;或者「在哈共內部進行鬥爭,這將會較容易,因為絕大多數黨員和許多幹部是忠於馬列理想和科學社會主義的,他們將理解我們的鬥爭並會給予支援」,需要的僅是「開展廣泛的黨內宣傳工作,把重點放在驅逐機會主義領導層上」。

可是如果下屆黨代會上還不能扭轉形勢,怎麼辦?阿同志撓著頭皮嘟囔說「我們應該建立黨內派別並設法召開非常黨代會」。考慮到綱領派的多數成員早被開除出黨,所謂的黨內鬥爭簡直和自我安慰沒啥區別,連阿同志自己也說「我們很可能根本不會被允許參加黨代會」,但還是應該「堅持保留哈共黨籍,否則我們會成為特工部門的重點打擊目標,並無法得到(政府機關的政黨)登記」。

很清楚,自命鐵杆列寧主義者的阿珀利莫夫其實與他痛斥的黨內「叛徒」相距並不遠。阿同志念念不忘的,不是工人階級的獨立立場和階級利益,而是「登記」、千萬不要被「拒絕登記」,好不惶恐。早在2002年,他就公開承認是「新的《政黨法》阻礙了徹底決裂」^[1];他一面揭露親俄派和西方派都在為資本集團效勞,一面吹噓俄國「聯盟共產黨」主席阿·舍甯(原蘇共老官僚,與新生代工會領袖阿·舍甯同名——李星注)是「蘇維埃政權的堅定擁護者和革命鬥爭戰略的

支持者」^[4]。但舍甯具有石油資本背景,他與石油業大資本家巴吉姆茨基的關係已公開化,通過後者擁有一批石油出口企業的控股權。阿同志對此一言不發。事實上,對資產階級政治規則的盲從和熱衷,是哈薩克「老左」的普遍現象,著名工運活動家、馬列綱領派成員汶科夫(曾入獄一年)就堅決要求「只成立能夠合法活動的組織」,因為「在衛星全球定位時代,列寧的地下活動經驗過時了」。他還有一句話該說卻沒說:「在衛星全球定位時代,革命也過時了」。

階級鬥爭在走自己的路

2004年1月1日起,哈薩克全國市政服務上漲60%,麵包和蔬菜由減少價格補貼,也有相當程度的漲價,這僅是新自由主義經濟路線的兩個小小體現罷了。在哈薩克,新自由主義經濟路線與政治高壓相輔相成。2004年3月1日,哈議會通過新《通訊法》,允許特工部門不經檢查官許可竊聽私人談話。不論各色「共產黨」和「馬列派」總書記們如何醜態百出,階級鬥爭在繼續,而所謂「保持合法政黨黨籍可以避免特工部門打擊」的政治智障不斷地被現實打耳光。2003年秋天烏拉爾茨克市農學院學生、共產黨員阿·沙依古曼夫被開除,校方公開揚言開除原因在於他「跟著共產黨瞎鬧騰」;1月20日冉布裏州共青團書記瓦·沙烏洛被州國安廳驅逐出境,在此之前他被工作單位(在國安壓力下)多次解雇,父母也被國安威脅「管好孩子,要不沒處哭去」。

一片陰暗之中,也有令人安慰的好消息。今年3月,2003年被判3年監禁的工運活動家謝·儒努索夫(卡拉甘達獨立工聯的領導人)和他的兒子魯·儒努索夫(左翼組織「青年近衛軍」中央委員)被假釋出獄,並將繼續進行工會活動。「老左」們憤怒聲討西方和中國資本對哈的滲透^[2],但明裏暗裏支援俄國資本向哈擴張。自然,哈薩克工人階級很難理解這種高超的「馬列主義」和「鬥爭策略」。3年前,哈國「阿克塔烏」大型塑料製造綜合企業被俄國資本收購,2004年3月5日全廠一千名職工開始罷工,原因是廠方拖欠工資達八個月(生產照舊)。

18/05/04

注釋:

^[1] 哈國選舉法禁止在企業和機關內部進行選舉活動。

^[2] 見2004年3月2日「哈薩克共和國共產黨籌建委員會致全國同志書」。

^[3] 2002年8月23日,《活到週一》報阿珀利莫夫文章「黨內分裂:原因和後果」。

^[4] 同上。

^[5] 1997年9月,CNPC擊敗俄、美等國的大型石油公司,成功獲得了哈薩克斯坦阿克糾賓斯克和烏津兩大油田的開採權。見2004年5月18日《中國青年報》「中哈兩國元首推動石油管線合作正駛入快車道」。

Liu Xiaobo Must be Released Now! Human Rights Must be Restored in China!

Zhang Kai

In 2008, Liu Xiaobo drafted Charter 2008 which urged for China's political reform, democracy,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and was signed by twelve thousand people. Later he was sentenced to 11 years' imprisonment, in the words of the sentence, "incitement to the overthrow of the state power and socialist system and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Liu fought for democracy through peaceful means, but the bureaucracy repressed the dissident voices in order that thei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ivileges remain intact. This shows that Liu is deprived of rights of freedom of speech and publication which are stated in China's Constitution. Two years ago, the author wrote an article on Liu, entitled "60 Years after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China's Human Rights Status" (*October Review*, No 225). After Liu was imprisoned for two years, the Nobel Committee decided to award the Nobel Peace Prize 2010 to him. It not only recognizes his struggle but also protests again China's repression. The deputy minister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PRC went to Norway to intervene, but failed.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ngrily opposed that the award signified an interference with China's domestic affairs. Several hostile gestures came afterwards: Liu Xia, Liu's wife, was forbidden to attend the award ceremony; dissident figures like Ding Zilin and her husband were under surveillance, and restaurants were not allowed to serve a table more than six clients. Furthermore, China prevented other countries from going to attend the ceremony. The award ceremony was held as scheduled. An empty chair was placed on the stage, and the Committee was responsible for keeping the prize, medal and money. As Ye Du, a writer, described, it "will lead to further fermentation of China's democratic movement". According to the history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there were at least four similar cases: in 1935, the Committee gave the award to Carl von Ossietzky who opposed Hitler. In 1975, in Moscow, Andrej Sakharov was prevented from receiving the award in person. The same thing happened to Lech Walesa in 1983. The Burmese authorities did not allow Aung San Suu Kyi to receive the Peace Prize in 1991.

On 5 Dec, in Hong Kong, 11 social groups declared a joint statement signed by 48 groups and more than one thousand individuals. On the newspaper, they urged for a demonstration: "Liu Xiaobo should be released! Human rights must be restored in China!" They made five claims: (1) we support the rights of Chinese citizens to promote Charter 2008! (2) We support Liu Xiaobo to receive the Nobel Peace prize; (3) we request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ust release Liu Xiaobo unconditionally; (4) we are concerned that the freedom of Liu Xia and other human rights defenders was limited after the award ceremony, so we reques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cancel the surveillance measures; (5) we are concerned that all civilians have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 that are guaranteed by the Constitution, so we reques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release all political prisoners unconditionally. We think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should immediately release the dissidents in prison (such as Hu Jia) and human rights lawyers like Zhao Lianhai. Their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 must be restor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is certainly related to the diplomacy and the ideology of the western powers, so that the Left should take a critical distance from it. However, Liu being award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is also a criticism of Chinese authorities; hence it can be an encourage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in China.

26 Dec 2010

Human Rights Defender Lawyer Zhao Lianhai Must be Released Now!

Zhang Kai

As his son was one of the victims of drinking contaminated milk with melamine, Lawyer Zhao Lianhai founded a blog named "Home for Kidney Stones Babies" to help those affected families to fight for compensation and better treatment. Unfortunately, he was also arrested and charged for "provoking quarrels and troubles" and then sent to prison for two and a half years.

This has aroused public indignation.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and 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issued a joint declaration to support Zhao. Twenty-seven members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jointly wrote an open letter to ask for a light sentence. Meanwhile, Liu Mengxiong,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NCCPPC) heavily criticized that it was "one of the darkest and ugliest pages of the history of China's juridical system". About 20 human right activists claimed that the People's Supreme Court should review Zhao's case and find him "not guilty" (*Ming Pao*, 24 December). In addition, *Times Weekly*, published by an official media group in Guangdong Province, selected Zhao as one of the 100 well known civilian in 2010, including those human rights lawyers and some signatories of Charter 08. The award speech stated that the authorities' undetermined attitude on the Contaminated Milk Incident and Zhao's case showed that the pursuit of social justice could not be repressed by imprisonment. Although that issue was later banned, it clearly showed that the general public was largely sympathetic towards Zhao. According to *Xinhua News* dated 22 Nov, Zhao pleaded guilty and the authorities accepted his application for medical treatment outside prison. Afterwards, there has been no more news about him. On 10 Dec, it was suddenly disclosed that Zhao was allowed to have medical treatment, which led to Hong Kong media rushing to his apartment. However, the media was blocked by dozens of guards. What happened to Zhao still remains a puzzle. Zhao's case proves that wrong cases always repeat and people have no legal rights. It absolutely needs people's power to make a change. (22 Dec 2010)

Postscript: According to *Ming Pao* dated 29 Dec, the blog of "Home for Kidney Stones Babies" issued a notice by Zhao that he was under medical treatment and he "refuses to contact anyone and disturb my family, and wants to lead a normal life". This is indeed dubious. He had been detained for one month and was forced to issue such kind of notice. The truth will be disclosed in the future. On the other hand, Wang Guangya, currently appointed as the director of Hong Kong and Macao Affai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PRC, claimed that Zhao's case has already been "finely resolved", and defended that "the mainland's independent juridical system should not be intruded". When asked if the open letter by Hong Kong members of NPC violated the rule, Wang replied that it depended on the way of expression, but he emphasized that "the well water does not interfere with the river water".

Wong Kwok Kin, a Hong Kong member of NPC and a core member of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responded that "if an NPC member cannot interfere with HK matters or comment on the mainland affairs, what can he or she do?" Actually, all members of NPC and NCCPPC are merely instruments of raising hands to say yes, but never make any dissent. Their modest petition does not have any positive response which is really a tragedy of bureaucracy.

30 Dec 2010

Hong Kong

- 2 Fight for increasing the minimum wage and decreasing the maximum working hours.....Zhen Yan
 3 The Universal Retirement Protection System should be carried out now.....Juan Di
 4 A proposal for organizing the cooperative canteens (reprint).....Wu Lok Hing
 6 Don't cry, don't laugh, but just to understand (reprint).....Leung Kwok Hung
 8 Congratulations to Liu Xiaobo being award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and Aung San Suu Kyi being released (reprint).....Fan Zui

China

- 9 Liu Xiaobo must be released now! Human rights must be restored in China!.....Zhang Kai
 10 After an intellectual thought.....Bai Chongqing
 11 Human rights defender lawyer Zhao Lianhai must be released now!.....Zhang Kai
 13 The bubble of property estates in ChinaPo Mi
 16 The reform characteristics of Chongqing Model in China.....Qing Yan
 19 A workers' spring in the heart of "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Danielle Sabai
 22 What is China's interest in Latin America?.....Virginia de la Siega

International

- 27 The Revolutionary Workers' Party-Mindanao (RPM-M) and the Left in the Philippines...Pierre Rousset
 31 A new social war is opening up in Europe.....Charles-André Udry
 34 An explosive situation: Towards a general strike.....Sandra Demarcq
 36 An unprecedented movement which is far from over.....Sandra Demarcq
 38 After fifty years of "independence".....Jean Nanga
 47 Central America in the 21st Century Superficially Democratic Regimes.....Dianne Feeley

Memoirs

- 59 The spirit of perseverance of Trotskyist militants: some reflections on 22 Dec 2010.....Qiu Yue
 60 In memory of Sister Shuqing (reprint).....Zhou Luqiang
 62 The Purgatory (reprint).....Zhou Luqiang
 65 Remembering Shen Wenquan (reprint).....Lin Dong
 67 Commemorating Shen Wenquan (reprint).....Yu Yimin
 71 Seven years of confinement in Qingdong Farmland.....Lin Dong

Special Feature on USSR and Central Asia

- 79 The workers' and trade-union movement in 2009: consolidation and dispersion.....Carine Clément
 91 A brief history of underground activities of the leftists of Soviet Union.....tran. Chi Jun
 100 Report on Uzbekistan: Islamic Movement and Communist Movement.....Li Xing
 104 Report on the leftists in Central Asia: the confus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Kazakhstan.....Li Xing

Article in English

- 106 Liu Xiaobo must be released now! Human rights must be restored in China!.....Zhang Kai
 106 Human rights defender lawyer Zhao Lianhai must be released now!.....Zhang Kai

香港	2	繼續爭取增加最低工資，減少最高工時.....	振言
	3	應立即實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軍行
	4	建議大辦合作食堂(轉載).....	胡洛卿
	6	不要哭 不要笑 只要瞭解(轉載).....	梁國雄
	8	熱烈恭賀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暨昂山素姬復自由---雙和平獎得主喝彩 茹素為環保 賀曉波(轉載).....	飯醉
中國	9	立即無條件釋放劉曉波，還我中國人權！.....	張開
	10	文質理念之後.....	白重慶
	11	無罪釋放維權律師趙連海！.....	張開
	13	中國房地產泡沫.....	破謎
	16	重慶模式治標的努力.....	青岩
	19	“世界工廠”心臟裏的工人之春.....	丹尼爾·薩拜
	22	中國在拉美的利益是什麼？.....	佛吉尼亞·德·拉·斯俄伽
國際	27	棉蘭老革命工人黨(RPM-M)和菲律賓左派.....	皮埃爾·魯塞
	31	一場新的社會戰爭正在歐洲展開.....	夏爾·安德列·尤迪
	34	爆炸性局勢走向總罷工.....	桑德拉·德馬奇
	36	一場空前的遠未結束的運動.....	桑德拉·德馬奇
	38	撒哈拉以南非洲在“獨立”50年後.....	約翰·南伽
	47	21世紀的中美洲表面上的民主制度.....	戴安·菲利
懷念與回憶特輯			
	59	托派戰士的忠貞妻子---今年(2010)冬至有感.....	秋月
	60	緬懷淑青大姐(轉載).....	周履鏘
	62	煉獄(轉載).....	周履鏘
	65	記沈文銓(轉載).....	林東
	67	追思沈文銓(轉載).....	俞益敏
	71	青東農場管制七年.....	林東
蘇俄問題專頁			
	79	2009年工人及工會運動：聯合與分裂.....	卡林那·克萊門特
	91	蘇聯左翼地下活動小史(1940--1990).....	阿·金澤爾瓦·拉古金科..... 赤軍譯
	100	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與共產主義運動.....	李星
	104	中亞左翼報告——哈薩克共產黨內的亂象.....	李星
英譯	106	Liu Xiaobo must be released now! Human rights must be restored in China!.....	Zhang Kai
	106	Human rights defender lawyer Zhao Lianhai must be released now!.....	Zhang Kai